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四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墓幢——經幢研究之三

劉淑芬*

本文是筆者研究經幢的系列論文之一，主要討論「墓幢」——包括置於俗人墳域的經幢、置於僧人塔側的經幢，以及在經幢中藏有僧人荼毗後遺骨的「舍利經幢」。依次就墓幢的種類、墓幢的形制、墓幢與埋葬制度討論，再就墓幢流行的原因做深入的探討。在現今所知的經幢中，以墓幢所佔的數量爲最多；經幢之所以歷數百年而不衰，和初唐以後地獄信仰的流布、「尊勝陀羅尼」的破地獄功能、盛唐以後密教陀羅尼的流行、墓幢和孝道的結合，以及墓幢功能的多元化諸因素有關。

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唐五代以迄元代的墓葬中，陸續出土了一些手寫經咒絹畫和雕版經咒，以及在棺木上刻有「陀羅尼」的「陀羅尼棺」，本文稱之爲「墓葬陀羅尼」；並且認爲它是一種墓幢的變形——即用來濟拔亡者地獄之苦的「陀羅尼」，以另外一種形式傳達給死者，而唯有從墓幢這個角度來看，才能找出它們在墓葬中的淵源和意涵。

關鍵詞：經幢 墓幢 陀羅尼 舍利 密教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這是筆者有關經幢研究的第三篇論文，[1] 經幢的全稱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它是唐代才開始出現一種新的佛教石刻形式，在八面的棱形石柱上鐫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或者僅刻此經中的「尊勝陀羅尼」。它通常被樹立在通衢大道、高山上、寺院中，或墳地裡。其中，被放置在墳墓之旁，或墳墓之內的經幢，就稱爲「墓幢」或「墳幢」，[2] 現今我們所知道經幢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墓幢」。

本文專論墓幢，有以下兩個原因：一、經幢具有很多種宗教上的作用，包括：祭拜供養、刻石傳經、供人氈拓流傳、超薦親人或亡者、滅罪、禳災、延壽祈福、鎮土地、鎮海眼、報德建幢等作用，（見本文「附論：經幢的各種宗教作用」）墓幢僅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所有的經幢中，卻以墓幢居多數，因此，若不能對墓幢做深入的討論，則無法對經幢有完整的了解。二、從中唐以迄於明代，它是很多人所採行喪儀之一。玄宗開元年間以後，就有平民、僧人，以至於官員在墓域建幢；至遼、金時期，墓幢更大爲風行，[3] 而建幢者更遍及各個階層，甚至帝王陵墓前也建有經幢，稱爲「陵幢」。五代時期，前蜀高祖王建(847-918) 的永陵前就建有陵幢，一直到南宋詩人陸游來遊此地時，還見到這一對陵幢，並且賦詩紀事，詩題頗長，作〈後陵永慶院在大西門外不及一里，蓋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猶當時物；又有太后墓，琢石爲人馬甚偉〉，詩云：「陵闕淒涼俯舊邦，恨流衮衮似江長。穿殘已嘆金虎盡，缺落空餘石馬雙。攫飯飢鳥佔寺鼓，避人飛鼠上經幢。阿和乳臭崇韜耄，堪笑昏童束手降。」[4] 這兩所陵幢今已不知去向了。不過，遼聖宗（982-1031在位）陵（位於今日內蒙古昭爲達盟巴

[1] 劉淑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145-193；〈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1997)：643-786。

[2] 清・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四，頁278，經幢：「奉佛之士，建幢墓域，謂之墳幢。」

[3] 羅福頤 (1905-1982) 輯，《滿洲金石志補遺》（《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三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頁四，〈僧智墳幢〉云：「此幢近出熱河，……是此幢乃立墳前者，其風始於唐，而盛於遼金。」

[4]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八，頁637。

林右旗白塔子遼代慶州南門之北）前的陵幢，以及遼興宗（1031-1055在位）永興陵前的陵幢，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時都還有遺跡可尋（圖一）。[5] 墓幢甚至可能曾經被官方制定爲喪葬制度的內容，金、元時代人張景文撰《大漢原陵秘葬經》一書中，[6]〈庶人幢碣儀制〉條云：「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同於祖穴前按石幢，上雕陀羅尼經，石柱上刻祖先姓名並月日。」[7] 這樣的敘述似乎是官方有關的喪葬規制。雖然從南北朝以後，如七七齋、盂蘭盆等佛教的喪葬儀式，普遍爲人們所採用實行，但是它們從來沒有正式被納入喪葬制度中，例如唐朝時有一位曾做過溫縣（今河南溫縣）縣令的楊垂，奉叔父之命，撰集喪儀，做爲楊氏家族之用，稱爲《楊氏喪儀》；其中有一篇是〈七七齋〉，李翺 (772-841) 寫〈去佛齋論〉就批評此篇之不當：「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8] 然而，墓幢卻可能正式被列入喪儀之中，如前所述，從五代開始，即如帝王陵前也置有經幢。

本文所謂墓幢，包括放在俗人墳域的經幢、置於僧人塔側的經幢，以及在經幢中藏有僧人荼毗後遺骨的「舍利經幢」。以下依次就墓幢的出現與演變、墓幢的形制、墓幢與埋葬制度討論，再就墓幢流行的原因做深入的探討。最後，並且論及墓幢的變形；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唐五代以迄元代的墓葬中，陸續出土了一些手寫經咒絹畫和雕版經咒，以及在棺木上刻有「陀羅尼」的「陀羅尼棺」；本文認爲：只有從墓幢這個角度來看，才能找出它們在墓葬中的淵源和意涵。

---

[5]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聖宗陵幢記殘文〉，頁273-274；竹島卓一、島田正郎，《中國文化史蹟增補》（京都：法藏館，1976），圖版解說，頁172。

[6] 關於《大漢原陵秘葬經》一書的作者和年代，見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收入徐苹芳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5），頁277-280。

[7] 張景文，《大漢原陵秘葬經》（收入《藏外道書》第1冊，據永樂大典本影印〔成都：巴蜀書社，1992〕），頁三十，總頁160。

[8]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附《唐文拾遺》、《唐文續拾》〔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六三六，頁6424下，李翺〈去佛齋論〉：「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七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百十二，頁十，〈悼亡奴詩〉云：「唐溫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魂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腸斷猶繫琵琶絃。』註云：唐人亡者過七日，則以亡者衣物施僧，事見唐《楊氏喪儀》。」

二、墓幢的種類

佛教傳來以後，對於中國的死亡信仰有重大的影響，人死後若不能覺悟成道，生到佛國淨土，就要面臨六道（天、人、阿修羅、地獄、畜牲、餓鬼）輪迴的苦辛。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地獄思想的流布深化了人們的恐懼。絕大多數的經幢上所刻的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此經最大的特色是「壞罪集福」，並且有破地獄的功能，使得它從一開始出現時，便和死亡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根據此一經典原來的敘述，係將書寫著「尊勝陀羅尼」的絹帛紙張，置於高的幢竿、高山、高樓，或於窣堵波（塔）中，[9] 並不包括墳域；但由於它的破地獄功能，使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出現之後，就有僧人和佛教的俗家信徒在墳墓旁側樹立經幢。不過，它之所以被置於墳域，也不是很突兀的。最晚從北魏開始，就有佛教徒在墓旁建塔，爲亡者祈福；經幢流行以後，由於經幢的性質是塔，其上刻有佛經，所以是一種「法舍利塔」，[10] 加上經幢上所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強調破地獄功能，因此有人開始在墓域建幢。至於僧人原有塔葬或建塔的習俗，隨著在墓域建幢風氣的流行，有的僧人即在墳旁或塔側樹立經幢；後來更將荼毗後的遺骨置於經幢之內，成爲「舍利經幢」，也就是把經幢當作墓塔使用。

（一）佛教的地獄思想與墓幢的建立

中國人接受佛教以來，對於死後世界和境遇的觀念，有了重大的改變；從漢初人們視死後世界幾爲人世的翻版，到六朝時轉化成兩個極端：佛國淨土的妙樂和地獄的恐怖。原來漢朝人的觀念裡，以爲人們死後是歸於所謂「黃泉」的地下世界，那裡一如人間世，有國主和官僚系統的統治；而其地的生活也有如活著的世界，雖然有賦役的重擔，但也有日常生活中的車馬出行、歡樂飲宴和歌舞妙曼。[11] 佛教傳來之後，它根本教義中的三世因果報應和六道輪迴的思想，逐漸地

---

[9] 唐・佛陀波利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967〕，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冊），頁351中。

[10] 關於經幢的性質是塔，參見拙文，〈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頁698-708。

[11]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5），頁92-93。

滲入人心。東漢桓、靈帝時來華的安息沙門安世高就翻譯了三部和地獄有關的經典：《佛說十八泥梨經》（大・731）（泥梨即地獄）、《佛說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大・724）和《佛說鬼問目連經》（大・734），靈、獻帝時東來的康巨翻譯的《問地獄事經》一卷，[12] 對地獄的情況都有詳細的描述。其後，兩晉南北朝時期譯出有關地獄的經典共有十餘部之多。[13] 其中，《問地獄事經》一直到中唐時期，都是流傳甚廣的一部地獄經典，在梁代僧人僧旻、寶唱所撰的《經律異相》，和唐代僧人道宣所編的《法苑珠林》二書的〈地獄部〉中，對閻羅王、獄主名字和諸地獄的敘述，有多處皆引此經。[14] 初唐時，還有僧人宣講這部經典，《續高僧傳》裡敘述唐太宗貞觀年間，洛縣（今河南洛陽市東）有一位叫做名策的僧人驟然死亡，見到閻羅王，告訴他地獄罪人很多，應該爲他們誦咒，並且請益州淨惠寺惠寬法師講《地獄經》。他死而復甦後，便即刻從洛縣趕往綿竹（今四川綿陽縣）請惠寬法師講說此經。[15] 其他影響較大的地獄經典有：西晉時法立和法矩共譯的《大樓炭經》（大・23）、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所譯的《長阿含經》（大・1）、姚秦鳩摩羅什譯的《大智度論》（大・1509）和《十住毗婆沙論》（大・1521）、東晉佛陀跋陀羅譯的《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大・643）、僧伽提婆譯的《三法度論》（大・1506）、隋代僧人譯的《起世經》（大・24）等經。[16] 此外，五世紀下半葉中國僧人撰述的一部經典——《淨度三昧經》，[17] 對地獄思想的傳播，也起了相當的作用。[18]

---

[12] 梁・慧皎，《高僧傳》（〔大・2059〕，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卷一，譯經上，〈支樓迦讖傳附支謙、康巨等傳〉，頁324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大・2034〕，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九冊），頁34。

[13] 蕭登福，《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臺北：學生書局，1989），頁175-203。杜斗城，〈《地獄變相》初探〉，《敦煌學輯刊》1989.1：74-75。

[14] 梁・寶唱等集，《經律異相》（〔大・2121〕，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三冊），卷四十九，地獄部，頁258下-260中，267上-268中。唐・道世，《法苑珠林》（〔大・2122〕，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三冊），卷七，地獄部。

[15] 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大・2060〕，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卷二十五，習禪六，〈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頁601上。

[16] 此係《經律異相》卷四十九，地獄部；《法苑珠林》卷七，地獄部，所引述的經典。

[17] 牧田諦亮，《疑經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第六章〈淨度三昧經とその敦煌本〉，頁247-249。

[18] 《經律異相》卷四十九，地獄部；《法苑珠林》卷七，地獄部。

佛教的教義中「行惡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19] 經由前述經典的流傳和僧人的宣說傳揚，對於地獄的恐懼遂漸漸浸透人心。如梁代僧人慧皎在《高僧傳》〈唱導篇〉傳論中，描繪唱導師在八關齋會中宣講佛理，「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20] 東晉佛教徒郗超〈奉法要〉一文中，述及因果業報時，提到了「地獄苦酷」。[21] 另外，某些佛寺壁畫中也繪有駭人警世的「地獄變相」圖，如北朝末年著名的僧人靜藹出身北朝名族，宿習儒業，因爲和同伴共遊佛寺，看到地獄變圖，悚然心驚，極爲震駭，爲了免於地獄的苦酷，而出家爲僧。[22] 唐玄宗時代的名畫家吳道子在長安景公寺畫的「地獄變相」圖，極爲生動逼真，令人看了之後心生畏懼，發心修善不敢殺生，一時之間，長安城裡東、西二市的魚肉都賣不出去。[23] 唐代初年以後，佛教地獄思想的流布更廣，墮入地獄的恐懼可以說是深入人心，這一點可以從六朝志怪和唐代的筆記小說中，出現了許多敘述死後入地獄的故事，即可見其一斑。因此，如何消除宿世罪業，以及得脫地獄之苦，就成爲人們最深切的關懷之一。

由於以上的原因，唐初譯出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同時具有消除罪業和免除地獄之苦的功能，很快地就成爲最受歡迎的佛典之一，信徒們一方面讀誦其中的「尊勝陀羅尼」，以期滌除罪障、不歷地獄之酷辛；另一方面也在各地的寺院、交通要地建立刻有此經的石幢。雖然在經文中並沒有提到可以將它樹立在墳側墓旁，但由於強調「佛頂尊勝陀羅尼」具有破地獄的功能，[24] 因此它便爲人置放於墓側墳域，希望能夠拯濟亡者免於地獄之苦。在經幢上的〈序〉、〈贊〉或〈銘〉，屢見破地獄的文詞，唐代河陽縣（今河南孟縣）有一佛寺「招提淨院」

---

[19] 《高僧傳》卷一，譯經上，〈康僧會傳〉，康僧會答吳主孫皓語，頁325下。

[20] 同前書，卷十三，唱導，頁417下。

[21] 《全晉文》，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卷一一〇，頁2091上。

[22] 《續高僧傳》卷二十三，護法，〈周終南山避世釋靜藹傳〉，頁625下。

[23]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二一二，畫三，頁1622，吳道玄：「又景公寺老僧玄縱云：『吳生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

[24] 長部和雄，《唐代密教史雜考》（東京：溪水社，1990），二〈不空以前的密教之一〉，頁33；並見拙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頁152-153。

中的僧人，率同寺院信徒共同建立一所經幢，刻在其上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讚并序〉云：

> 哦此眞言，淨生死障，碎地獄閘，拔□惡之趣，□無爲之地，是殑伽佛說如來智印之所爲也。摩尼眞寶，未足同其功；日焰照徹，豈得等其妙？實救苦良藥。[25]

至於置於墳域的墓幢，也多提到破地獄的作用，如中唐時擔任侍中之職的韓國公苗晉卿 (685-765) 生前囑咐家人，以身後喪葬費用之餘爲他做功德，其子潁川公遂爲其建造一所經幢，請獨孤及 (725-777) 撰〈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贊并序〉云：

> 墨點之界有極，鐵圍之山有壞，惟梵音與法印，等空虛而無窮，則公之前際，疇可彌度。其辭曰：
>
> 六趣輪轉，根塵相刃。死生變化，如響如瞬。何用拯濟？總持秘印。道罔不在，宏之者人。乃經靈幢，公子之因。贊持大力，啓迪迷津。天魔遁形，地獄開門。拔箭解縛，如日破昏。韓公善根，與石長存。[26]

由上可知，墓幢的建立和佛教的地獄思想有密切的關連。

（二）從墓前建塔到墓前建幢

早在北魏時就有佛教徒在墓旁建塔，作爲追福之用。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 (524) 七月二十五日去世的蘭倉令孫遼，係葬在洛陽平樂鄉的墳地，並有墓誌一方隨葬。[27] 由於他生前修齋持戒，虔誠事佛，因此他的兒子們遂在其墓旁建立一所浮圖（塔），爲他祈求冥福，其銘曰：「構茲寶塔，掇此遺塵，崇功去劫，樹善來因，舟壑雖改，永□天人。」[28] 到了唐代，建塔於墓側之風仍存。一九七六年在河南洛陽徐村西北，出土了一所神龍二年 (706) 建造的方塔，其上題記稱此

---

[25]《唐文拾遺》卷六一，闕名，〈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讚幷序〉，見《全唐文》第十一册，頁11062下。

[26]《全唐文》卷三八九，獨孤及，〈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贊幷序〉，頁3957下。

[27]〈故蘭倉令孫府君墓誌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編號18487。

[28]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孫遼浮圖銘〉，頁147-148。

是盧氏崔夫人墓，於武則天長壽四年（695，此年改元爲證聖）權厝於此，並註明墓地四至的範圍，可知這是樹立在墓地上的塔。又，一九七三年在洛陽郊區邙山鄉徐村東北，也出土了一密檐式七級造像方塔，從其出土地是唐代洛陽邙山墓葬區，可知此當是樹立在墓域的塔。[29]

初唐時期，人們沿襲著北魏以來在墳域建塔追福的風氣，有時候也在墓域建造佛像碑爲亡者祈福。一九七四年在洛陽徐村北出土的一個造像碑，高114厘米，正面鑿一龕，內刻觀世音菩薩像。在此像龕的左側下方，刻有題記：

> 大唐永徽五年歲次甲寅，洛州河南縣郟鄏鄉宜春里故人王君才，其年三月朔日崩，春秋六十有三。長子普賢等，敬造救苦觀世音菩薩一軀，唯願亡考、法界群生，神生淨土，面奉彌陀，寧願解脫三途八難，俱登正覺。永徽六年三月一日建立。[30]

由上可知，這是爲追薦先亡、樹立在塋地內的造像碑。前此的造像碑有爲亡者祈福而建造的，但都是放在寺院、交通要道、高山上，而未見置於墳地者。

以經幢取代墳塋的塔，和初唐以後地獄思想的流行有關。在龍門後山一帶，出土了一所武則天長安三年 (703) 安思泰爲其亡父母所造的浮圖，塔基右面刻銘文並序，文云：「敬造靈塔，式報先亡，永謝三途，長歸八正。」左面刻《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願□□□□頂□□經》，經文中說：「有能誦此一佛二菩薩名者，得離生死苦，永不入地獄，恆遇善知識；有疑有難者，誦經千遍，即得解脫。」[31] 可知這時候人們已開始重視死後不入地獄的祈願。由此看來，其後以強調破地獄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取代墓旁的石浮圖，其實是有軌跡可尋的。

迄今所知，最早的俗人墓幢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年 (732) 四月九日，安興宗兄弟三人將其亡父安孝臣、亡母同葬於洛陽邙山時所建的墓幢，其上題記云：

> 惟靈生母塋內，敬造尊勝石幢，高二丈五尺。又就墓所寫花嚴經一部，願靈承塵霑影，往生淨土。[32]

上文云「願靈承塵霑影，往生淨土」，根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只要將書寫

---

[29]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徐村發現一批唐代石刻造像〉，《中原文物》1984.3：57-58。

[30] 同前文，頁56-57。

[31] 張乃翥，〈跋龍門石窟近藏長安三年、大中六年之幢塔刻石〉，《敦煌研究》1998.1：24。

[32]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吳綱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二冊，〈大唐故翊麾副尉、澤州太行鎮將、騎都尉安府君（孝臣）之墓誌銘幷序〉，頁503。

著「尊勝陀羅尼」的絹帛置於高幢、高樓或塔上，人們「於幢等上或見、或與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羅尼幢等上塵，落在身上」，此人所有的罪業悉皆消除，本來因其罪業應墮惡道——地獄、畜生、閻羅王界、餓鬼界、阿修羅身，都可不受。[33] 這也就是《尊勝經》最爲人讚嘆稱道的「塵沾影覆」神妙之處。

唐肅宗上元二年 (761)，僧人志遠爲先前在開元二十年去世的母親上官大娘建立墓幢一所，因《尊勝經》有「塵沾影覆」的功效，所以此幢上的題記稱「措葬於影幢之側」。[34]

有趣的是，墓幢是可以重複被使用的。一九九四年在洛陽龍門西山南麓出土的一所陀羅尼經幢，僅存八角形幢身，高110厘米，第一至三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咒」，第四面刻「貞元九年二月十五日安二娘爲亡夫董瞻敬造」，原是安二娘爲其夫所建的墓幢。然而，從此幢第七面卻刻著雷氏買地記：

> 河南府河南縣龍門鄉南王村買塋地一所。……大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立石幢，妻雷氏奉爲亡夫衛府君建立。孤子郎哥、弟堅郎、看塋人楊萬慶。[35]

很明顯地，此一墓幢是唐德宗貞元九年 (793) 安二娘爲其亡夫董瞻樹立的墓幢，在半個世紀之後的宣宗大中六年 (852)，又被雷氏爲亡夫追薦冥福而重新刊用。

從唐武宗會昌四年 (844) 李潛在洛陽爲其父建墓幢，可以得知人們樹立墓幢不僅是爲亡者祈求冥福；同時，對於生者而言，也可因爲亡故的親人建立墓幢，使其免於惡道諸苦，而得到些許的慰藉：「聞西方教有佛頂尊勝真言，可以福薦神道，是用購集鐫刻，謹立於封樹前二步。冀清淨塵露（霑）之語，上爲冥祐，下則微蠲終天之苦。」[36]

（三）咒石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原來是在八面的棱形石柱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包括經文和陀羅尼（咒），通常也兼刻僧人志靜所撰、敘述此經傳來和翻譯

---

[33]《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頁351中。

[34]《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七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四十七，頁六，〈僧志遠造幢記〉。

[35] 張乃翥，〈跋龍門石窟近藏長安三年、大中六年之幢塔刻石〉，頁25。

[36]《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二十六，〈李潛尊勝幢記〉。

過程的〈經序〉，總計長達三千餘言。不過，墓幢或塔幢有一種形式是僅刻此經陀羅尼部分的「咒石」。

咒石的形制是在一方石板上，僅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中的陀羅尼（咒）；原先是將「佛頂尊勝陀羅尼」附刻在塔銘上，後來則把專刻此咒的石刻放置在墳墓內。開元二十六年 (738) 七月十五日，僧人了緣在鄧縣圓寂，鄧縣縣令王叔通爲其撰寫的塔銘上，便附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咒」。[37] 一九八三年在陝西高陵縣出土了一方咒石，長40、寬31、厚8厘米，這是唐玄宗天寶二年 (743) 十月二十四日，沙門辯才爲其師——長安萬善寺比丘尼堅固所建的刻石，題爲「京萬善寺故大德比丘尼堅固勝神道咒石」，後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咒」，並記：（圖二）

弟子辯才罄捨衣鉢，奉爲故和尚敬崇靈塔，虔勒咒文，用明遠載。[38]

和此咒石同時出土的是一件漢白玉石料所製的寶葫蘆形之物，其中可能藏有比丘尼堅固的靈灰。[39] 塔是埋藏僧人遺骨或遺灰的處所，故此石題記稱「奉爲故和尚敬崇靈塔，虔勒咒文」；尊勝陀羅尼經幢稱之爲「勝幢」；[40] 辯才係將此一小型的靈塔埋入土中，並造神咒刻石共藏，此稱該石爲「勝神道咒石」。其後，這種咒石的形式也爲俗人所採用，如天寶三載 (744) 二月十五日在長安建立的一所經幢上，同時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和「佛說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神咒」。[41]

這種放在墳域、刻有「尊勝咒」的咒石，後來也常被置放在墓葬中。一九九五年在四川成都一所五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方長方形（高31.7、寬11.2、厚7.5厘米）的石刻，上面共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文311字，其後並刻「解冤結真言」、「往生淨土真言」和「安土地真言」；惟真言的字體較咒文小，也較不規

---

[37] 同前書，卷五十六，頁十八，〈了緣和尚塔銘〉。其塔銘多渤，見《唐文拾遺》（《全唐文》第十一册），卷二一，王叔通〈唐故了緣和尚靈塔銘幷序〉，頁10600。

[38] 董國柱編，《高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8, 116。

[39] 同前書，頁116-117，編者按語云：「此石爲方形小品，如同塔銘，卻幷不記載生平；……神道石似乎是埋入地下如同墓志者，……與咒石同時出土的有漢白玉石料作寶葫蘆形一物，高15厘米，底徑8厘米，未知是否爲咒石中所提到的“靈塔”。」

[40] 拙文，《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頁645-646。

[41]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四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卷七，頁三。

整。[42] 此一咒石的作用和前述「勝神道刻石」相似。又，它在「佛頂尊勝陀羅尼」之外，並刻其他咒言，這一點則和後來墓幢的發展頗爲一致。北京出土的遼道宗壽昌三年 (1097) 董庠墓中，同時出土了一方石刻，上有「滅罪真言」、「智矩如來破地獄真言」、「生天真言」。[43]（圖三）

（四）僧人墓幢

僧人墓幢的發展是從將「佛頂尊勝咒」附刻在塔銘上，漸漸發展成爲在塔前建幢和墳前建幢。唐宣宗大中二年 (848)，河陽縣觀心寺比丘尼惟徹遷化，葬在河陽縣鹽坎北坡，她的三個弟子在其墳前樹立了一所尊勝石幢，其上刻〈唐觀心寺禪律故尼大德墳前尊勝石幢記〉，其讚詞云：

> 陁羅尊勝，諸佛秘門。破諸地獄，能離垢塵。建資幢讚，用濟幽魂。巍巍不朽，萬古千春。[44]

中唐以後，某些僧尼甚至指定門徒在其死後爲之建立墓幢。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818) 遷化的長安龍花寺比丘尼韋契義，在病篤時囑咐弟子要在其墓旁樹立尊勝經幢：

> 但營小冢，傍植勝憧，矧諸經秘藏，如來智印，盡在此矣。每憧影暎身，塵流點物，能淨惡道，俾登菩提。[45]

出家的僧人尼師遺命門人在其墳旁樹立尊勝經幢，用以取代塔葬，有以下幾個理由：

一、自覺己身的德行道化還不夠建塔的資格，故不建塔而樹幢。根據佛教的經典，僅有八種身分得以起塔：如來、菩薩、緣覺、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輪王；[46] 雖然如此，印度從紀元前三世紀開始，就有爲瘞葬僧人屍骨建塔

---

[42]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五代墓出土尊勝陀羅尼石刻〉，《四川文物》1999.3：101。

[43] 劉耀輝，〈北京遼墓初探〉，《北京文博》1999.4：73-74。

[44]《唐文拾遺》卷六一，闕名，〈唐觀心寺禪律故尼大德墳前尊勝石幢記〉，見《全唐文》第十一册，頁11057。

[45]《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十一至十二，〈龍花寺尼韋契義尊勝幢記〉。

[46]《法苑珠林》卷三十七，敬塔篇第三十五，引《十二因緣經》，頁580上。

者；[47] 至於中國則從四世紀初，就有僧人的弟子或信徒爲其故師建塔，[48] 因此到了唐・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中，就有以下稱述：「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49] 也就是說，佛教界已經認可了有德行的僧尼或俗人，都可以起塔。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有一部分的佛教僧俗人士仍然認爲宜遵奉佛典，如前面提到的龍花寺比丘尼韋契義不肯在身後建塔的理由是：

> 乃語門人曰：「聖賢湛入無餘，建窣堵波者，吾不堪任；且埏埴之時，糜耗蠢蠕，非願爲也。」[50]

又，後晉高祖天福八年 (943)，有一位大師圓寂後遷葬虎跑寺，高祖原來特別在寺內建造一所堂院，擬爲之建塔，但後來念及佛教的戒律：「非果位即無立浮圖之理」，於是改建石幢。〈虎跑寺經幢〉云：

> ……上柱國思憲遷窆於此，國恩以大師□□功深，道業彌著，特造院宇，將建石塔，以光不朽。爰准敕文：非果位即無立浮圖之理，乃議建石幢，聖旨俞允。[51]

二、僧徒的慈悲心，不願在建塔時挖土傷及蟲蟻，即上面提到的比丘尼韋契義所說的：「且埏埴之時，糜耗蠢蠕」。

三、不勞人傷財。穆宗長慶四年 (824) 二月十三日，洛陽臨壇開法大師如信在聖善寺華嚴院圓寂，他的遺體可能先採取捨身血肉的露屍葬，[52] 至寶曆元年 (825) 時，將其遺骨火化，祔葬龍門奉先寺先師塔廟。他生前囑咐門人爲他簡單營葬，並且在墓穴上樹立一所經幢：

---

[47] Gregory Schopen,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204-237.

[48] 如曹魏時西行求法的僧人朱士行 (203-282)，西晉時去世，就是欲骨起塔而葬的，（《高僧傳》卷四，義解一，〈朱士行傳〉，頁346下）東晉時竺法輔也是起塔而葬，（同前書，卷五，義解五，頁355中）東晉孝武帝爲竺法義買地起塔而葬（同前書，卷四，義解一，〈竺法義傳〉，頁350下）等。

[49]《法苑珠林》卷三十七，敬塔篇，頁580上。

[50]《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十一至十二，〈龍花寺尼韋契義尊勝幢記〉。

[51]《唐文拾遺》卷六一，闕名，〈虎跑寺經幢〉，見《全唐文》第十一册，頁11060下-11061上。

[52] 拙文，〈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大陸雜誌》96.1-96.3(1998)。

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陁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累，門人奉遺志也。……[53]

四、在墓旁樹立經幢，不但自己可以不墮惡道，尊勝經幢塵沾影覆的神效，還可利益墳域附近的幽魂，以及接近此幢的眾生。如前述洛陽長聖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遺命死後建墓幢，並且說：「願依幢之塵之影，利益一切眾生，吾願足矣。」[54] 智如墓幢的造幢記是著名的文人、也是虔誠的居士白居易撰寫的，他是智如的弟子，在此幢記後有一偈云：

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55]

另外，穆宗長慶四年 (824) 在洛陽聖善寺圓寂的臨壇開法大師如信的墓幢上，有白居易撰寫的〈如信大師功德幢記〉，其偈言讚云：「……師之闍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以眾共之。」[56] 即說明了當時認爲在墳域建幢，可以將塵沾影覆之效和其他人或眾生共享，所以稱爲「功德幢」。

五、墓幢上的經文咒語還可供人讀誦。〈虎跑寺經幢〉云：「尤是鐫大佛頂陀羅尼、大隋求神咒，屹標翠琰，遍列金文，作佳城之福田，與世人之恭□，或諷讀、或頂瞻，勝利長存，果報無極。」[57] 這可以解釋爲什麼有些墓幢上的陀羅尼還注有讀音，至於誰會讀墳域墓幢上的咒語文字呢？按：佛教所拯救濟渡的對象係包括一切眾生：不惟是路過的龍天鬼神、地上的山精木怪、墳場的幽靈鬼魂、飛禽走獸，乃至於蟲蟻蚊蚋；因此，墓幢作爲功德幢，利益均沾於眾生，所指的不是一般的世人，而是各類的眾生，也就是在造像記或造幢記上常見的祈願「一切有靈含識，咸同斯福。」

僧人的墓幢之中，有僧人生前囑咐門人建造者，還有門人自行爲先師建立，以及僧人在世之時爲自己預修的墓幢。覺悟寺講四分舊疏教授大德常政大師的弟子們，在唐憲宗元和四年 (809) 爲其師預先建造一所墓幢，至元和十二年 (817)

---

[53]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六八，〈如信大師功德幢記〉，頁3658-3659。

[54] 同前書，卷六九，〈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頁3731-3732。

[55] 同前註。

[56] 《白居易集箋校》卷六八，〈如信大師功德幢記〉，頁3658-3659。

[57] 同註51。

二月，常政大師示寂後，才「法葬」（依釋氏之法）於此幢下或幢側。[58] 由於僧人墓前建幢已逐漸形成風氣，有的僧人或恐死後無人爲之建幢，或者怕勞煩他人，他們甚至在生前先造好墓幢。如唐穆宗長慶元年 (821)，涇陽縣三個僧人義肅、義倫、義端等在仙同鄉先代和尚塔院處，預先修造尊勝陀羅尼幢一所，上面僅刻「尊勝咒」。[59] 又，在今洛陽龍門文物保管所收藏的經幢之中，有一所是聖善寺僧人懷則在世時爲自己預修的墓幢，在此幢上刻有比丘義川所撰的〈唐東都聖善寺志行僧懷則于龍門廢天竺寺東北原勤先修塋一所敬造尊勝幢塔并記〉：

有則上人先修塋內，立尊勝幢幷鐫陀羅尼，利濟幽冥，益沾法界。[60]

此一經幢上除了「佛頂尊勝陀羅尼」之外，還刻有「心中心真言」、「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和「大輪金剛陀羅尼」。宋徽宗政和元年 (1111)，青州水陸寺資聖禪院前住侍僧文緒，也爲自己先行建造一所墓幢，上刻「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61]

另外，僧人墳域也有造塔並且建幢者，這種風習最晚是從五代就開始了，後唐明宗長興三年 (932)，河南府洛陽福善坊居民張思柔之妻田氏，爲亡祖所建造的墓幢上的題記，就敘及有在舍利塔前立幢者：

若書鐫於寶幢之上，或立在舍利塔前，施禮佛影者，罪滅福增，況土霑身者，生天壽樂。……[62]

在墓塔前建幢的例子，如遼道宗大康三年 (1077)，在今北京西山戒壇寺有一所爲故壇主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大師所建的經幢，就是樹立在其墓塔前。這是由於其僧俗弟子在他圓寂後，爲其建塔，猶難抑哀思和追慕之情，爲了報答師恩，所以又在其墓塔前樹立經幢，其記稱：

伏自我故壇主大師，能事既周，化緣忽盡。四生孺慕，號咷如喪於所天；七眾心摧，擗踊疑無於厚地。雖實棺備禮，白氈送終，尚增難捨之哀，莫

[58]《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六十六，頁三十一至三十二，〈維僧惟等經幢〉。

[59] 同前書，卷六十六，頁三十六，〈涇陽縣經幢〉。

[60] 張乃翥，〈龍門藏幢讀跋兩題〉，《敦煌研究》1989.2：27-28。

[61]《益都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三，頁八至九，〈宋僧文緒陀羅尼石幢〉。

[62] 塚本善隆，〈引路菩薩信仰と地藏十王信仰〉，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七卷・淨土宗史・美術篇》（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頁330。

抑無窮之戀，遂當遺塔前建勝幢。仰憑佛印之大威，上答慈雲之巨蔭。庶茲塵影，俱變光明，嚴因地而速見法身，滿果海而長爲佛事。今德滋等共思追遠，所集至徵，豈能必報深恩，聊用表其誠意。[63]

在墓塔前建幢，彷彿俗人在墳前樹幢之意。（見下文）又，如遼天祚帝天慶四年沙門積祥等爲其師清睿大師所造的經幢，也是在塔側建幢：「又選日琢石爲塔，瘞靈骨焉。又豎之以銘幢，刻尊勝陀羅尼咒於其上，取塵影之利也。」[64]

上述有不少僧人是在生前預造墓幢，至於俗人也有爲自己預修墓幢者。宋太宗時青州別駕李恕就是其中之一，宋太宗雍熙四年 (987) 那一年，他已經八十五歲了，念及其祖墳皆在孟州氾水縣東原，自認年事已高，無法活著回到家鄉，所以先爲自己修造墳墓，並且在墓旁樹立一所尊勝經幢。[65]

（五）舍利經幢

中古僧人處理遺體的方式有土葬、火葬，還有露屍葬（林葬和石室瘞窟），[66]以上三種形式的葬法，都有建墓幢者。僧人的墓幢從在墳旁、塔側樹立經幢，後來更將僧人遺骨葬在幢下，成爲「下藏舍利，上建經幢」的墓幢。[67] 筆者在他文中已舉數例說明有些經幢內是藏有舍利的，[68] 從九世紀中，就有僧人建立這種埋藏遺骨的經幢，但到十一世紀才正式出現「舍利經幢」這個名詞。由於舍利經幢的作用和性質已經和塔很相近了，後來更出現「塔幢」的名稱，或者直稱爲「塔」。

從洛陽長聖寺缽塔院主智如和尚墓幢上的幢記，可以得知：至少在九世紀初時，缽塔院的僧人在死後建立舍利經幢，已經成爲一種傳統了。大和八年 (834) 十二月二十三日，院主智如和尚圓寂示滅，次年正月十五日，移窆於龍門祖師塔院——他可能是採取石室瘞窟的露屍葬法，至開成元年 (836) 火葬其遺骨，遷祔

---

[63]《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頁十五，〈京西戒壇寺陁羅尼幢幷記〉；《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下，〈爲故壇主傳菩薩戒大師特建法幢記〉，頁383。

[64]《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沙門積祥等爲先師造經幢記〉，頁644。

[65]《益都縣圖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七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卷二十七，頁五十六至五十七，〈李恕經幢〉。

[66] 拙文，〈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石室瘞窟——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二〉，《大陸雜誌》98.2、98.3(1999)。

[67]《益都金石記》卷二，頁三十四至三十五，〈宋石佛禪院大德行狀石幢〉。

[68] 拙文，《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頁700-702。

於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尙茶毗幢記〉云：

> 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陁羅尼經》一幢，實吾茶毗之所。」[69]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 (908) 六月十四日，僧人德□收取其師普明大師宏哲火葬後的遺骨，在洛陽的長壽寺建幢安置，「遂收舍利於灰中，建幢壘於山寺。」前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後記宏哲行狀，[70] 這也是一所舍利經幢了。

像這種「下瘞靈軀，上安幢記」的墓幢，一直要到十一世紀才正式出現「舍利經幢」的名稱。宋仁宗慶曆八年 (1048) 以後，在河北獲鹿縣建立之清公大師的舍利經幢，第一面明白地題此幢爲「特□□講經論賜紫清公大師建舍利陁羅尼經幢」。[71] 又如金世宗大定二十年 (1180) 十月一日，僧人順道等數百人爲其師廣惠大師，在河北正定龍興寺東禪院樹立了一所經幢，額題：「大金國河北西路真定府都僧錄改授廣惠大師舍利經幢銘」，在其上並刻有〈鎭陽龍興寺河北西路都僧錄改授廣惠大師經幢銘并序〉，敘述廣惠荼毗之後，獲得很多舍利，「門人捧靈骨，附古塋葬之」，其銘云：「荼毗有終，舍利無極；地久天長，師名翼翼。」故可知此幢下確是埋藏著廣惠的舍利。[72]

在宋代以後，有些僧人傾向以建立舍利經幢取代在墓域樹幢或建塔，有以下兩個原因：一則如前所述，根據佛典少有僧人可以建塔的，而經幢的性質是塔，可視之爲塔的另一種形式；同時其上刻尊勝經咒，又具有塵沾影覆的滅罪功能。二則舍利經幢上也可刊刻僧人行狀，以資紀念。遼道宗時代今河北新城縣衣錦鄉的佛教徒劉清等人建立一所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其內藏有古佛舍利，在其造幢記中便說明了他們之所以建幢，而不起塔，是因爲起塔不如建幢的功能多：

> 若起塔則止藏其舍利，功德惟一。建幢則兼銘其秘奧，利益頗多。況塵颺影覆，惡脫福增，豈不謂最勝者歟？[73]

---

[69]《全唐文》卷六七六，〈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頁6903上。《白居易集箋校》卷六九，頁3732。

[70]《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十九，頁一，〈長壽寺宏哲尊勝幢記〉。

[71]《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八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十三，頁五至八，〈清公大師舍利陀羅尼經幢〉。

[72] 同前書，卷十四，頁十一至十二，〈龍興寺陀羅尼經幢幷廣惠大師銘〉。

[73]《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上，〈特建葬舍利幢記〉，頁351。

這個道理也可以用來解釋僧人建立舍利經幢的緣由。

此外，舍利經幢上還可刊刻僧人的德行事蹟，以示後人，如遼天祚帝天慶六年 (1116) 四月二十七日，在今河北省房山縣張坊鎮張坊寺所建的正慧大師舍利經幢云：

> 噫！自古前賢，凡有德者，過世已後，蓋採貞珉，造於幢塔，置在先壠。上□□佛頂尊勝陀羅尼，用薦去靈幽冥之福祐；及標遺行，以授後人。或子或孫，逐禩依時，具禮備於珍饌，何□召祐今人求□久降赴。然後被讀斯文，足知我先人所附，名品高位，萬代仍存，而爲眼□如茲。[74]

前述〈廣惠大師經幢銘并序〉中也說：「門人順道恐湮師跡，特建經幢，執師行狀，揮涕蘄文。」[75]

（六）塔幢——塔和幢漸趨等同

事實上，僧人在建造舍利經幢時，已經將它視之爲塔，有的舍利經幢上的題記遂直稱爲「塔」。前面提河陽郡長澗縣的一所經幢上的銘記，就說：

> 何法可以消災殄殃、長福利？或曰：「佛頂眞言，不可思議，窣堵波塵，尚能代罪。」居士皆言曰：「宜共建石幢乎？」人咸曰：「休哉」。[76]

按：《尊勝經》稱此陀羅尼有塵沾影覆的神效，可資滅罪消業，免除地獄之苦，這裡稱石幢上的塵埃爲「窣堵波塵」，即將經幢視爲塔。

遼道宗大安七年 (1091) 四月十一日，今河北固安縣僧人廣宣法師遷化，他的三位門徒建立經幢，以埋藏其遺骨，在八面的經幢上，六面刻陀羅尼，兩面刻塔記云：「刊貞珉以爲塔，上鐫秘語」。[77] 又，遼天祚帝乾統四年 (1104) 在河北安次縣大五龍村所建的傳戒法師法性墓塔，係法性的弟子「乃命匠卜地於當寺舊塋內，建立石塔一座，中藏靈骨，上列諸雜陀羅尼，功德資薦。」[78] 按此塔八面刻有文字，先經後記，是一所經幢，而內藏法性遺骨，故屬舍利經幢，但在其

---

[74] 同前書，天祚編，〈懺悔正慧大師遺行記〉，頁658。

[75]《常山貞石志》卷十四，頁十至十三，〈龍興寺陀羅尼經幢幷廣惠大師銘〉。

[76]《唐文拾遺》卷六一，闕名，〈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讚幷序〉，見《全唐文》第十一冊，頁11062下。

[77]《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下，〈廣宣法師塔幢記〉，頁435。

[78] 同前書，天祚編，〈安次縣正覺寺傳戒法師法性塔記〉，頁542-543。

上的銘記卻說「建立石塔」一座。

遼天祚帝乾統四年，沙門道沖爲亡母所造的經幢，即稱「新建石塔壹所」，其塔八面刻，先經後記。[79] 遼天祚帝乾統七年 (1107) 在今河北安次縣大悲寺地所建造的寶勝寺僧玄照墳塔，事實上是一塔幢，八面刻，先經後記，但其記中則稱：「特建石塔一所，上刻粹容，旁刊密印。所願承此影覆塵霑之塔，轉超聖位。」[80] 另，乾統七年在北京房山雲居寺所建的辯正大德石塔，八面刻，先經後記，實際上也是一所經幢，而其記文中稱之爲「石塔」。[81] 遼天祚帝乾統八年 (1108)，爲先師志延所造的經幢上的題記則說造「尊勝陀羅尼塔子一座」，[82] 意即尊勝陀羅尼經幢，也是以「塔」取代經幢。

金完顏亮天德二年 (1150) 十月十日，益都（今山東省青州市）長秋鐵佛院住持僧人普行，爲故比丘僧慧興建的塔幢，上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佛頂尊勝陀羅尼啓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並有〈益都府長秋鐵佛院建佛頂尊勝陀羅尼塔記〉，敘述比丘僧慧興的生平德行，也是稱之爲「塔」。[83]

有將塔幢稱之爲「石塔」者，經幢最早的稱呼是「石幢」，故「石塔」之稱其實是以「塔」取代「幢」字，後來經幢與塔根本混而爲一了，而出現了「石塔幢子」這樣的語詞。如遼道宗清寧六年 (1060) 所建的一所塔幢，其上即題「奉爲沒故和尙特建尊勝陀羅尼塔」，內文稱「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塔」。[84] 又，同年僧人志果等爲其師法瑩在北京房山小西天所樹的塔幢，即是八面的「佛頂陀羅尼經塔」。[85] 又，遼道宗大康二年 (1076) 可興爲其師建「尊勝悲心陀羅尼塔」。[86] 如遼天祚帝乾統六年 (1106) 沙門即空在河北涿州市所建的經幢，其上的題記更稱之爲「石塔幢子」。

此外，也有幢、塔連稱，如遼代在今遼寧朝陽縣口北營子出土的一所爲僧人

---

[79] 同前書，天祚編，〈沙門道沖爲亡母造陀羅尼幢記〉，頁546。
[80] 同前書，天祚編，〈寶勝寺僧玄照墳塔記〉，頁561。
[81] 同前書，天祚編，〈雲居寺辯正大德石塔記〉，頁570。
[82] 同前書，天祚編，〈爲先師志延造陀羅尼經幢記〉，頁581。
[83]《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八十一至八十六，〈廣化寺尼慧興塔記〉。按，依記文內容，當作〈廣化寺僧慧興塔記〉。
[84]《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上，〈奉爲沒故和尙特建陀羅尼塔記〉，頁298。
[85] 同前書，道宗編上，〈沙門志果等爲亡師造塔幢記〉，頁303。
[86] 同前書，道宗編下，〈可興篆建尊勝悲心陀羅尼塔記〉，頁381。

惠能所樹的經幢，其上便題「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塔」，[87] 亦即幢塔合一。

三、墓幢的形制和葬制

清末葉昌熾是最早注意到經幢的學者，由於他對經幢有特殊的偏好，故致力收集經幢拓本，在他撰述的《語石》一書中，有八則關於經幢的記載，向來被推崇爲對經幢最完整、簡要精闢的論述。他觀察到盛唐以後經幢製作上的一些變化，如製作由精趨簡，在經文上也由繁而約，在書法方面則有「每下愈況」等情形，有很深的感慨：

> 開天以後，製作漸簡。……
>
> ……天寶以前，皆棋子方格，雕寫精嚴，兼刻經、序、咒；不刻序者，不過十之三。單刻咒者，不過十之一。至唐末尚然。五代宋初，風氣日趨於陋，刻經者已寥寥無幾。或無經而有啓請，七字爲句，如偈如頌。馴至遼金，刻經者遂無一二。或於咒之前後，節書咒下經文首尾。如佛告帝釋云云，爾時世尊授菩提記云云，約不及百字。其經生書法，亦每下愈況，有自鄶之嘆。[88]

其實，他所注意到經幢這些「製作愈簡」、「由繁而約」的發展，都是盛唐墓幢流行以後所產生的變化，這些也正是多數墓幢的特點。由於墓幢是爲墓主所建，它的作用比較私人性，與早先樹立在寺院、通衢或高山上的經幢作用不同，所以無論是在規格方面、鐫刻的文字或放置的地點等，就產生了一些變化。以下分別就墓幢的規格、文字析論，並且探討墓幢和葬制的關係。

（一）墓幢的規格

墓幢的種類有：放在墓旁、塔側、墳墓內的墓幢，以及內置僧人骨灰的舍利經幢。墓幢一則是由造幢者爲其亡故的親人或師僧所建，通常由個人、一家一族或少數僧人出資建造；二則它是放在墳塋之旁的，有的甚至是放在墳墓裡面的，因此它的規格尺寸就較置於其他公共場所如寺院、通衢大道的經幢爲小；三則它

---

[87] 同前書，補編，〈惠能建陀羅尼經幢記〉，頁696。

[88]《語石・語石異同評》，頁272-273。

的目的主要是拯濟墓主，比較注重功能性，因此在製作上大都不求精緻講究。唐玄宗開元年間，墓幢開始出現之後，其規格通常較小，製作也較素樸簡單。由於葉昌熾討論經幢時，不曾將置於寺院、通衢大道的經幢，和置於墓域的墓幢作一個區分，而盛唐以後，墓幢的比例愈來愈高，因此，就整體來看，葉氏遂有前文所引「開天以後，製作漸簡」、「經生書法，亦每下愈況」的評語。其實，墓幢的屬性是私人的，故不講求細緻；然而就開元、天寶以後置於寺院和公共場所的經幢而言，則不但形體高大，而且精雕細琢。

經幢是八面的棱形石柱，高度不一，從一公尺左右，甚至有高達十幾公尺的，如河北趙縣陀羅尼經幢，高達18米，河南偃城彼岸寺石幢高12.18米；不過，一般以2米到4、5米高之間者居多。[89] 一般墓幢的高度顯然較小，通常在1米到2米之間，也有小於1米者。如洛陽龍門東都弘聖寺故臨壇大德真堅幢 (748) 高1.48米（缺幢座和蓋）；高克從墓幢 (848) 高1.61米。近年在洛陽出土的北宋范伯魚兄弟爲亡母趙氏所建的墓幢 (1126)，高1.49米（圖四），[90] 大理國彥貴趙興明亡母的墓幢 (1195)，高1.01米（圖五）；[91] 至於喀左顧杖子村出土的金代墓幢 (1185)，高僅0.7米（圖六）；四川西昌元梵文墓幢，高僅0.52米（圖七、八）。至於如一九九二年在遼寧朝陽縣聯合鄉金墓出土的墓幢通高2.4米，這樣高大的墓幢則是比較少見的。[92] 不過，少數高僧舍利經幢形體高大，這是因爲有門人信徒集眾人之力所成的；同時也因其多置於寺院之內，而非樹立在墳塚塋地的緣故。

（二）墓幢上的文字

原來經幢上所刻的文字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志靜的〈序〉和〈造幢記〉。隨著墓幢的出現，由於多數墓幢的形制較小，也難以雕鐫全部的經文和經序，因此有的僅刻此經的陀羅尼部分；又因其主要的目的是救渡墓主免於地獄、惡道之苦，故除了「尊勝陀羅尼」之外，有時也增刻其它的咒文。另外，由於墓幢原是爲墓主所建，因此也有簡單的墓記，分述如下：

---

[89] 關於經幢的高度，參見拙文，〈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頁647-654。

[90] 黃吉君，〈洛陽發現佛頂尊勝陀羅尼北宋墓幢〉，《中原文物》2000.2：78。

[91] 孫太初，〈大理國彥貴趙興明爲亡母造尊勝幢跋〉，《考古》1963.6：338。

[92] 遼寧省朝陽縣文物管理所，〈遼寧朝陽縣聯合鄉金墓〉，《華夏考古》1996.3：60-64。

1. 墓記

由於墓幢主要是爲解救墓主免於地獄和諸惡道之苦，進而可以生天，有特定的對象，必須交代墓主身分，因此多以墓記取代〈造幢記〉，包括以下幾種內容：

甲、敘述墓主去世的年月，或簡述墓主生平

此類的陳述有如墓誌銘，以代替一般經幢上的〈尊勝陀羅尼經并序〉，《八瓊室金石補正》云：「凡建幢塋所，恒述先亡行誼，冀得傳示後世，尙不失銘誌之意。」[93] 如唐大中年間，前□州衙內指揮□張□爲其妻所建的墓幢，上面的銘記主要是敘述其妻之生平，有若墓誌銘：

□薦至情，經幢斯建；磐石刊事，用紀歲時。[94]

唐僖宗乾符三年 (876) 瑯琊王氏墓銘經幢上，兩面刻〈唐故瑯琊王夫人墓銘〉，其餘六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呪」。[95] 宋神宗熙寧四年 (1071) 十月十三日，有一位名叫若濟的人，和他三個弟弟、一位姐或妹，共同爲其亡父母合祔於咸陽縣西丁村，並建立一所墓幢，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並記「長男若濟新婦姚氏、次男若升新婦鄭氏、陳氏，並同時葬」。[96] 這樣的墓幢，墓碑的性質很濃厚。

至於僧人的墓幢上，則刻有僧人的生平事蹟，高僧的舍利經幢上通常刊刻篇幅較長的僧人行狀。

乙、記載墓地的位置或塋地範圍

除了簡述亡者的姓名、逝世的年月外，有時候還附帶記載其墓地所在或墓地四至，有若買地券。在唐懿宗咸通七年 (866) 黃順儀爲女在其墓所樹立的墓幢上，則清楚地記載墳塋的地點和界域：

女弟子黃氏，號順儀，爲亡女練師廿二娘於塋所建造尊勝陁羅尼幢壹軀。意者伏願丞此影霑功德，離苦下脫，不墮三塗，往生淨土。其塋河南縣龍

[93]《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二十八，〈李潛尊勝幢記〉。
[94] 同前書，卷四十八，頁一，〈衙內指揮□張□尊勝幢記〉。
[95]《金石萃編》卷六十七，頁十五，〈瑯琊王氏墓銘經幢〉。
[96]《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三十六至三十七，〈若濟等尊勝幢題名〉。

門鄉午橋村地一畝，東西南北共貳伯肆拾步，東至張家墳，西至薛，南至李，北至薛。[97]

2. 經咒

葉昌熾《語石》云：「墳塔大都四面刻銘，四面刻咒。」[98] 墓幢的確多僅刻咒，而極少刻全部的經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文二千六百五十五言，志靜的〈經序〉七百二十八言，而陀羅尼僅三百二十六言。墓幢一般的形制較小，而此經中真正有威力神效，能夠發揮拯濟功能的部分，是此經的陀羅尼部分，因此，墓幢多僅刻陀羅尼，較少刻經文。另外，有的墓幢上除了「尊勝陀羅尼」外 ，也有兼刻其它相關經咒，或兼刻「啓請」和「跋尾」。

甲、僅刻「尊勝陀羅尼」

墓幢大都僅刻「尊勝陀羅尼」（尊勝咒），時代愈往後推移，墓幢在經幢中所佔的比例愈高，這從葉昌熾的統計即可顯示出來，他所蒐羅六百餘通經幢拓本，天寶以前，單刻「尊勝咒」的不過十分之一；到五代以後，多僅刻咒而不刻經；至遼金時期，刻經的比例僅佔十之一、二。[99] 由於墓幢上多僅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因此在幢上的額題也出現了變化，如唐大中年間，前□州衙內指揮□張□爲其妻所建的墓幢，題云：「佛頂尊勝陁羅尼真言幢」，[100] 意味著「尊勝陁羅尼」已經取代經文在經幢上的地位了，前此都是作「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并讚」。

乙、兼刻其他咒語眞言

由於盛唐以後密教經咒的流行，墓幢上所刻的陀羅尼也增多了；又由於墓幢的目的是爲了消除亡者的業障，免去其墮落地獄惡道之苦，所以在其上常兼刻消除業障、滅諸惡趣，或者是破地獄等作用的咒語真言，比較常見的有以下幾種：

---

[97] 同前書，卷四十八，頁十三至十四，〈黃順儀尊勝幢記〉。
[98] 《語石・語石異同評》，頁278。
[99] 同前書，頁272-273。
[100]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一，〈衙內指揮□張□尊勝幢記〉。

(1) 大悲咒

有不少經幢上兼刻《大悲咒》——即《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大・1064），此咒和「尊勝陀羅尼」的作用相近，《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1060）中稱：「若聞此陀羅尼名字者，尙滅無量劫生死重罪。」又說此陀羅尼亦名「滅惡趣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101] 宋代李恕所建經幢上，便將此二咒的功能等量齊觀：

蓋聞懷罪集福，莫急於尊勝陀羅尼、大悲心眞言。[102]

由於信徒將此二咒等同視之，甚至出現了「尊勝大悲幢」這樣的名稱，懿宗咸通九年 (868)，薛簫爲亡母追福所造的經幢，其上除了「佛頂尊勝陀羅尼」之外，也刻有「大悲心陀羅尼」和其他真言，而題云：「大唐咸通九年歲次戊子，孤子薛簫奉爲先妣清河縣君崔氏小祥追福，敬造佛頂尊勝大悲幢子。」[103] 後晉高祖天福七年 (942)，呂氏爲亡夫張敬思所造的墳幢，幢上並刻此二真言，記云：「孀妻呂氏特資捐建尊勝大悲陀羅尼幢」。[104] 又如後唐明宗天成三年 (928)，常庭訓爲其亡妻所造的經幢云：「夫常庭訓伏爲先亡妻孫氏發願造尊勝大悲幢子壹所。」[105] 又，宋太祖建隆元年 (960)，劉氏爲亡夫造的經幢上，即稱其所造的是「大悲尊勝□（陀）羅尼幢一所」。[106] 宋真宗景德二年 (1005)，郭重顯等人爲其父母所造的墓幢，上題：「奉爲考妣二靈，特就墳所東南隅建尊勝大悲經幢一所」，讚云：「故鐫尊勝，特寫大悲」。[107] 遼道宗咸雍三年 (1067)，天水郡人氏趙秀和其姪文祐，爲亡過父母所建的經幢，即是「大悲心陀羅尼幢」。[108] 又例，建於遼道宗壽昌五年 (1099) 僧人慈智大德的墓幢，題稱「故慈智大德佛頂尊勝大悲陀羅尼幢」。[109]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 (938) 花敬遷所建的經幢、宋仁宗嘉祐七年 (1062) 張師

---

[101]《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册，頁109中, 110上。
[102]《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五十七，〈李恕經幢〉。
[103]《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四，〈薛簫尊勝幢記〉。
[104] 同前書，卷八十，頁七至八，〈呂氏爲亡夫造尊勝大悲幢讚〉。
[105] 同前書，卷七十九，頁二十七，〈常庭訓尊勝大悲幢記〉。
[106] 同前書，卷八十二，頁一，〈劉氏爲夫造尊勝幢記〉。
[107] 同前書，卷八十二，頁二十九至三十，〈郭重顯等尊勝大悲幢讚〉。
[108]《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上，〈趙文祐造幢記〉，頁329。
[109] 同前書，道宗編下，〈慈悲庵慈智大德幢記〉，頁493。

皋所建的墓幢、[110] 宋太祖開寶七年 (974) 華州別駕杜承訓爲其父母所造的墓幢，[111] 都是除了「尊勝陀羅尼」之外，另刻「大悲咒」者。

(2) 破地獄眞言

在盛唐以後有大量密教經咒譯出，在墓幢中也出現了和破地獄有關的真言咒語。設若亡者不幸業障沈重，墮入地獄，還可經由破地獄的咒言解救。和破地獄有關的真言有：「滅惡趣真言」、「智矩如來破地獄真言」、「開喉真言」、「普賢菩薩滅罪真言」、「解怨結真言」、「滅罪真言」等。如能免於地獄之苦，佛教徒更希望能夠往生淨土，因此，在墓幢上也常刻有「生天真言」、「往生真言」、「往生淨土真言」。

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818) 遷化的龍花寺比丘尼韋契義的墓幢上，除了「佛頂尊勝陀羅尼」之外，還刻有九種真言，其中至少兩種是和破地獄有關的「滅惡趣真言」、「智矩如來破地獄真言」，另外七種是：「文殊六字真言」、「文殊八字真言」、「文殊五字真言」、「五種虛空藏菩薩真言」、「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心真言」、「心中心真言」。[112] 唐懿宗咸通九年 (868) 薛籌爲亡母追福建造的經幢上，在「尊勝陀羅尼」、「大悲心陀羅尼」之外，另刻「破地獄真言」、「開喉真言」、「解怨結真言」。[113] 宋真宗咸平六年 (1003)，青州石佛禪院僧人廣誠的舍利經幢上，刻不空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啓請」並咒，還有「滅罪真言」。[114] 又，宋徽宗大觀四年 (1110) 十月二十五日，山東益都縣僧人法海遷葬其亡師奉俊於寺內護聖院，並立尊勝經幢，幢上除了「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陁羅尼」之外，還刻了「滅罪真言」、「生天真言」、「往生真言」、「寶樓閣真言」、「安土地真言」五種。[115] 一九八八年在朔州市發現兩所李氏墓幢，一是遼天祚帝乾統十年 (1110)，李謹爲亡故的子、媳所建的墓幢，上刻梵、漢「阿閦如來滅輕重罪障陀羅尼」；另一幢是天祚帝天慶三年 (1113)

---

[110]《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八，〈徐智端刻幢〉。《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三十四至三十五，〈張師皋大悲尊勝幢銘〉。

[11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二十六至二十七，〈華州別駕杜承訓尊勝幢記〉。

[112] 同前書，卷四十七，頁十一，〈龍花寺尼韋契義尊勝幢記〉。

[113] 同前書，卷四十八，頁十四，〈薛籌尊勝幢記〉。

[114]《益都金石記》卷二，頁三十四至三十五，〈宋石佛禪院大德行狀石幢〉。

[115]《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七十六至七十七，〈僧奉俊尊勝經幢〉。

李省爲亡父李亨所建的墓幢，上刻「无垢清淨光明陀羅尼」和「智矩如來心破地獄真言」。[116] 金熙宗天眷二年 (1139)，涿州（今河北涿縣）人□（李）壽爲其父造「陁羅尼鎮幢」一座，上刻「智矩如來心地獄真言」、「文殊師利寶藏陁羅尼」、「生天真言」、「普賢菩薩滅罪真言」、「往生淨土真言」。[117] 又例，金章宗明昌七年 (1196) 有「太平院沙門」題名的經幢，上刻「佛母准提神咒」、「熾盛光佛消災吉祥陁羅尼」、「延壽真言」、「破地獄真言」、「文殊五髻真言」、「僧伽吒密語」、「滿願真言」。[118]

除了上述的真言咒語之外，還有刻其他真言者，唐宣宗大中四年 (850) 龍門東都聖善寺僧懷則尊勝幢，上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外，另刻「心中心真言」、「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大輪金剛陀羅尼」四個密教經咒。[119] 北京戒壇寺遼代傳菩薩戒大師的遺塔前建尊勝經幢，上刻「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密言」、「佛說寶篋印真言」。[120]

即使是在墓葬中的咒石，也刻有多種咒言，前面提及一九九五年在四川成都五代墓葬出土的咒石，上面除刻「佛頂尊勝陀羅尼」，並刻「解冤結真言」、「往生淨土真言」和「安土地真言」。[121]

(3) 啓請和跋尾

從第十世紀下半葉開始，有些經幢上開始出現「陀羅尼啓請」。「啓請」是密宗在經典或陀羅尼讀誦之前奉請的啓白，如不空所譯的《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大・982），在經文之前有「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前啓請法」。善無畏譯的《尊勝佛頂脩瑜珈法軌儀》（大・973）的序品中，有七言的偈語，和經幢上「陀羅尼啓請」很相似。[122] 今見於經幢上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啓請」，都是作七言的長偈，並不見於諸譯本中；它並且有不同的版本，可能是後來陸續發展

---

[116] 孫學瑞，〈遼朔州李氏墓地經幢〉，《遼金史論集》第六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227-228。

[117]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百二十三，頁三，〈□壽造眞言幢〉。

[118]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七，頁二十，〈太平院石幢〉。

[119] 張乃翥，〈龍門藏幢讀跋兩題〉，頁27。

[120]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頁十五至十六，〈京西戒壇寺陁羅尼經幢幷記〉。

[12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五代墓出土尊勝陀羅尼石刻〉，頁101。

[122]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册，頁415中、下-416上，368中。

出來的儀軌。不僅「尊勝陀羅尼」有啓請，刻有其他陀羅尼的經幢也有附刻啓請者，如「大悲陀羅尼啓請」、「大佛頂陀羅尼啓請」。[123]

今所見最早經幢上的陀羅尼啓請文，是宋太祖開寶四年 (971)，僧人宏正大師遺界記石幢上的「佛頂尊勝真言啓請」。[124] 至於俗人墓幢的啓請文最早是宋太宗雍熙四年 (987)，李恕爲自己預建的墓幢。

就現今所知墓幢上的啓請文，絕大多數都是刻在僧人的墓幢或舍利經幢上。如宋真宗咸平六年 (1003)，青州石佛禪院僧人廣誠遷化，他的兩名師弟、七位門人在本寺的北月殿前建立一所經幢，上刻不空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啓請」並咒，以及「滅罪真言」。[125] 宋仁宗慶曆年間，在河北獲鹿縣建立的清公大師舍利經幢，第二至六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啓請」和不空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126] 宋神宗元豐七年 (1084) 四月十六日，青州報恩寺大聖院尼智淨爲埋葬本院座主智清和座主師姐二人的靈骨所建造古舍利經幢，上刻《尊勝心陁羅尼經》，並「尊勝陁羅尼啓請」、「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127] 宋徽宗大觀四年 (1110) 十月二十五日，僧人法海遷葬其亡師奉俊於寺內護聖院，並立尊勝經幢，上刻「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陁羅尼」並「啓請」。[128] 宋徽宗政和元年，青州水陸寺資聖禪院前住持僧文緒爲自己先修的墓幢，上面便刻著「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並「啓請」。[129] 金完顏亮天德二年 (1150) 十月十日，益都長秋鐵佛院住持僧人普行，爲故比丘僧慧興建的塔幢，上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佛頂尊勝陀羅尼」和「啓請」。[130] 由於啓請文大都出現在僧人的墓幢或舍利經

[123]《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五十六，〈李恕經幢〉；《閩中金石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七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三，頁十三至十四，〈招慶禪院大佛頂陀羅尼幢記〉。

[124]《益都金石記》卷二，頁三十，〈宋宏正大師遺界記石幢〉。

[125] 同前書，卷二，頁三十四至三十五，〈宋石佛禪院大德行狀石幢〉。

[126]《常山貞石志》卷十三，頁五至八，〈清公大師舍利陀羅尼經幢〉。

[127]《益都金石記》卷三，頁一至二，〈宋智清靈骨記石幢〉；《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七十二至七十三，〈尼智清靈骨記幢〉。

[128]《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七十六至七十八，〈僧奉俊尊勝經幢〉。

[129]《益都金石記》卷三，頁八至九，〈宋僧文緒陀羅尼石幢〉。

[130]《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八十一至八十六，〈廣化寺尼慧興塔記〉。

幢上，而俗人墓幢上有啓請文的迄今僅見兩例，[131] 似可推知它應當是儀式性的。

至於少數僧人的塔幢上，也刻有「跋尾」，而刻跋尾的塔幢上也都刻有「啓請」，如前述宋徽宗時僧人法海爲其亡師奉俊所立尊勝經幢，以及青州水陸寺僧文緒爲自己預修的墓幢，兩幢上都刻有「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並「啓請」、「跋尾」。[132] 由於此二例皆在今山東地區，它可能是區域性的特色。

(4) 梵咒

經幢上所刻的絕大多數都是密教陀羅尼的經咒，而在佛經的翻譯中，陀羅尼是所謂的「五不翻」之一，不作意譯，只有音譯。由於以漢文很難百分之百地對應梵音，因此出現了以梵文書寫陀羅尼部分的經幢。[133] 唐代就已經出現「梵漢對照」形式的經幢，如天寶元年 (742) 所建的一所尊勝經幢，其上刻「佛頂尊勝陁羅尼」，就是在梵字旁譯漢文的。[134] 不過，唐朝的梵字經幢還是比較少見的，到了遼金時期，梵字經幢才大爲流行。葉昌熾云：「余著錄遼幢五十餘通，皆其時拓本也，其中多唐梵兩體。」至於其格式則是：

> 遼金梵字幢，大都題字年月眞書，而咒則梵書；亦有梵文一行，眞書釋文一行，書唐一人，書梵一人。[135]

遼金時期出現了很多梵字墓幢，一九九五年內蒙古敖漢旗羊山第2號遼墓中出土的墓幢殘石上，就是梵文。[136] 前述北京慈悲菴金天會九年 (1131) 陀羅尼幢，四面各鏤佛像，一隅漫漶，其三隅刻咒文「皆用西域梵書，而標以漢字。」[137] 又例，喀左頤杖子村金大定二十五年 (1185) 墓幢，八面，第四面是題名及一真言，第五面至第八面是漢、梵真言，第五面是「破無間地獄真言」，第八面是

---

[131] 另外一例是：宋眞宗天禧三年 (1021)，張供辰爲其亡父母在今山東昌樂縣所建之墓幢上的啓請。《昌樂金石續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卷十七，頁十四，〈尊勝經幢〉。

[132] 《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七十六至七十八，〈僧奉俊尊勝經幢〉；《益都金石記》卷三，頁八至九，〈宋僧文緒陀羅尼石幢〉。

[133] 拙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頁157-161。

[134]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一，〈梵字尊勝幢殘題〉。

[135] 《語石・語石異同評》，頁50，508。

[136] 〈敖漢旗羊山1-3號遼墓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1：8-10。

[137]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四，頁一，〈慈悲菴石幢〉。

「金剛頂三界真言」。[138] 又，金朝王□超在今熱河朝陽爲其父母所建的經幢，上即題「大悲心陀羅尼梵真言寶塔」，其「大悲咒」係以梵文書寫的。[139]

遼金時代出現大量的梵文經幢，可能和其時流行的佛教有關。遼天祚帝乾統六年 (1106) 二月九日，一位法號叫做即空的僧人在今河北涿州市所建造的經幢上，刻有當時涿州北天王臺比丘悟理所寫的造幢記，其中即說明了用梵文鐫刻陀羅尼的威力神效：

> 佛言有十三大罪，無懺悔者，有無動如來陀羅尼，一切極重大罪，並能消滅。若有人發大菩提心，依梵字本書於石塔幢子上，忽有覩此陀羅尼字生信敬心，所有如上十惡等罪，悉皆消滅。何況一日誦一遍，其人增無量福德，速成無上菩提也。大遼燕京涿州城北天王臺比丘悟理□記。[140]

由上可知，遼代「依梵字本書於石塔幢子上」的觀念可能是相當流行的。

綜而言之，除了少數高僧的塔幢之外，墓幢多爲私人或一家一族所建，規模自然較小，又它係樹立在墳墓冢側，故亦不講求製作精良，自然也極少請文人名士撰寫造幢記，更罕請擅於書法的名家寫墓記或咒言。葉昌熾《語石》中，對於經幢的製作由精趨簡，刻全部經文者也愈來愈少，做爲一個經幢的愛好者，他是有著無比沈痛的失望。然而，如果葉氏可以辨識出盛唐以後經幢多數是被作爲墓幢之用，自然可以理解經幢這種「日趨於陋」，其實是必然的變化。

（三）墓幢與葬制

金、元時代人張景文撰《大漢原陵秘葬經》中，有〈庶人幢碣儀制〉一節並附有圖，可知至少金、元時期的埋葬制度中，墓幢已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成份。本節主要就墓幢上的題記，以及近代出土的墓幢情況，對此書的記載做一番檢視。《大漢原陵秘葬經》云：

> 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同於祖穴前按石幢，上雕陀羅尼經，石柱上刻祖先姓名並月日。石幢長一丈二尺，按一年十二月也；或九，按九宮。庶人安

---

[138] 傅宗德，〈喀左顧杖子村出土金大定二十五年墓幢〉，《遼海文物學刊》1992.1：67。

[139] 《滿洲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三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三，頁二十四，〈陀羅尼眞言幢〉。

[140] 《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沙門即空造陀羅尼經幢記〉，頁557。

之，亡者生天，生者安吉大富貴。……安幢幡法當去穴二步安之，即吉慶吉也。[141]

上文云在墳穴前安置陀羅尼經幢，又說「安幢幡法當去穴二步安之」特吉。在此文後並附有「下五品庶人儀圖」（圖九）。從今所見的墓幢中，的確有一些是樹立在墓前的，但也有放在墓室裡的。

1. 墓前

唐會昌四年 (844) 十二月十九日，李潛在洛陽爲其父所建的墓幢，記云：「聞西方教有佛頂尊勝真言，可以福薦神道，是用購集鐫刻，謹立於封樹前二步。」[142] 墓幢樹立的地點是在「封樹前二步」，符合《秘葬經》中所說「去穴二步安之，即吉慶吉也」之說。可見此書記載確有依據。另外也有一些樹立在墓前的墓幢，唐文宗大和六年 (832)，董瑾爲其父董敘（其官銜是：右神策軍襄樂防秋同正將兼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所建的墓幢，據其銘：「松柏蒼蒼，龍虵亂行，貞石孤立，直墳之陽，斯幢之妙，幽明有□……」[143] 當係樹立在墓前。

另外，也有墓幢係置於墳墓的東南、西南、墓左的方位，這應該也是符合置幢於墓前的規制。宋真宗景德二年 (1005)，郭重顯等人爲其亡父母所建的墳幢，即是「特就墳所東南隅建尊勝大悲經幢一所」。[144] 又有墓幢係置於墓左，墓左的方位相當於東南隅，宋仁宗慶曆八年 (1048)，張昭範在其亡父母合祔墓旁所建的經幢，即是「謹立尊勝陁羅尼功德憧于仙壠之左」，進士董暨的序云：「用伸資薦，伏願乘茲利因，永居淨界，故本云或安墳墓側，寔在斯矣。」[145] 宋仁宗嘉祐七年 (1062)，張師皋所建的「大悲陀羅尼幢」，也是置於墓左，鄭惟幾所寫的記云：

---

[141]《大漢原陵秘葬經》，頁三十，總頁160。
[142]《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二十六，〈李潛尊勝幢記〉。
[143]《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九，〈董府君經幢〉。
[144]《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二十九，〈郭重顯等尊勝大悲幢讚〉。
[145] 同前書，卷八十二，頁三十四，〈張昭範尊勝幢序〉。

世謂金僊氏能除苦惱、滅罪障，有功力如化者。人以是習其書、行其教，至於□者必以幢刊陁羅尼文，樹之□（墓）左。噫，蓋□人子者欲報冈極，庶薦福於先乎！[146]

由上文可知樹經幢於墓左是當時相當普遍的一種葬法。金章宗明昌二年(1195) 三月，山西聞喜縣僧人普澗在疾篤病危時，叮囑弟子善慶等人在其墓左樹立經幢：

□建此幢者，先師之遺命也。師諱普澗，……一日因疾召諸徒曰：吾死之後，當製佛頂尊勝陁羅尼幢，立吾墳左。尔宜各守其道，斯吾願矣。[147]

又，唐敬宗寶曆二年 (826) 所建的一所墓幢上的銘文寫著：「寶曆二年二月廿日，於塋內西南建立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以資冥……」[148]

以上所說的墓前、東南隅、西南隅、面陽安幢，基本上都是在墓前的，爲什麼要安置在墓前呢？這和蒿里老公的位置或許也有關連，《大漢原陵秘葬經》記「天子至於庶人墓中西北角置蒿里老公」。可能是爲了避開蒿里老公，所以只能在墳前樹幢。

2. 墓室內

從唐代以來，就有將經幢放在墓室者，一九五四年在西安東郊高樓村發掘唐代高克從墓，在墓道中就發現一所尊勝經幢。[149] 一九八〇年在遼寧省朝陽市發現的遼代龔祥墓的墓室近於墓門處，出土了一通八面石幢，通高87.5厘米，幢的一面刻「大悲佛頂尊勝陀羅尼幢」，[150] 其它七面皆刻梵文，應該就是陀羅尼。內蒙古敖漢旗羊山第2、3號遼墓中，也都有墓幢的殘石。[151] 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市大興縣發現遼代馬直溫夫妻合葬墓中，也出土了石墓幢頂（圖一〇）。[152] 一

---

146 同前書，卷八十二，頁三十四至三十五，〈張師皋大悲尊勝幢銘〉。

147 《山右石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二十二，頁二十，〈唐興寺經幢〉。

148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十三，〈寶曆尊勝幢記〉。

149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所見的唐代經幢〉，《文物》1959.8：26。

150 尚曉波，〈遼寧省朝陽市發現遼代龔祥墓〉，《北方文物》1989.4：29-30。本文作者推測此石幢應屬於地面上所立之物，在墓頂坍塌時墜落在墓室內。其實，從唐代高克從墓室出土的經幢，便可知早從唐代開始，就有將經幢置於墓室者。此幢應是置於墓室之內的。

151 〈敖漢旗羊山1-3號遼墓清理簡報〉，頁8-10, 13。

152 張先得，〈北京市大興縣遼代馬直溫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12。

九九二年在遼寧朝陽縣聯合鄉金墓中，也出土了一所墓幢。[153]

3. 作爲墓碑的梵文墓幢

在四川西昌附近的無封土堆火葬墓中（其年代上限在唐末宋初，下限在元初），其上樹立墓志，有的就置一陰刻梵文經咒的石墓幢。幢通高1米左右，分幢頂、幢身、基座三部分，幢頂作葫蘆形、寶球形和刻劃蓮花瓣紋的圓頂桃形。幢身作八角形，寬的四面上端各陰刻趺坐佛像一，窄的四面上端用漢文分別刻「南無東方阿閦佛」、「南無南方寶生佛」、「南無西方阿彌陀佛」、「南無北方不空成就佛」。幢身主要部分陰刻橫書梵文經咒，多已風化剝蝕。[154]

雲南西部的火葬墓，有的是以六面和八面的經幢，做爲墓石之用。一般高約50－100厘米，直徑30－40厘米，寶蓋頂、蓮花座，下截雕刻佛像二龕或四龕，每面都刻滿梵文陀羅尼經，很少有漢字，僅間或於佛龕下刻死者姓名、立碑年月而已。[155]

四、墓幢流行的原因

從盛唐以後，墓幢便日漸流行，到遼、金時期更達到極盛；有的家族甚至建立數所墓幢，如遼代朔州人李謹就爲其家族的亡過者樹立了五所墓幢。[156] 當時人甚至在收埋無主屍骸的義塚之側，也建立經幢，希望藉著尊勝經幢塵沾影覆之神效，爲亡故的饑民消除業障，祈求他們得以超昇天界。[157] 墓幢所以經歷數百年而不衰，和初唐以後地獄信仰的流布、「尊勝陀羅尼」的破地獄功能、盛唐以

---

153 遼寧省朝陽縣文物管理所，〈遼寧朝陽縣聯合鄉金墓〉，頁60-64。

154 黃承宗，〈西昌附近的古代火葬墓〉，《文物資料叢刊》7(1983)：61。

155 孫太初，〈雲南西部的火葬墓〉，《考古通訊》1955.4：30-31。

156 《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朔州李謹建幢記〉，頁613：「爲先翁祖母、叔祖、考妣已建高幢一座，刻諸佛密語；及小幢四，中之一即爲亡男副知客惟孝、亡新婦秦氏立，諸勝陀羅尼幢塚首安措。」

157 遼道宗大安十年 (1094) 時因天災導致飢荒，有餓死者，當時在今山西大同有善心人士收埋無主的遺骸，數至三千，因其地卑溼，而在壽昌五年 (1099)「廼遷葬於粟山之屹，以曰義冢，旁附金地，上建寶幢。刻妙相以常瞻，□□□而永奉。所願滅彼重□，冀速出於泥□。丞此勝因，庶皆生於提婆；更期不朽，普濟無窮。影覆塵霑，同增利樂。」《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下，〈義冢幢記〉，頁495-496。

後密教陀羅尼的流行，以及墓幢和孝道的結合等因素有關。

（一）唐代以後地獄信仰的流行

唐代地獄信仰的流行，提供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受到重視和歡迎的重要背景。唐代地獄信仰的流行，主要受到北朝末年逐漸形成的淨土教和隋朝末年新興的三階教有關。另外，晚唐興起的十王信仰，也提供人們免除地獄之苦的救濟之道，墮落地獄的恐怖可以說充分反映在唐代流行的教派和經典裡。又，淨土教和三階教、十王信仰之間又有某種程度的關連，[158] 更促進了經幢的流行。

六世紀末年新興的三階教強調墮落地獄的恐怖，並且勸說信徒向地藏菩薩禮懺；[159] 三階教在唐朝相當興盛，雖然武則天、玄宗時期曾經三度敕令禁抑此教派，但它至九世紀時仍相當活躍，德宗貞元十六年 (800) 四月三十日牒稱三階教「今京城內五十五寺各有禪院，住持相續二百餘年，僧尼二千人已上。」[160] 一直到宋朝初年，它仍有相當程度的流行，敦煌文書中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980) 三階教典籍的寫本，[161] 可知它前後至少流傳了四百年之久。[162]

由於三階教教義中宣揚墮入地獄的恐怖，[163] 因此三階教徒和僧人很重視地獄的救贖；三階教的寺院、或者寺院中三階院的壁畫中有繪著地獄變相者，也有在寺院中樹立經幢。唐長安淨域寺三階院東壁上，有張孝師畫的「地獄變」，洛陽福先寺三階院則有吳道子畫的「地獄變相」。[164] 在長安三階教主要的寺院「三階五寺」之一的化度寺三階院裡，就有兩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一是唐德

---

158 劉長東，〈論隋唐三階教與淨土教的關係〉一文中，指出三階教六時禮懺儀中，有大量善導所作的淨土歌讚，見《新國學》2：373-374（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編，〔成都：巴蜀書社，2000〕）。

159 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27一刷，1973二刷），頁638-652。

160 日本所存古寫本《貞元釋教錄》卷二十八。見塚本善隆〈續三階教資料雜記〉，《支那佛教史學》1.2(1937)：110。

161 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頁107。

162 參見拙文，〈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

163 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頁638-644。

164 唐・張彥遠撰，谷口鐵雄編，《校本歷代名畫記》（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1），卷三，頁46, 50, 54。

宗貞元十六年建立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由方琬撰經幢贊序並書；[165] 一是唐武宗會昌二年 (842) 所建的，其上的序是由僧人惟則撰文並書。[166] 另外，三階教的僧人也建有墓幢，在終南山三階教徒埋葬的「聖地」就有兩個三階教僧人的墓幢。三階教的僧俗信徒多選擇露屍葬「林葬」——暴屍林野，以血肉施予鳥獸，它的創始人信行禪師就是在終南山楩梓谷實行林葬，門人就地起塔以安置其餘骨。[167] 其後，三階教信徒興起陪葬在信行塔側的風習，此地因名爲「百塔寺」。唐敬宗寶曆元年 (825) 四月二日，一批三階教的僧人爲其師湛□，在終南山楩梓谷建立經幢，以安置林葬後的遺骨：「至終南山梗梓崗側，殂歸松柏之下，備儀安厝，建立寶幢。」[168] 唐文宗大和六年 (832)，比丘尼願證在百塔寺其師三階教大師大禪祖（俗姓耿氏，諱揔靜）林葬的處所，建立一所經幢，並在其下安置林葬後火化餘骨的灰燼，在此幢上刻有內供奉僧叡川撰寫的〈幢後銘〉云：

> 於戲！行律比丘尼願□　三階教大禪祖荼毗林畔
> 先大師荼毗所，哀慟樹此明幢，比丘叡川爲其銘
> 師姓耿氏，諱揔靜，年五十四，夏卅四。大和五年正月廿六日長安縣羣賢里直心寺□滅，灰舍利閣是下。……
> 茫茫歸人，前有何向？明度總持，□□之仗。……不尔塔萬，甎懿尔幢，……[169]

「不尔塔萬，甎懿尔幢」，就是說：不給您建塔，而專爲您建幢。

對於傳布地獄思想更有影響力的一個宗派的是淨土教，[170] 從北朝末年以後

---

165 《寶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四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七，頁三十二，〈唐化度寺三階院尊勝陀羅尼經石柱〉。

166 《寶刻叢編》卷七，頁三十六。

167 拙文，〈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

168 《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六，〈湛大師經幢〉；在此經幢上有〈故□□□□□□□大德惠澄□□□幢銘〉，可知此僧人名惠澄，另有一釋號是湛□，「有大師俗姓員，釋號湛□，……因過薦福寺大德明觀和尚，開三階之奧運，示一性之法王，敷普□之□演，收慈之本，乃悟六入，趣精□□□□，遂舍□□，方就普利。□□傳授，無我無人。……」可知惠澄是個三階教僧人。

169 《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四十一至四十二，〈僧无可書幢〉。

170 本文稱「淨土教」。按日本學者在半個世紀以前就用「淨土教」的稱呼，見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京都：法藏館，1942）；小笠原宣秀《中國淨土教家の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51)；小笠原宣秀《中國近世淨土教史の研究》（京都：百華苑，

逐漸形成的淨土教，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地獄思想，經過曇鸞 (476-542) 、道綽 (562-645) 弘揚發展學說，至善導 (613-681) 建立完備的理論和儀軌，而蔚然興宗。由於它不因武宗會昌毀佛受到頓挫而衰頹，在宋代以後它的修習方法更普及於各個宗派，[171] 因此，它對於地獄恐怖的深耕，有著更長遠的影響。[172] 由於免墮入地獄是淨土教的重要教義之一，經幢既然可以免除地獄之苦，相對的即是神生淨土的妙樂。因此，在經幢上序記或讚中常見「淨土」一詞，如前文提到黃順儀爲亡女所樹立的墓幢上，稱：「意者伏願丞此影霑功德，離苦下脫，不墮三塗，往生淨土。」[173] 又，唐文宗大和六年 (832) 五月十八日，左神武軍宿衛劉文□爲其亡父母、七代先靈所建立的墓幢上，也說：「又願亡靈乘此功德，生居淨域，永離輪迴。」[174] 另，唐僖宗時人鄭昌嗣撰〈建尊勝幢記并讚〉云：「解脫煩惱，有陀羅尼，咸生淨土，受大慈悲。」[175]

宋太祖開寶二年 (969)，吳越國王錢俶在浙江杭州雲林寺門左、右各建立一所經幢，兩幢上都鐫刻了〈新建佛國寶幢願文〉，其中也提到了彌陀的四十八願：[176]

> 勒隨求之梵語，刊佛頂之秘文。直指丹霄，雙分八面。伏願興隆霸祚，延遠洪源，受靈貺於祖先，助福禧於攸久。軍民輯睦，彊場肅寧；宗族以之咸康，官寮以之共治。四十八願，永符法處之良因；八十種好，更備曇摩之圓智。得大堅固，不可稱量，凡在含生，同躋覺路。[177]

1963）等。湯用彤也認爲：「志磐謂淨土『立教』，而中國各宗都有淨土之說，且彌陀彌勒的崇拜實有不同，亦無統一的理論……因此，淨土是否爲一宗派實有問題。」見湯用彤〈論中國佛教無「十宗」〉(1961)，《湯用彤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370；近來中國學者劉長東〈論隋唐三階教與淨土教的關係〉，亦用「淨土教」之稱。

171 陳揚炯，《中國淨土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172 道端良秀，〈中國佛教に於ける地獄の恐怖〉，《印度學佛教學研究》8.2(1960)：103。

173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三至十四，〈黃順儀尊勝幢記〉。

174 《全唐文補遺》第一册，〈咸陽平城鄉張白龍村唐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銘記幷序〉，頁9-10。

175 《全唐文》卷八一二，鄭昌嗣〈建尊勝幢記幷讚〉，頁8549上。

176 《佛說大阿彌陀經》（〔大・364〕，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二册），卷一，〈四十八願分第六〉，頁328下-330中。

177 《兩浙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四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五，頁三，〈雲林寺經塔〉。

又，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 四月，王贇爲亡母李氏所建的經幢上，亦云：「魂指淨域而非遙，面禮彌陁而不遠。」[178]

淨土教和經幢建立的關係，也顯示在經幢題記上的引路菩薩。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 (932) 二月，居住在都城洛陽福善坊的張思柔之妻田氏，爲其先祖亡靈所建的墓幢上，[179] 鐫刻著她在建造經幢時所做的佛事，包括寫經、造像和齋僧，其所建造的佛像之中就有地藏菩薩和引路菩薩，所寫的經中有《閻羅王經》，[180] 此當是《閻羅王授記四眾逆修生七往生淨土經》。[181] 據塚本善隆的研究，十王信仰和引路菩薩信仰是在唐末（第九世紀中葉以後）才成立的，十王信仰比引路菩薩出現的時間略早，兩者在淨土教的信仰中連結在一起。[182] 敦煌寫本P. 2003的《十王經》，有以下的題記：

> 謹啓諷閻羅王預生七往生淨土經誓勸有緣以五會啓經入讚唸阿彌陀佛[183]

此係將十王信仰和大曆、貞元年間的淨土教僧人法照所倡導的「五會念佛法事讚」結合在一起。[184]

十王信仰和經幢的關係，也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 (903) 李宗大所造經幢的題記：

> 弟子李宗大爲累遭離乱，骨肉團圓，發願造寶林寺一所，敬畫造（釋）迦像一鋪，又畫西方淨土一鋪，敬畫維摩居士功德一鋪，又畫土（十）王像一鋪。以此功德……[185]

此處淨土和十王信仰也並列在一起。

除了引路菩薩之外，在墓幢上的題記中也可見到淨土信仰最主要的闡述之一「臨終來迎」；淨土教認爲只要虔心念佛，其人臨命終時，會有佛菩薩和十方聖

---

178 《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一，頁一，〈雁塔寺經幢〉。

179 其造幢記云：「奉爲先祖亡靈□□□□□笪哥，特造大悲兼佛頂尊勝幢一所，立在塋邊，永充故記。」故知此爲一墓幢。見塚本善隆，〈引路菩薩信仰と地藏十王信仰〉，頁329。

180 塚本善隆，〈引路菩薩信仰と地藏十王信仰〉，頁329-330。

181 同前文，頁331。

182 同前文，頁395。

183 杜斗城，《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錄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頁3。

184 塚本善隆，〈引路菩薩信仰と地藏十王信仰〉，頁361, 387-390。

185 《山右石刻叢編》卷九，頁四十四，〈廣福寺經幢〉。塚本善隆認爲此「土王像」當作「十王像」，見塚本善隆，〈引路菩薩信仰と地藏十王信仰〉，頁377。

眾來迎接其至淨土。[186] 因此，臨終來迎的圖像也成爲淨土教藝術中重要的題材之一。[187] 在遼道宗大安八年 (1082)，易州淶水縣（今河北淶縣）遒亭鄉水井村邑人重修淨戒院時，並建造香幢一所，其上的造幢記云：

> 若有人發大菩提心，依梵本書於壁上，又於版上。忽有人覩此陀羅尼，生信敬心，所有如上十惡等罪，悉皆消滅，何況一日誦一遍，其人增無量福德，臨命終時，十方聖眾，各持寶蓋來迎，生於淨土。佛舒金色臂，摩頂受記，速成無上菩提。[188]

其中就提到：「臨命終時，十方聖眾，各持寶蓋來迎，生於淨土。」遼天祚帝天慶十年 (1120) 四月十五日，長男松壽爲亡父建陀羅尼經幢的〈造幢記〉，和前幢幾乎雷同，此幢的地點在遼寧義縣，前幢建於北京，相距頗遠，可見到了此時，由於建立經幢之普遍，連造幢記都有格套。此造幢記在描繪持陀羅尼者臨終時諸佛來迎的文詞，和上文相似：

> 佛言有十三大罪無懺悔者，有無動如來一切陀羅尼，一切輕重大罪，並能消滅：……臨命終時，十方聖眾，各持華蓋來迎，生於淨土。佛舒金色臂□□授記，速成無上菩提。佛說佛頂尊勝陁羅尼曰：（梵文咒）[189]

充分反映了經幢受淨土教臨終來迎、往生淨土思想的影響。

晚唐以後，地獄十王信仰的流傳，加強人們對亡者救贖的重視，甚至在和地獄信仰有關的廟宇如東嶽廟和閻王廟中，也建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可作爲經幢和地獄信仰關係密切的又一證明。五代吳高祖天佑十二年 (915)，神女杜氏在今山東益都縣東嶽廟建立尊勝經幢，其〈造幢記〉云：

> ……況東嶽府君定死主生，興雲致雨，騁神□聖，□國□人。臨陣即暗助陰兵，□□即清除疫鬼，威靈莫惻，變化罕□。女弟子杜氏親□加被，方切□張，立廟塑儀，祈恩求福□者……（缺），冥教令立寶幢，經載□

---

[186]《佛說大阿彌陀經》卷二，頁337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36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二册），卷一，頁345中。關於淨土教臨終來迎的研究，見藤田宏達，〈臨終來迎思想の起源〉，《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2.2(1964)。

[187] 見中野玄三，《來迎圖の美術》（京都：同朋舍，1975）。

[188]《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下，〈水井村邑人造香幢記〉，頁446。

[189]《滿洲金石志》卷二，頁四十八，〈陀羅尼經幢〉；《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松壽等爲亡父特建法幢記〉，頁681。

□，福資幽顯。□尊勝陁羅尼，功異餘教，驗莫能書，影覆塵霑，得生天□，名傳聲至，□□祿榮。[190]

從上文以及此幢的銘讚中，可知此經幢之建立，是因神職人員「神女」杜氏透過某種儀式，得到東嶽府君的指示才建立的，故讚曰：

府君冥教，□造靈幢，□□明世，永福城隍。神通罕惻，勝利難量，乾坤永固，共日月齊長。神女杜氏永福永昌，□□□□□廣讚揚。[191]

在山東益都縣西門內閻王廟後田間，也曾發現後晉高祖天福六年 (941) 石幢的殘刻，《益都金石記》認此幢應屬龍興寺所有，不過，從其幢上的殘序云：「聞至聖至靈，……廟臨澠水，威振海隅，（缺）……掛敕贈將軍，官位□額（缺）敕於東□兩廟，相次八載（缺）連正祠，遂發□誠粉修……普願（缺）與廟主大王福位（缺）……」，[192] 其內容都和佛教無關，可見此幢的建立應和此閻王廟的創修有關；又，幢中的題名中有「神女蘇氏、孫氏、蕭氏」，[193] 和東嶽廟經幢上「神女杜氏」一樣，當是民間信仰中的巫祝之流，故此幢絕不是龍興寺之物。在閻王廟樹立經幢，和在東嶽廟建幢一樣，都是因爲尊勝經幢具有破地獄功能的緣故。後晉天福七年 (942)，在青州臨淄縣東嶽廟也有社眾建立尊勝經幢，祈願「藉幢□□畜生之身，命終之後，早生西方，禮佛聞法，捨罪身□□重受傍生之業。」[194]

（二）「佛頂尊勝陀羅尼」的破地獄功能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特別強調破地獄功能，是尊勝經幢被樹立在墓域的重要原因。日本學者長部和雄也認爲：破地獄思想是此經的特色之一。[195] 根據此經的敘述，「佛頂尊勝陀羅尼」可以免除因爲業障惡因所招致死後墮入地獄、畜生、餓鬼等惡道的果報，更可往生諸佛國土。對於現世而言，它也可以使人永離病苦、延年益壽。在以上各種功能中，它特別強調破地獄的功能，所以此經又名

---

[190]《益都金石記》卷二，頁十八至十九，〈唐東嶽廟尊勝經幢〉。

[191] 同前註，頁十九。

[192]《益都金石記》卷二，頁二十二、二十四，〈後晉陳渥書石幢殘刻〉。

[193] 同前註，頁二十四。

[194]《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頁九，〈東嶽廟尊勝幢記〉。

[195] 長部和雄，〈不空以前的密教之一〉，頁33。

爲「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和「吉祥能淨一切惡道」。此經最重要、且是流傳最廣的一個譯本是佛陀波利的譯本，此譯本志靜的經序中，兩度提到此經的破地獄功能：「廣利群生，拯濟幽冥」，「此經救拔幽顯，最不可思議。」[196]

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中提到：若人們見到書寫著此陀羅尼的絹帛紙張，或者與安置此陀羅尼的幢竿、高山、高樓、塔接近，甚至於只要幢影映身，或者風吹陀羅尼幢上的塵埃飄落在身上，便可以消除所有罪業，不墮入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等惡道，也就是所謂的「塵沾影覆」神妙功能。爲了使亡者可以隨時得到此陀羅尼塵沾影覆的護祐，從盛唐時便有人在墓側樹立經幢，樹幢者相信尊勝陀羅尼的功效，因此也將它稱之爲「影幢」。上元二年 (761)，僧人志遠在其亡母墳旁所建的墓幢，便說「措葬於影幢之側」。[197] 前面提到左神武軍宿衛劉文□爲其亡父母、七代先靈所建墓幢上，就稱「尊勝影幢」，具體地形容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的神妙功效，並且說：

> 故知是經咒威力，難可稱量也。又愿亡靈乘此功德，生居淨域，永離輪迴。……勝幢立於墳旁影衛，世世稱傳，萬代永賴。[198]

在這些墓幢的題記中，也可見到樹幢者期盼藉著陀羅尼神妙奇效以濟渡亡靈。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818) 長安龍花寺尼韋契義的墓幢上，敘述她臨終的囑咐就把墓幢作用說得很清楚：

> 但營小冢，傍植勝憧，矧諸經秘藏，如來智印，盡在此矣。每憧影暎身，塵流點物，能淨惡道，俾登菩提。[199]

唐宣宗大中二年 (848)，河陽縣觀心寺比丘尼惟徹遷化，葬在河陽縣鹽坎北坡，她的三個弟子在其墳前樹立了一所尊勝石幢，題爲〈唐觀心寺禪律故尼大德墳前尊勝石幢記〉，其讚詞云：

> 陁羅尊勝，諸佛秘門。破諸地獄，能離垢塵。建資幢讚，用濟幽魂。巍巍不朽，萬古千春。[200]

---

196 關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參見拙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頁150-154。

197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六，〈僧志遠造幢記〉。

198 《全唐文補遺》第一册，〈咸陽平城鄉張白龍村唐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銘記幷序〉，頁9-10。

199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十二，〈龍花寺尼韋契義尊勝幢記〉。

唐懿宗咸通二年 (861)，一個名叫從實的人爲父在萬年縣（今西安）滻川鄉鄭村之里墓所樹立的墓幢，幢上的銘贊曰：

> 彭郡夫人，母儀欽則，追緒亡靈，爰憑佛力，建妙寶幢，□空搆日，其影及身，万罪消釋，所願良因，庄嚴亡識，百千萬祀，傳之貞石。[201]

咸通七年 (866)，佛教徒黃順儀在她做練行尼的亡女廿二娘之墳塋上，樹立了一所墓幢，其上題云：

> 女弟子黃氏，號順儀，爲亡女練師廿二娘於塋所建造尊勝陁羅尼幢壹軀，意者伏願丞此影霑功德，離苦下脫，不墮三塗，往生淨土。[202]

到了遼代的墓幢上，更直接把尊勝幢立於墳壟的作用，形諸文字：

> 且夫諸佛所演大摠持教，皆有難思殊妙勝力；若能迴善住七返之殃，能救六道先亡之苦者，唯我佛頂尊勝陀羅尼最爲其一也。若有眾生，刊在高幢，置於先壠，所薦冥福，詎可思惟？[203]

（三）墓幢和孝道的結合

佛教和死亡信仰有關的儀式，大都因爲和中國儒家的孝道結合在一起，而得以深入中國社會。[204] 如六朝時期的盂蘭盆會，僅是佛教徒在七月十五日供養佛和僧侶，到唐代以後則轉變爲僧俗信徒在這一天營辦盂蘭盆供佛，以超渡先亡，救拔七世父母。上從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把盆供做得精巧豐富。唐初由於地獄思想的流行，使得人們更重視超拔七代祖先地獄之苦，盛唐以後，人們開始樹立墓幢祈求親人免於惡道之苦，後來更把建造墓幢和孝道連結在一起。

唐代中期以後流行的《十王經》和十王信仰，可能是促成墓幢和孝道結合的

---

[200]《唐文拾遺》卷六一，闕名，〈唐觀心寺禪律故尼大德墳前尊勝石幢記〉，見《全唐文》第十一册，頁11057。

[201]《金石萃編》卷六十七，頁十二至十三，〈劉氏經幢〉。其上題「佛弟子彭城郡夫人劉氏爲亡夫建造尊勝幢一所」，但讀贊言，可知是其子男從實爲父造幢，尊其母，遂題劉氏爲亡夫之語於前，而贊詞則歸美於母。

[202]《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三至十四，〈黃順儀尊勝幢記〉。

[203]《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白懷祐造幢記〉，頁630-631。

[204] 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Stephen F. Teiser,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重要因素。《佛說閻羅王授記勸修生七齋功德經》云：

> 爾時佛告阿難、一切龍神、八部大神、閻羅王天子、太山府君、司命、司祿、五道大神、地獄冥官等行道天王：當起慈悲法，有寬縱可容一切罪人，若有慈孝男女、六親眷屬脩福薦追拔亡人，報生養恩，七七齋造營經像報父母，令得生天。[205]

經文中提到：佛告知閻羅王、太山府君等地獄的官屬，若有慈孝男女報生養恩，可修七七齋、造營經像，追拔亡父母，使得生天。塚本善隆認爲：此經將七七齋和孝道結合，以勸人做追善的法事。[206] 本文以爲其中也提到了造營經像，而八面體的經幢上通常是除了經咒之外，各面也都雕有佛像；尊勝經咒原來就有免除地獄之苦的功能，若依上段經文所述，其上的佛像也可救拔亡者，使之可以脫離地獄而生天。十王信仰是在九世紀中葉以後興起的，唐代揚州高郵尉李挺和他四個弟弟爲其亡父所建經幢的序讚中，就兩度提到了以佛教陀羅尼表達孝道的陳述「依孔氏、託釋門」：

> 百行之先，孝之德也；一念之應，聖之門也。孝莫大於□福（缺）……莫□於通（缺）……孔氏何以知□□□□釋教何以知福之怙？言及意及，精歟詳歟。……
>
> 孝之大，法之先，聖立言，理必詮。昭其報，冥不泯，化無窮，□難盡。……痛無怙，依孔氏、託釋門。陀羅尼，最勝因，斲他石，請刻字。……[207]

在宋初的造幢記上，也可看到將造幢和儒家所提倡的孝道連結的陳述，前面提到宋初王贇爲亡母所建經幢上的〈尊勝陁羅尼經幢記〉云：

> 是知我身得之於一合之□，王隨生□之元，受父母之體。孔氏曰：孝者，五教之宗；仁者，百行之祖。如孝敬內蘊，則爲人□仁信外，行稱君子矣，自然與賢哲同塗，典經合軌者矣。[208]

宋太宗至道元年 (995)，無名氏爲其亡父母合祔時所建的墓幢上，就說明建墓幢是孝子報答父母鞠養之恩的方法：

---

[205] 塚本善隆，〈引路菩薩信仰と地藏十王信仰〉，頁370，「比丘道眞受持本」（北京圖書館藏「鹹」七十五號）。

[206] 同前文，頁372。

[207] 《唐文續拾》卷九，王□〈尊勝陀羅尼幢讚幷序〉，見《全唐文》第十一册，頁11270。

[208] 《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一，頁一，〈雁塔寺經幢〉。

將祛濁海之沉湮者，必藉空門之善果，是以設茲勝事，表以薦修。所謂慧力恢宏，法源遐貫，蓄禎休而斯厚，顯濟拔之功深。寶像陰廻，照之者魂超淨土；梵文聲振，聞之者道證菩提。知其然而爲然，迺至用而爲用，蓋孝子答父母之禮也。……松楸方茂，邱壠正高，空思鞠育之恩，甯報劬勞之力，遂以推諸同氣，卜以良工，……因刊歲月，聊述讚云：

……

孝子之禮，報效斯深。鞠育爲念，劬勞在心。憑此功德，以薦幽沉。

貞珉遽鑿，寶幢俄立。至願既臻，休感斯集。緬想玄夜，威福宏及。……[209]

宋真宗景德二年 (1005) 十一月四日，郭重顯等人在其亡父母的墳墓之東南隅，建立「尊勝大悲經幢」一所，幢上的讚詞就說：「故鐫尊勝，特寫大悲，用報劬勞，影藉光□。」[210]

遼天祚帝乾統五年 (1105) 十月二十一日，白懷友在北京良鄉琉璃河，爲其亡考妣建造之墓幢上的題記，就敘述當時人認爲孝親者——無論其經濟狀況如何，都應爲父母造墓幢。白懷友自己則是在其父去世後二十一年，方有能力建造墓幢，也才覺得心安：

……而後我教東流，濛被幽顯，則建幢樹剎興焉。其有孝子順孫，信而樂福者，雖貧賤殫財募工市石，刻厥密言，表之於祖考之墳壠，冀其塵影之霑庇者，然後追悼之情塞矣，則白公亦其人也。考之卒於今二十一年矣，始則力匱不逮，寤寐常如有所闕然。暨今之能爲也，欣欣然以爲孝子永思之道，盡於是矣。如此得不謂清信之士虖哉？[211]

上文將墓幢和孝道的連結表達得很清楚，其後甚至有人認爲不能爲親人建墓幢者，是不孝的表現，遼代張世俊等人爲其親人建的墓幢上，由進士張定撰寫的造幢記就有這樣的陳述：「苟未能爲幢於墳，則是爲不孝也。」[212]

在金代的一所墓幢上，更將儒家的孝道和佛家報親恩的觀念並舉同列。金世宗大定二年 (1162) 七月二日，在熱河有婦人劉氏等爲夫家的祖父劉惟辛、祖母王氏建立墓幢記云：

---

[209]《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二十七至二十八，〈杜澤里尊勝幢讚〉。

[210] 同前書，卷八十二，頁二十九至三十，〈郭重顯等尊勝大悲幢讚〉。

[211]《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白懷友爲亡考妣造陀羅尼經幢記〉，頁549。

[212] 同前書，補編，〈張世俊造幢記〉，頁699。

> 夫儒垂五典，宣孝道以居先；釋演三乘，衰報恩而最上。愚既知之，敢忘恩祐者矣，是乃特建經幢，分報洪恩。願沉魂滯魄，速離幽壤之鄉；朽骨遺骸，冀有登天之路。[213]

又，遼天祚帝天慶元年 (1111) □直溫等人爲其亡故的雙親所建的墓幢云：

> 伏以欲報昊天鞠育之鴻恩，惟仗諸佛宣傳之密教，刻之貞琰，樹于先塋。期覆影以霑塵，願覺佛而聞法。[214]

將建墓幢和孝道結合在一起的想法，也表現在墓幢上刊刻「報父母恩重真言」上。遼天祚帝天慶三年 (1113) 在涿州固安縣（今河北固安縣）歸仁鄉南陽里人張世卿爲亡母所建的經幢上，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報父母恩重真言」、「生天真言」。[215]

俗家信徒建立墓幢以報父母恩，僧侶也建立墓幢或舍利經幢以報師恩。如宋開寶四年 (971) 僧人懷恩等爲其師宏正大師建立墓幢，記稱「以旌法乳之恩，用福往生之識。」[216] 在遼道宗大康元年 (1075) 行滿寺尼惠照等人爲其師所建的墓幢云：

> 噫！尊莫尊于師長，重若重于君親，義本在三思……思法恩之報，則昊天罔極，其不可已，當如之何？迺建妙幢，上刊密印，託難思之句，……期此涓塵，少報萬一。[217]

北京戒壇寺傳菩薩戒大師靈塔前的經幢上之題記云：「遂當遺塔前建勝幢。仰憑佛印之大威，上答慈雲之巨蔭。」[218]

（四）密教陀羅尼的流行

從公元三世紀至八世紀，有很多印度密教經典傳入中國，其間來華的印度或西域高僧也多精通咒術，有學者將此一時期稱爲「初期中國密教」；而將八世紀

---

213 《滿洲金石志補遺》，頁四，〈劉惟辛墳幢題名〉。

214 《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爲先內翰侍郎太夫人特建經幢記〉，頁617。

215 同前書，天祚編，〈張世卿爲先妣建幢記〉，頁642。

216 《益都金石記》卷二，頁三十一，〈宋宏正大師遺界記石幢〉；《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五十四，〈宏正大師遺界記幢〉。

217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頁十二至十三，〈行滿寺尼惠照建陁羅尼幢幷記〉。

218 同前書，卷一百五十三，頁十五至十九，〈京西戒壇寺陁羅尼幢幷記〉。

至九世紀（中唐至晚唐）的密教稱爲「中期中國密教」，並將五代以後的密教稱爲「後期中國密教」。[219] 學者多認爲在唐武宗會昌法難、後周世宗法難以後，密教就衰微了；[220] 一九八七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地宮的發掘中，出土了很多密教的文物，始有學者開始修正前說，認爲至少在唐代晚期密教（法門寺塔地宮最後被瘞封時是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874]）還是很流行的。[221]

由於密教或者是密教陀羅尼的密授傳統，使得它流傳的情形很少見諸於記載，[222] 然而，從以下一些零星的資料，或可大致描繪出唐代以迄遼代密教陀羅尼流傳受持的情況。唐代僧人修持陀羅尼是很普遍的，在《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翻譯不久，爲此經作序的僧人志靜趁著在洛陽逗留的時間，花了十四天，從日照三藏學習「尊勝咒」。[223] 在武則天長安二年 (702) 示寂的安陽靈泉寺主智法，生前就是「持金剛般若及尊勝咒等各二萬遍，文梵音轉。」[224]〈大唐崇福寺故僧錄靈晏墓誌〉上說宣宗大中十年 (856)，崇福寺僧人、右街僧錄靈晏病重時「乃命門人義秀等，令諷諸真言，一夕繼響，從暮至曉，聽而生敬。」[225]

盛唐以後，也有不少在俗的居士經常唸誦陀羅尼，如玄宗時洛陽人段仲垣退隱於家，「禮懺乾心，日誦陁羅尼廿一遍」，[226] 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裡敘述每日當唸此陀羅尼二十一遍，故此陀羅尼當是指其時流行的「尊勝陀羅尼」。玄宗開元二十年 (732) 辭世的薛氏夫人盧未曾有，是大智禪師的弟子，就

---

219 松有長慶，《密教經典成立史論》（京都：法藏館，1981二刷），〈序〉第一節，「4、純密と雜密」，頁20-21；賴富本宏，《大乘佛典・中國日本篇・第八卷　中國密教》（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頁307-309。

220 大村西崖，《密教發達志》，收入《世界佛學名著譯叢》（臺北：華宇出版社，1986），第74冊，頁831；賴富本宏，《大乘佛典・中國日本篇・第八卷　中國密教》，頁321-323。

221 宿白，〈法門寺塔地宮文物反映的一些問題——法門寺塔地宮出土文物筆談〉，《文物》1988.10：29。

222 拙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頁159-160；即使至近日密宗的傳法，還是從上師密授。

223〈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頁349下。

224《全唐文》卷八四一，〈大周相州安陽靈泉寺故寺主大德智法師像塔之銘幷序〉，頁8848；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寶山靈泉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81-82。

225《全唐文補遺》第二冊，〈大唐崇福寺故僧錄靈晏墓誌〉，頁64。

226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唐故上柱國處士段君墓誌銘幷序〉，頁1614。

是常持「大悲咒」和「尊勝咒」：「嘗以諸佛秘密，式是摠持，誦千眼、尊勝等呪，數逾巨億，則聲輪字合，如聞一音。」[227] 在天寶元年 (742) 八月辭世的一名號「功德藏」的姚姓少年，也是持陀羅尼的：「爰自受病之初，誓心淨域，將不退轉，行陁羅尼。」[228] 在天寶十載 (751) 去世的故禹城縣令李庭訓夫人崔上真，生前「常絕葷辛，持般若經，誦陁羅尼咒。」[229] 唐德宗建中二年 (781) 八月十九日，揚州高郵尉李挺和他四個弟弟爲亡父建造一所陀羅尼經幢，在其上的題記云：

> 先考常誦持陁羅尼呪，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挺等哀苦靡訴，精誠向佛，敬造此幢幷諸功德。伏願先考疇日所曾持誦經典，永習無忘，宿世已來，或有業障，應念消除。覩文見影，皆蒙資福。[230]

從「覩文見影」之句，可知他常念誦的是「尊勝咒」。於唐敬宗寶曆三年 (827) 去世的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娥，生平「諷釋典，持真言」。[231] 在咸通二年 (861) 正月二十七日去世的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裴公之妻彭氏，生前「悟真如理性，虔奉內教。晨朝清淨，轉讀諷念諸經及真言，常滿千百遍，如此爲志，未嘗暫捨一時之功也。」[232] 又迄今在西安發現的三件陀羅尼經咒印本，和一件陀羅尼寫本，都不是出土於貴族大墓，其年代也不晚於中唐。[233]

由上可見，盛唐以後社會上陀羅尼流行之一斑；此外，在經幢上也可見到信徒持陀羅尼的記錄，在浙江歸安天寧寺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870) 建立的經幢上，有「建立幢主」鄉貢進士趙匡符記錄其唸經咒的次數：

> 念金剛經八千遍，念般若心經三萬遍，念火輪金剛眞言一萬五千遍，念佛頂尊勝陁羅尼一萬六千遍，念大悲心陁羅尼神咒一萬三千遍，念觀音□□陁羅尼二萬遍，念大悲經心眞言三萬遍，念摩王波□□□□□□萬遍。念七佛俱胝佛母心陁羅尼十萬遍，念龍樹菩薩化身一切法陁羅尼五萬遍，念

---

227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六，頁十四，〈薛氏優婆夷功德塔銘〉。

228 《全唐文補遺》第二冊，〈唐上殤姚氏（功德藏）墓誌銘〉，頁529。

229 同前書，〈故齊州禹城縣令隴西李府君（庭訓）夫人清河崔氏（上眞）墓誌銘〉，頁565上。幷見《唐代墓誌彙編》，頁1746。

230 《唐文續拾》卷四，李挺〈陁羅尼幢記〉，見《全唐文》第十一冊，頁11216下-11217上。

231 《全唐文》卷六八〇，白居易〈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序〉，頁6952上。

232 《唐代墓誌彙編》，〈唐故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裴公夫人彭氏墓誌〉，頁2381。

233 安家瑤、馮孝堂，〈西安澧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羅尼經咒〉，《考古》1998.5：91。

> 天王心眞言十萬遍，念歡喜呪十萬遍，念天廚陁羅尼三萬遍，念淨口呪二萬遍，念淨身呪二萬遍，念淨房室呪二萬遍。右匡符所念前件經呪及捨錢建立此幢，上答四重恩，下爲三屠苦，願與此福力，普救於眾生，用茲迴向心，各證菩提果。[234]

由此可知，當時流行陀羅尼的種類之多。

從盛唐以後，由於密教經咒的流行，即使樹立在寺院的經幢，也常刻多種真言咒語，如在今浙江吳興縣天寧寺宣宗大中二年 (848) 八月建立的經幢上，就刻有十一種陀羅尼。[235] 在天寧寺東首鐘樓後一所建於咸通十一年 (870) 二月十八日的經幢，上面除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之外，共刻有四種陀羅尼。[236] 如在乾符六年 (879)，一位宋姓的人氏爲了追薦亡父，在長安城南韋曲牛頭寺樹立的一所經幢上，除了「佛頂尊勝陀羅尼」之外，又刻了「大悲咒」，以及另外七種真言：「阿閦如來根本滅惡趣陁羅尼」、「淨口業真言」、「地藏菩薩破地獄真言」、「普賢菩薩滅罪真言」、「解多生冤結真言」、「文殊五髻真言」、「吉祥真言」。[237]

盛唐以迄於宋朝時期，密教有相當程度的流行。宋代都城汴梁在七月十五日時街上有人販賣紙本的「尊勝咒」，[238] 便是一證。遼代佛教興盛，尤以密教爲最，遼興宗、道宗時代經由僧人總秘大師覺苑的弘揚，信徒很多，持誦密咒者甚眾。[239] 遼天祚帝天慶二年 (1112) 白懷祐爲其亡父母造墓幢記中，稱幢主懷祐「身爲俗相，行契真宗。」[240] 遼道宗大安八年 (1092)，僧人法忍再修建如信功德幢二所，其造幢記稱：

---

234 《兩浙金石志》卷三，頁四十一至四十二，〈唐天寧寺經幢〉。

235 同前書，卷三，頁十一至十二，〈唐天寧寺經幢〉。

236 同前書，卷三，頁四十一，〈唐天寧寺經幢〉。

237 《金石萃編》卷六十七，頁十七，〈牛頭寺經幢〉；《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五，頁五十一。

238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之八，中元節，頁211。

239 塚本善隆，《中國近世佛教史の諸問題》（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五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第十〈遼代の石經續刻事業〉「道宗以來の密教の流行」，頁528-529。

240 《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白懷祐造幢記〉，頁630。

上刻佛儀，次安釋侶，化塔旁峙，欄楯環遶，鐫梵本波若波羅蜜多心經，弗□□□陀羅尼神呪，有以示密法之流通，眾俗之所歸仰也。[241]

遼代密教的流行，也清楚地反映在大量的陀羅尼經幢（包括墓幢）上，金石著錄所見，在北京房山石經山下遼代所建的經幢，就有三十所。[242]

（五）墓幢功能的多元化

經幢一則取代了部分的墓記，二則取代了部分的塔，三則由於經幢的性質是塔，可視爲塔之一種形式，而其上所刻尊勝經咒，又具特殊功效，所以有人便傾向於建立經幢，以代替樹塔。遼道宗時代，今河北新城縣衣錦鄉的佛教徒劉清等人所建經幢上，即說明了一群佛教徒認爲起塔不如建幢功德多：

……乃與邑眾同弘誓願，期備窣藏。若起塔則止藏其舍利，功德惟一。建幢則兼銘其秘奧，利益頗多。況塵颸影覆，惡脫福增，豈不謂最勝者歟？於是同鳩淨賄，恪募良緣，石采瓌貞，匠徵郢俊，建尊勝幢葬□如來首於當村精舍內前堂東南隅營其鉅址。[243]

此外，墓幢上可刊亡者遺行德化，也是墓幢受人歡迎的原因。遼天祚帝乾統三年 (1103)，師哲在其亡父墳塚旁所立的陀羅尼經幢，除了是因佛教所稱：「夫佛固萬法之言，唯陀羅尼最尊最勝，若書寫其文，凡塵霑影覆，皆得生天。且師哲爲人之子，罔不敬而信之。」還有另外一層作用，即藉著幢上所書先人事蹟，以垂典範：「今復建法幢，乃顯去靈之美，示其來裔之人，而垂不朽者哉！」[244]元惠宗至正四年 (1344) 四月十八日，鴈門驛提領王思問爲其亡父王鈞在今繁峙縣聖水村樹立的墓幢，八面，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神咒經》，和〈大元冀寧路代州鴈門驛提領王公祖考先德之銘〉。[245]

---

241 同前書，道宗編下，〈沙門法忍再建陀羅尼經幢記〉，頁450。

242 塚本善隆，《中國近世佛教史の諸問題》，頁525-528。

243《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上，〈特建葬舍利幢記〉，頁351。

244 同前書，道宗編下，〈師哲爲父造幢記〉，頁538。

245《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十六，頁三十至三十三，〈王氏墓銘經幢〉。

五、墓幢的變形

近數十年來，在陝西西安、鳳翔和四川成都等地的唐五代墓葬中，發現了一些陀羅尼經咒的寫本或雕印的紙本，作爲隨葬品。前此考古學家們多著重將它們作爲討論中國雕版印刷起源的證據；[246] 然而，若要真正了解這些經咒在墓葬中的意涵和作用，則必須將它放在墓幢發展的脈絡來看。[247]

（一）墓葬陀羅尼

前面提到樹立墓幢的目的，是爲了要消除死者的罪業，爲之免除地獄之苦，並且冀望其能往生淨土或天界。在墓葬中出土的寫本或雕版經咒，可以視之爲以另外一種將「陀羅尼」的好處傳達給死者的形式——即是將抄寫或印有陀羅尼咒文的絹布、紙張，放在死者身旁，以消除死者的罪業，使之超升天界，本文將它稱爲「墓葬陀羅尼」。

爲什麼會有「墓葬陀羅尼」的出現？牽涉到以下幾個原因：

一、無論是手寫絹本或者是雕版印刷紙本經咒的陀羅尼，它的成本都遠比石製的經幢低廉，[248] 因此，在墓幢流行的風潮下，付不起石製墓幢費用的平民，就以手寫絹本或雕版紙本經咒作爲墓幢的代替品。迄今出土墓葬雕版經咒的墳墓，都不是貴族大墓。保全認爲：書寫陀羅尼便利易行，信徒可隨身攜帶，也可以殉葬死者；有幾個陀羅尼經咒出土時就是繫於死者臂上或戴在頸上的，這種習俗在唐代可能已經相當流行。[249] 一九八三年在陝西西安西郊澧滻路自來水廠古墓，出土了一鎏金銅臂釧，寬1厘米，直徑7.9厘米，右側鉚接一長方形銅盒，內裝有折疊的手寫經咒絹畫。展開以後是26.5厘米見方的畫面，中央繪一三眼八臂

---

246 宿白，〈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收入氏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247 如洛陽龍門的瘞窟，若不將它置於唐代佛教露屍葬的背景去了解，就無法顯示出其意義。參見拙文〈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及〈石室瘞窟——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二〉。

248 保全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一文中，認爲：造幢修塔非一般信眾能力所能及，比造幢修塔更簡便易行的，便是書寫陀羅尼。《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407。

249 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頁407, 409。

的菩薩，手各執不同的法器，右上側有題楷書一行「弟子焦鐵頭一心供養」，下繪一供養人，在此四周每面路者寫有墨書古梵文經咒十三行，梵文中夾有「焦鐵頭」、「一切佛心咒」、「灌湯」、「吉界」等字（圖一一）。學者從其上所書寫古梵文係屬於悉曇體，而此一文字盛行於唐代中期，故推斷它應是中唐前後的作品。[250]

到了雕版印刷出現之後，雕印經咒的成本較手寫絹本更加便宜，更何況墓葬出土的雕版經咒，有的是佛教信徒施印贈送品，可以免費取得。如一九八五年在洛陽市東郊史家灣村古墓出土五代雕版經咒印本，上面有「報國寺僧知益發願印施」（圖一二）。[251]

二、絕大多數的雕版經咒都是「大隨求咒」，也就是《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大・1154）的「陀羅尼」部分。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有塵沾影覆的神效，可能使得信徒認爲若能直接書寫或者佩戴在亡者身上，豈不是更容易奏效？正好寶思惟所譯的《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中，除了強調此陀羅尼的滅罪得福，並且說明它是可以佩戴在身上的：

> 若有受持此神呪者，所在得勝。若能寫帶在頸者，若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最勝清淨，常爲諸天龍王之所擁護，又爲諸佛菩薩之所憶念，金剛密跡四大天王，及天帝釋大梵天王……等，晝夜而常隨逐擁護持此呪者。……若此神呪在身手者，鬼子父母摩尼跋陀神……功德天、大辯天等，恒常追逐而擁護之。[252]

因爲它有諸天的護祐，所以人們也用以祈求爲亡者滅罪，祛除惡趣，這在洛陽市東郊史家灣村古墓出土的五代雕版經咒上的題記，顯露無遺：

> 經云佛告大梵天王：此隨求陀羅尼，過去九十九億諸佛同共宣說，若人依法書寫佩戴，所有惡業重罪幷得消除。當知是人一切如來加持，一切菩薩護念，一切天龍守護，離一切災橫，除一切憂惱，滅一切惡趣。不被水火雷電毒惡之所傷害，如經廣說。[253]

迄今所發現「大隨求咒」印本中，有紀年者有北宋3件、五代1件，另外有4

---

[250] 李域錚、關雙喜，〈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寫經咒絹畫〉，《文物》1984.7：50, 52。
[251] 程永建，〈洛陽出土後唐雕印經咒〉，《文物》1992.3：96。
[252]《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冊，頁637下。
[253] 程永建，〈洛陽出土後唐雕印經咒〉，頁96。

件唐代印本，都是無紀年的。[254] 唐代印本中年代最早者，可能是一九六七年在西安澧西的西安造紙廠出土的經咒，它被塞在一個小銅管中（長約4厘米、直徑約1厘米）。此經咒印本長32.3厘米，寬28.1－28.3厘米，由三個部分組成：(1) 中心框內是墨線勾勒的人物畫，右半部是一金剛力士，右手觸摸左下方一個半蹲半跪作祈禱狀男子的暴樸頭，此即描繪《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經文中的一個圖像：「若僧帶者，於咒心中畫作一金剛神，眾寶莊嚴；下作一僧有跪合掌，金剛以手按此僧頂。」 (2) 中心方框外和印刷邊框線之間，爲雕版印刷的悉曇體「大隨求陀羅尼咒」，在印文經咒中留有空白，其上手書「荊思泰」，共有十處。該咒的繪畫年代可能在玄宗開元末年。(3) 印刷邊框之外的空白部分，有墨線勾勒密宗法器的金剛杵、三股杵、法螺、手印等。[255]（圖一三）

一九四四年在四川成都一座唐墓出土的陀羅尼經咒，被推斷爲唐末雕版經咒，它被裝在棺槨全朽屍體之右臂上的銀鐲裡。此印本爲31x34厘米，中央爲一坐在蓮座上的菩薩，六臂各執法器，其外繞刻天城體梵文經咒十七周，咒文外又雕雙欄，其中四角各菩薩像一，每邊各刻菩薩像三，而間以佛教法器圖像。印本右邊題漢文一行：（圖一四）

□□□（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近卞□□印賣咒本□□□……[256]

一九七四年在西安西郊的西安油機械廠的唐墓中，出土了外文印本的陀羅尼經咒，出土時是裝在一個銅萼托中。印本作方形，長27、寬26厘米。中央是一個寬7、長6厘米的空白方框，右上方有豎行墨書「吳德□福」四字。在方框外即是經咒，每邊均爲十三行，印文的四周圍以三重雙線邊框，內外邊框間距3厘米，其間繪有蓮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圖案。有學者根據萼托這種葬具和魏晉以來非漢民族的葬俗有關，它存在的時間很短，可能就是北朝到盛唐時，才有這種罕見的葬具，而推斷此一印本經咒係初唐——大約是七世紀初葉的印刷品。[257]

一九七五年在西安西郊的西安冶金機械廠的唐墓中，出土了漢文印本的陀羅尼經咒，裝在一個長約5－6厘米的小銅盒中。印本作方形，邊長35厘米，正中長方形框畫二人像，在人像右側，題有「佛□□□□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長

---

254 安家瑤、馮孝堂，〈西安澧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羅尼經咒〉，頁90。

255 同前文，頁87-89。

256 馮漢驥，〈記唐印本陀羅尼經咒的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7.5：50。

257 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頁407, 409。

方形框外四周，環印經咒印文，每邊各十八行，其外每邊各有手印十二種，[258] 密教色彩十分濃厚。

墓葬中出土五代雕版經咒印本，是一九八五年在洛陽市東郊史家灣村古墓被發現的，印本長38厘米，寬29.5厘米，右側爲經文和佛像：正中爲一菩薩像，經文爲梵文，有兩組，都是回旋式刻寫的。根據左側漢文題記，可知此一咒本是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927) 雕印的。[259]

「大隨求咒」的流行和墓葬陀羅尼的使用有關，同時由於「大隨求咒」的流行，也使得少數經幢，如五代吳越錢俶在梵天寺和雲林寺建造的經幢上，不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而刻《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260] 另外，它也影響到石製墓幢上除了刻「尊勝陀羅尼」之外，也附刻《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中根本咒「大隨求咒」之外的咒言：「一切佛心咒」、「一切佛心印咒」、「灌頂咒」、「灌頂印咒」、「結界咒」、「佛心咒」、「心中心咒」。[261]

（二）陀羅尼棺

遼代以後的墓葬中，出土了書寫著梵文陀羅尼的木棺或石棺，這可以說是墓幢另一種變形。河北宣化遼代墓葬中，出土了四具陀羅尼棺，木棺的棺蓋、棺身的前壁、後壁、左壁和右壁都有墨書的梵文陀羅尼，並標有陀羅尼的漢文名稱，包括了：「阿閦如來滅輕重罪障陁羅尼」、「智矩如來心破地獄真言」、「佛說生天陁羅尼」、「五字大明陁羅尼」、「六字大明陁羅尼」、「滿願陁羅尼」、「發菩提心真言」、「警覺陁羅尼」、「觀自在如意菩薩陁羅尼」、「大吉祥陁羅尼」、「一切如來大阿毗三摩耶百字密語」、「法舍利真言」。[262]

張文藻壁畫墓中出土的葬具，是一件木棺箱，長62、寬39、殘高30厘米，棺箱中貯存火葬後的骨灰（圖一五）。棺箱的前、後、左側和棺蓋上書梵文（圖一

---

[258] 同前文，頁404。

[259] 程永建，〈洛陽出土後唐雕印經咒〉，頁96。

[260] 《兩浙金石志》卷五，頁二，〈宋梵天寺經幢〉；卷五，頁三至四，〈宋雲林寺經幢〉。

[261]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册，頁639下-640上。

[26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1974-1993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28-29, 83-87, 132-133, 135-137。

六、一七），左側書四行梵文、兩行漢文，漢文作：「諸法因緣生，緣謝……吾師大沙門，常作……」。在盝式蓋的四個斜面上，墨書一周漢文：（圖一八）

陁羅尼棺以其影覆之功，冀濟魂歸之質，不聞地獄，永受天身。諒塵墨之良因，與乾坤而等固。[263]

在張匡正墓、張世本墓、張世古墓木棺盝式蓋的斜面上也都有上述的文詞。[264] 從其中「陁羅尼棺以其影覆之功」之句，顯示出它和尊勝陀羅尼墓幢的關連，也可知它其實是墓幢形式的一種變形。

另外，在遼寧省朝陽市雙塔區孟克鄉西上台村一所遼墓的墓室內，嵌有十四塊高101厘米的經板，刻有七種梵咒，多塊經板的右上角加漢文經咒名，故可知其中之一是「佛頂尊勝陀羅尼」；其他六種是：「一切如來心陀羅尼曰」、「阿閦滅輕重罪咒」、「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三昧耶密言曰」、「修造佛塔」、「大悲心陀羅尼曰」，梵文都是描金書寫的（圖一九）。墓中出土一個石函，它的蓋子和四壁都刻有梵字，梵字也是描金的（圖二〇）。又，在此墓墓頂的封土中，並且出土了經幢座，可推知此墓旁曾經立有墓幢。[265] 一九五六年在山西大同市西南郊發掘的第9、10、15號三座遼代墓葬，都出土了陀羅尼石棺，9號石棺上題有漢文「呂孝千妻馬氏」，10號墓石棺上刻「呂孝遵妻陳氏」，這三個石棺都是掩藏火葬遺骨的石棺，上面刻梵文陀羅尼（圖二一）。[266] 一九五七年同樣在山西大同郊區發現的五座遼代壁畫墓中，臥虎灣1、2號墓各有石棺一具，盝頂棺蓋上有梵文墨跡；另外，1號墓北壁上也有梵文墨跡。[267]

一直到元明時期，佛教徒仍繼續使用陀羅尼棺。一九七一年在西安東郊秦川機械廠出土元末明初時代的舍利石棺，棺蓋內有通篇右外文書，當是梵文陀羅尼棺。[268] 又，在雲南西部的火葬墓是挖一個直徑約1米、深約1米的圓形土坑，然後將裝了骨灰的罐子埋藏在裡面，四周用亂石砌緊，再以土填平。比較講究的則

---

263 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遼代壁畫墓〉，《文物》1995.2：11-13。

2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1974-1993考古發掘報告》，頁25-26, 133-134, 246-247。

265 韓國祥，〈朝陽西上台遼墓〉，《文物》2000.7：53-59。

266 山西雲崗古物保養所清理組，〈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遼、金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8.6：32-33。

26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大同郊區五座遼墓壁畫〉，《考古》1960.10：41-42。

268 王長啓、高曼，〈西安出土的舍利棺〉，《文博》2000.4：45-46。

在坑內用六塊或八塊車理石板砌成四方形的壙，石板上雕刻梵文陀羅尼和佛像。[269] 這也近似陀羅尼棺了。

在一座遼代的墓葬中，我們也看到了墓葬陀羅尼和陀羅尼棺的混合使用，一九九一年在內蒙古敖漢旗喇嘛溝大哈巴齊拉村一座遼代墓葬中，墓室的北壁、西北、東北和東西兩壁，以及棺床檐，都有墨書橫寫的梵文真言，有部分已脫落，今仍存有兩百餘字。在北側的穹窿頂中部寫著四行墨書，說明了這些梵書真言的作用，和「尊勝陀羅尼」的作用是一樣的：（圖二二）

眞言梵字觸屍骨
亡者即生淨土中
見佛聞法親授記
速證無上大菩提[270]

墓葬陀羅尼這個傳統始終不曾斷絕，傳聞清朝乾隆皇帝曾經賜宦官高雲從陀羅尼經被；[271] 時至今日，臺灣的佛教徒通常會在亡故親人的遺體上覆蓋著一方黃絹，其上印有梵文陀羅尼的「陀羅尼被」。

六、結語

從唐高宗時《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梵本的傳來，並且被譯成漢文之後，此經即迅速流傳開來；不久之後，就出現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現今所知時代最早的經幢是武則天長安二年 (702)，河北獲鹿本願寺僧人知愍與合縣道俗共同建造的石幢。原來建立經幢的目的，是爲了使人藉著經幢「塵沾影覆」的神效，可以消除一切罪業，不墮地獄等惡道，並且得以生天，速證無上菩提。根據經文的敘述，它應是置於高山上、通衢大道、寺院中。然而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也具有破地獄的功能，因此最晚從唐玄宗時代開始，便有人在墳域建立經幢，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墓幢」或「墳幢」。

目前所知最早的俗人墓幢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安興宗兄弟三人爲其亡父、

---

[269] 孫太初，〈雲南西部的火葬墓〉，頁29。

[270] 〈敖漢旗喇嘛溝遼代壁畫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1：92。在此文中原釋「見佛聞法親授記，連□無上大菩提」，當作「速證無上大菩提」。

[271] 《清史稿》卷三一九，〈和珅傳〉，頁10759：「論曰：高宗英毅，大臣有過失，不稍假借，世傳敏中以高雲從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賜陀羅尼經被，遂以不起聞。」

亡母所建的墓幢。[272] 在墳域之中，墓幢最早被安置的位置是墓前，後來也有放在墳墓之內的。僧人的墓幢變化有比較明顯的軌跡可尋，最早的形式是刻在塔上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和放在墓內的咒石；如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的〈了緣和尚塔銘〉，和玄宗天寶二年長安萬善寺比丘尼堅固「勝神道咒石」。[273] 其後，僧人的墓幢從咒石發展爲在墳旁或塔側樹立經幢，繼而更將僧人遺骨葬在幢下，成爲「下藏舍利，上建經幢」的墓幢。從九世紀中，就有僧人建立這種埋藏遺骨的墓幢，但到十一世紀才正式出現「舍利經幢」的名稱。

由於墓幢是樹立在墳域或置於墳墓之內，它的功能主要是拯濟墓主免於地獄之苦，因此它的製作就不像一般置於交通要道、高山或寺院等公共場所的經幢那般講究。隨著墓幢的增加，經幢製作精細的程度也逐漸下降：多數的墓幢是僅刻咒，而不刻經文，規模也較小，大都在1米左右。它們和一般經幢最大的不同是：墓幢的造幢記多是和墓主有關的內容，有的僅簡單地交代墓主的去世年月，有的亦兼述墓主的行狀。最早研究經幢的清代學者葉昌熾對於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以後經幢的批評是：「製作愈簡」、「書法每下愈況」、「由繁而約」。玄宗時代正是墓幢開始出現的時期，其後墓幢在經幢中佔很高的比例，葉氏的批評恰好呈現出盛唐以後墓幢日趨流行所產生的變化。

經幢中以墓幢居多數的原因，係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原來具有滅罪、祛病、長壽、免除一切惡道等功能，但是後來其破地獄功能幾乎掩蓋了其它的功能，[274] 這和地獄信仰的流行有關。唐代以後地獄信仰的流行，主要受到北朝末年逐漸形成的淨土教和隋朝末年新興的三階教有關；另外，唐末興起的十王信仰，更加深了人們對墮落地獄的恐怖。它們和墓幢的建立與流行有著相輔相成的關連，如在三階教的僧俗埋葬聖地——長安終南山的百塔寺，就有兩所唐代三階教僧人的墓幢。據塚本善隆的研究，在九世紀前後出現了十王信仰和引路菩薩的信仰，兩者透過淨土教而連結在一起。在五代以後的墓幢上可見到引路菩薩、十王經典、十王像的記載，以及淨土教中最主要教義之一「臨終來迎」的陳述。

九世紀以後，建立墓幢以拯濟墓主的觀念逐漸和孝道結合在一起，墓幢的題記中也出現將建造墓幢和孝道連結的文詞，如認爲建幢是「孝子永思之道」，甚

---

272 同註32。

273 見註37, 38。

274 拙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頁152-153。

至認爲「苟未能爲幢於墳，則是爲不孝。」俗家信徒建立墓幢以報父母恩，僧侶也以建立墓幢或舍利經幢以報師恩。

近數十年來，在唐五代以迄元代的墓葬中，陸續出土了一些手寫經咒絹畫和雕版經咒，以及在棺木上刻有梵文陀羅尼的「陀羅尼棺」，本文將之稱爲「墓葬陀羅尼」。它們可以說是一種墓幢的變形，將「陀羅尼」濟拔亡者地獄之苦的作用，以另外一種形式傳達給死者；也就是說，從墓幢上「佛頂尊勝陀羅尼」的塵沾影覆，轉變成書寫「大隨求咒」的貼身護祐，以消除死者的罪業，使之超升天界。只有從墓幢這個角度來看「墓葬陀羅尼」，才能找出它們在墓葬中的淵源和意涵。此外，遼、金時期的墓幢上多有梵文的陀羅尼，以及遼代墓葬中出土的梵文陀羅尼棺，則顯示出遼、金時期密教的流行，和對梵文經咒的重視。

本文未列入討論的是佛塔地宮中的經幢。遼寧朝陽北塔地宮中出土了一通高5.26米的經幢。[275] 由於地宮也是埋藏舍利之所，因此，地宮的經幢之意涵是否近似於墓幢？則有待未來更多的文物出土，或可解答這個問題。

[275] 朝陽北塔考古勘查隊，〈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2.7：21-22。

附論：經幢的各種宗教作用

經幢的建造，是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緣故，此一經典上原來敘述要將書寫著「尊勝陀羅尼」的絹帛紙張，置於高的幢竿、高山、高樓，或於窣堵波（塔）中，以它塵沾影覆的功效，達到滅除罪障，免於墮落地獄、餓鬼、畜生惡道的酷苦。然而，自盛唐經幢開始建立之後，從經幢上鐫刻的造幢記，可知對於佛教徒而言，經幢不僅有上述滅罪、淨除惡道的功能，它還有以下九項宗教功能，分別敘述如下：

（一）祭拜供養

經幢是僧俗信徒禮拜致敬的對象，他們或是在幢前焚香，或是置香花供養。唐玄宗天寶元年 (742)，吏部令史擧宗、王彥昇等人，集資在吏部南曹的交露精舍前樹立了一所經幢，其上鐫刻的〈吏部南曹石幢頌并序〉云：

> 建幢題經，依教護法，於交露精舍，爲七寶□□，每煙爐焚香，泼罐澡水，果因心舉誠感通，所以明空神持告天帝，有請以大威力□宏誓願，茲乃□之像教導之浮生也。[1]

可知在此一經幢前是置有香爐的，還可舉行「泼罐澡水」的儀式。又如唐憲宗元和六年 (811)，內侍省一群宦官們捨俸所建立經幢上的讚序，也有「從此幢前香起，石上塵飛，落輕衣以拂災，歷諸境而戢殺。」[2] 的詞語。唐文宗開成五年 (840)，葉再榮等人在浙江上虞縣等慈寺建立的一所經幢上，便說：「淨信弟子葉再榮并妻童氏，男五人倩春、乂邁皓共立，永充供養。」[3] 另外，在某些佛教特定的節日如七月十五日，在經幢前也有特別的供養，如在今河北獲鹿縣本願寺有一所唐中宗景龍年間 (707-710) 所造的經幢，上面有「七月十五日憧惻長造花槃供養人曾義瓚」的題名。[4] 何以七月十五日盂蘭盆節要在幢前特別置花槃供養？這是因爲盂蘭盆節和地獄的救贖有關，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也有免除生者、亡過者地獄之苦的功能。

---

[1]《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五至六，〈吏部南曹石幢頌并序〉。

[2] 同前書，卷六十六，頁三十三，〈衛洵讚經幢〉。按：唐代內官多奉佛，見拙文〈中古的宦官與佛教〉，收入《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

[3]《兩浙金石志》卷二，頁四十一，〈唐等慈寺經幢〉。

[4]《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六，頁四至十八，〈本願寺曾慶善等造幢題名〉。

（二）刻石傳經

經幢的建造者認爲建幢也有流傳經典的功能，北朝以來末法思想的流行，佛教徒展開石刻佛經的工作，使得經幢的建造者，也認爲建幢是具有傳經和維護佛法的功能。前述吏部南曹交露精舍前經幢的造幢記，就有「建幢題經，依教護法」之句，[5] 即使是樹立在墳墓之側的墓幢，也被認爲具有刻經傳世的功能，如唐文宗開成五年 (840)，元政爲其亡父母所立的墓幢銘讚，也有「刻石傳經」之語。[6]

（三）爲拓本流傳用

在印刷術還沒有出現之前，文書的流傳除了傳寫之外，還有碑拓這個方法——即用紙墨拓取石刻文字。在南北朝末年時，可能就有紙墨拓碑方法，唐代把碑拓稱作「打本」。[7] 有些經幢製作的目的原來就是爲了讓人墨拓，使此經本能夠廣爲流傳，唐憲宗元和八年 (813)，一名佛教徒那羅延在她所建造的經幢上，就明白地說此經幢是爲供人氈拓，廣爲流傳之用的：

> 大唐元和八年癸巳之歲，八月辛巳朔五日乙酉，女弟子那羅延建尊勝碑，打本散施，同願受持。[8]

關於石經幢可提供拓本流傳之用，在其他的經幢裡也可得到印證，唐懿宗咸通七年 (866) 黃順儀爲亡女練師廿二娘所造的墓幢上，有「佛頂尊勝陀羅尼，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9] 可知洛陽福先寺的尊勝經幢是供人拓印的。

（四）超薦親人或亡者之用

以建幢的功德，爲超薦亡者之用，如在秀水縣本覺寺前，有一所唐咸通十三年 (872) 所樹立的經幢，是左武衛胄曹參軍沈□及其二弟爲其亡父所建的，「伏恐先考府君在生之日，或有業障，未得解脫，願承此功德，永離幽□。」[10] 浙江

---

[5]《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五，〈吏部南曹石幢頌幷序〉。

[6] 同前書，卷六十七，頁四至五，〈元政經幢〉。

[7] 施蟄存，《金石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四、談拓本」，頁12-14。

[8]《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四，〈那羅延經幢〉。

[9]《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三，〈黃順儀尊勝幢記〉。

[10] 同前書，卷四十八，頁二十，〈胄曹參軍沈□尊勝大悲幢記〉。

吳興縣天寧寺禪堂前經幢，就是唐僖宗乾符五年 (878) 時，范信爲亡妻三十二娘子所造的。[11] 以上的經幢不樹立在墓前，而是置於寺院，其理由可能是其埋葬之地不遠，又可兼鎭寺院，如今山西臨猗縣雁塔寺（唐時爲妙道寺），有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 王贇爲追薦亡母李氏所建的尊勝經幢，在其造幢記中即說明置諸寺院的理由云：

> 乃豎於妙道寺庭側，魂指淨域而非遙，面禮彌陀而不遠。庶乎天長地久，罔離種福之方；暑往寒來，永鎭修行之地。[12]

這種經幢有的是在亡者去世多年後才建造的，後晉高祖天福二年 (937)，孫紹榮因其子患病，故捨財建幢二所，追薦亡考十五郎，「意者追薦先靈，拔超冥路，伏願速登彼岸，長被勝因。」[13] 其後隱藏一個觀念，即祖先不安是導致子孫生病的原因，所以建幢追薦先靈，兼爲子祈福。

一九八八年在南京出土的北宋太平興國二年 (977) 四月十七日，李承謙爲亡弟買的尊勝陀羅尼幢，「並上幡壹首，設五十僧齋，功德敬爲亡弟六郎。今晨大祥，追薦生界。」[14] 從經幢上的文字，可知建幢追薦亡者，擇期舉行追薦法會，並以其他齋僧、上幡的功德，一併爲亡者祈福。

有的經幢甚至是爲超薦孤魂野鬼而建造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1008)，僧紹元在今福建泉州市水陸寺所建的經幢，其地是佛教徒陳僧捨宅爲寺：「是地比接肆屠，□□鱗介□類，於茲致命，稻麻竹葦，數不足多。矧乎在昔分野災興，民心悖亂，觸□綱者□□□是孤魂冤識，非妙幢神呪之力，何以拔其幽滯？信矣斯幢樹焉，厥利博哉。」[15]

（五）滅罪

「佛頂尊勝陀羅尼」有滅罪的功能，如在四川大足縣大鐘寺出土兩座宋代經幢，其中編號第36的「尊勝陀羅尼經幢」，建於宋仁宗皇祐四年 (1052)，八面，每面均刻文字，僅存中部一節，係一〈造幢記〉，其中說明死者王氏的妻子兒孫

---

[11]《兩浙金石志》卷三，頁四十六，〈唐天寧寺斷經幢〉。
[12]《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一，頁一，〈雁塔寺經幢〉。
[13]《兩浙金石志》卷四，頁九，〈後晉高明寺經幢〉。
[14] 王志高、張金喜，〈南京發現北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東南文化》1988.4：56。
[15]《閩中金石略》卷三，頁十八，〈水陸寺陁羅尼經幢〉。

造此幢的原因，是爲贖救其生前所犯一些罪過：「使今者發心鐫造勝幢一座供養，所得善利，解救□□大前等存日所作數件過罪。」文中一一列舉死者生前所犯的罪過，如偷竊、放火、與兄弟分祖產不平等事。後刻「佛頂尊勝陀羅尼」。[16]

（六）鎮土地、鎮海眼

因爲尊勝幢具有無比的威力，所以可以鎮壓凶惡之物，可以鎮海眼，也可以鎮土地，因此尊勝經幢也稱之爲「鎮幢」。

如後唐明宗長興四年 (933)，吳越錢元瓘在浙江蕭山縣西興鎮狹牢地，建立化度禪院（今改爲明化寺），並樹立尊勝經幢，在其上所刻的〈建化度禪院寶幢記〉上，即說明建寺造幢，皆是爲了超渡淪亡，兼以鎮此土地：

> 昨以西興城壘之內，曩歲曾別置狹牢。雖宰斷至明，固無枉濫；而縻縶稍滯，或有淪亡，念茲綿歷重泉，何由解脫？於是變圓扉而崇梵宇，開紺殿而立睟容，仍建寶幢，鎮茲土地。[17]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 (859) 在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縣）縣署，樹立了一所經幢，原來是因此地「地有湧泉，云是海眼，大中十三年立此鎮之。」[18] 又，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山麓乾明寺（修建於唐咸通年間）殿前廣場中，矗立著一高約5米的鐵幢，作七層，在第五層鑄《波若波羅蜜多心經》。此幢建立的年代可能和建寺同時，幢側有一古井，傳說：「井水與海水相通，深不可測，井內系有一惡龍，常興風作浪，鐵幢就是爲鎮壓這條惡龍而建立的。」[19] 元代所修的《嘉禾志》稱嘉禾縣（今福建建陽縣）望雲橋北有一石幢：「因昔有湧泉，云是海眼，立幢於上以鎮之。」並有詩云：「矻立應千載，傳因海眼成。蓬萊水清淺，曾不見欹傾。」[20] 此處稱「矻立應千載」是詩人的想像，經幢最早創建於盛唐，距元代不及千年。由上可知，從唐代以來，就有建立經幢用以鎮海眼的作法。

---

[16] 鄧之金，〈大足縣大鐘寺宋代圓雕石刻遺址調查〉，《四川文物》1989.5：51。

[17]《兩浙金石志》卷四，頁四，〈後唐化度禪院經幢〉。

[18] 清・趙弘恩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乾隆二年重修本，收入《中國省志彙編》〔臺北：華文書局，1967〕之一），卷三十一，古蹟，頁四十七。

[19] 戴亞東，〈常德市乾明寺的唐代鐵幢〉，《文物參考資料》1958.1：83-84。

[20] 元・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晒藍本，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嘉惠堂丁氏鈔本晒印），卷二十八，「石幢」。

另外，建幢也有鎮土地的功能。如遼道宗咸雍九年 (1073) 河北涞水縣遒亭鄉水東村的佛教信徒所組織的邑會，修建香幢的目的是「今施香幢，保鎮當村。□災勿起，八方咸懽。」[21]

（七）禳災祈福

唐代以後，佛教徒造經幢以祈福禳災。遼代上都有佛教徒張楚璧等人，眼見四方不安靖，人民飽受辛苦，故造一座尊勝陀羅尼經幢，以鎮劫災。

> 爰有信士張楚璧、張懷璧、張庭芝等，信心曩劫，仰託玄門。屬四方不寧，黎人塗炭，憑茲幢之威力，靜遐劫之氛災。……諷詠者，無善而不臻；瞻仰者，無殃累而不剪。其功也頗算，其利也難量。龍神四遶以護持，賢聖雲飛而證實，既居形勝，冀長劫之永安。

稱尊勝經幢之功效是「殃無不殄，福無不盈。」[22]

前面滅罪條中提及在四川大足縣大鐘寺出土兩座宋代經幢，其中編號第36的「尊勝陀羅尼經幢」中，除了爲懺除死者王氏所犯的罪業之外，更重要的是祈求死者的妻子兒孫不遭災難，其〈造幢記〉中說：「□心王姓人犯自死亡，又恐累年一家所遭災難，邪鬼退還，每有宰煞，四足兩足，之數祭祀……女弟子王氏、羅亨、羅泰等，伏爲邇年一家眷屬，不遭災難。」[23]

如在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1187) 九月，在平江府崑山縣（今江蘇嘉定縣）縣獄蕭王祠內，樹立的一所經幢，就是爲了祈求當地安寧而建的：

> 伏覩當境比年以來兇惡至多，風俗不嘉，謹募眾緣，建（闕）摩訶般若偈帝寶幢壹座，鎮壓此方。惟願自此匈人屏息，萬福咸臻，物阜時和，風調雨順者。[24]

此幢八面，其中一面勒「祝延清甯，保國安民」八個大字，另外有五面除「尊勝心呪」之外，另刻「大功德天呪」、「偈帝呪」、「金剛穢跡神呪」。上面的造

---

[21]《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上，〈水東村傅逐秀等造香幢記〉，頁364。

[22] 同前書，補編，〈張楚璧等造幢記〉，頁694-695。

[23] 鄧之金，〈大足縣大鐘寺宋代圓雕石刻遺址調查〉，頁51。

[24]《江蘇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三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金石十三，頁十八，〈摩訶般若揭帝寶幢〉。

幢記稱此幢爲「摩訶般若偈帝寶幢」，係因當地的人相信「偈帝呪」可驅魔逐邪。《吳中紀聞》記載常熟破山寺僧誦「偈帝呪」以驅龍，破山寺而去事。[25]「偈帝呪」即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中的咒：「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帝，菩提薩婆訶。」此幢的建立和唐以來《心經》的流行，以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幢」的建立有關。[26]

（八）延壽祈福

在浙江吳興縣天寧寺山門後，有一所會昌年間由范陽湯君所建立的經幢，在此幢上的讚詞云：「范陽湯君兮惟德是崇，建幢立福兮邈然清風。」[27] 說明建幢是爲個人祈福。在唐憲宗元和六年 (811) 廬州盧江縣尉衛洵所寫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讚并序〉云：「大覺妙力，尊勝其強。增壽益齡，夷災殄殃。」[28] 在長安終南山真空寺唐文宗大和六年 (632) 八月十日所樹立的一所石經幢，是當寺寺主法峻捨財所建的，其造幢記便說：「況能捨施，專精石幢，可以延師之祿，滋師之福。美矣哉！演自金口，以祐賢人。」[29] 咸通十年 (869) 張珂在青州所建立的尊勝寶幢，就是爲祈求家人平安而建造的：「張公乃俗務之下，不倦修崇，禮樂之餘，無□心香。佛躰夙願，無不稱遂，南北無虞，合家平安，永增福慶。」[30]

這種爲祈求福祐的經幢，也稱爲「福惠幢」。[31] 遼代都亭驛使王恕榮個人至少就爲了他的家人建立五所經幢，其目的主要是爲求「家道吉昌」，他在景宗保寧元年 (969) 遷移其中一所經幢，其造幢記就敘述了他建造經幢的緣由及其願望：

> 維大遼保寧元年六月十五日，都亭驛使太原王公恕榮，爲皇妣自會同九年□捨資□廣陳勝事，□於茲金地，特建妙幢，在經藏前集功德□□□果

---

[25] 同前註。

[26] 參見拙文，〈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頁671。

[27]《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二十九，〈范陽湯君尊勝幢銘〉。

[28]《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三，〈衛洵讚經幢〉。

[29] 同前書，卷六十六，頁四十三，〈眞空寺經幢〉。

[30]《山左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九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十三，頁二十二至二十三，〈張珂尊勝石經幢〉。

[31]《遼代石刻文編》，補編，〈福惠幢記〉，頁703。

報，家道吉昌。既稍備於珍財，乃更□□利益，就奉福寺文殊殿前，又建經（一作法）幢；於灞村之墳、京東之墓，各置佛頂尊勝陀羅尼幢一所。前後四處，咸仗六通，亦可廕及子孫，門風不墜。[32]

（九）報德建幢

從北朝以來，就有以造像的方式，爲他們所感恩的對象造像祈福者，也就是所謂的「報德像碑」。[33] 由於樹立經幢和建造佛像一樣，可以累積功德，因此也有以建造經幢的方式以報答恩澤者，如河南登封永泰寺庭的一對經幢，是張崇超及其妻彭氏各爲其一子一女出家所造的，除了替他們祈福之外，也爲報答其師僧的慈愛教化。東幢建於天寶九載 (750)，西幢建於天寶十二載 (753)，係其「所以表愛子之□心，答和上之慈造。」而建造的經幢。[34] 另外，唐文宗大和八年 (834)，義成軍節度使押衙田仜爲其長官所建的經幢，就是一種報德經幢，在造幢記中就說：「義成軍節度使押衙田仜等奉爲尚書立尊勝陀羅尼幢序」，在文中敘述節度使的德政「未□以報也，遂僉議佛經有尊勝陁羅尼者，功德宏廓，……仰其佛功，用答殊造，所望節幢等法幢同立，比石齊堅，仁壽等並長，承時偕慶，天照誠感，人願必從。」[35] 唐僖宗廣明二年 (881) 四月，易州市老爲易州刺史李□造一尊勝陀羅尼幢，置於開元寺，在造幢記中即稱：「公之賢，其孰能繼，誠歎詠之不足，遂冀呼以無窮□□□□□陁羅尼幢，立在開元寺。上以光昭懿績，次以顯答休恩，是宜刻石傳功，垂文著美。將依妙法，式贊嘉猷。」[36]

（本文於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

[32] 同前書，景宗編，〈重移陀羅尼幢記〉，頁45。

[33] 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二函三册，〈報德象碑〉，頁633-648。

[34]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三，〈永泰寺東幢記〉；頁五，〈永泰寺西幢記〉。

[35] 《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四十五至四十六，〈田仜等經幢〉。

[36] 《金石續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五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十二，頁一至三，〈開元寺隴西公經幢讚〉。

引用書目

一、原手文獻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967），唐・佛陀波利譯，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冊。
《佛說大阿彌陀經》（大・364），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二冊。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36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二冊。
《法苑珠林》（大・2122），唐・道世，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三冊。
《高僧傳》（大・2059），梁・慧皎，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
《經律異相》（大・2121），梁・寶唱等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三冊。
《歷代三寶紀》（大・2034），隋・費長房，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九冊。
《續高僧傳》（大・2060），唐・道宣撰，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
《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七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山右石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山左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九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江蘇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三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兩浙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四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昌樂金石續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七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金石續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五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益都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益都縣圖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七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八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滿洲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三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滿洲金石志補遺》，羅福頤輯，《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三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閩中金石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七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四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寶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四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至元嘉禾志》，元・單慶修，徐碩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晒藍本，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嘉惠堂丁氏鈔本晒印。
《唐代墓誌彙編》，周紹良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高陵碑石》，董國柱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漢魏南北朝墓志彙編》，趙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語石・語石異同評》，清・葉昌熾撰，柯昌泗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
《魯迅輯校石刻手稿》，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
《遼代石刻文編》，向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二、傳統文獻

《大漢原陵秘葬經》，張景文，收入《藏外道書》第一冊，據永樂大典本影印，成都：巴蜀書社，1992。
《山堂肆考》，明・彭大翼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九七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太平廣記》，李昉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61。
《白居易集箋校》，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江南通志》，清・趙弘恩等監修，清・黃之雋等編纂，乾隆二年重修本，收入《中國省志彙編》之一，臺北：華文書局，1967。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輯，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全唐文》（附《唐文拾遺》、《唐文續拾》），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全唐文補遺》，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吳綱主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東京夢華錄注》，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
《校本歷代名畫記》，唐・張彥遠撰，谷口鐵雄編，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1。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8。
《劍南詩稿校注》，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三、近人論著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0 〈山西大同郊區五座遼墓壁畫〉，《考古》1960.10。
山西雲崗古物保養所清理組
1958 〈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遼、金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8.6。
王志高、張金喜
1988 〈南京發現北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東南文化》1988.4。
王長啓、高曼
2000 〈西安出土的舍利棺〉，《文博》2000.4。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
1972 〈近年來北京發現的幾座遼墓〉，《考古》1972.3。
未標作者
1999 〈敖漢旗羊山1-3號遼墓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1。
未標作者
1999 〈敖漢旗喇嘛溝遼代壁畫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1。
安家瑤、馮孝堂
1998 〈西安澧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羅尼經咒〉，《考古》1998.5。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
1999 〈成都市五代墓出土尊勝陀羅尼石刻〉，《四川文物》1999.3。
李域錚、關雙喜
1984 〈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寫經咒絹畫〉，《文物》1984.7。
杜斗城
1989 〈《地獄變相》初探〉，《敦煌學輯刊》1989.1。
1989 《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錄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2001 《宣化遼墓——1974-1993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張家口市文物管理處、宣化區文物管理所
1996 〈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9。
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
1991 《寶山靈泉寺》，河南人民出版社。
尙曉波
1989 〈遼寧省朝陽市發現遼代龔祥墓〉，《北方文物》1989.4。
保全
1987 〈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
施蟄存
1997 《金石叢話》，北京：中華書局。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1984 〈洛陽徐村發現一批唐代石刻造像〉，《中原文物》1984.3。
1990 《洛陽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朝華出版社。
唐亮
1992 〈西昌新發現元代經幢〉，《四川文物》1992.4。
孫太初
1955 〈雲南西部的火葬墓〉，《考古通訊》1955.4。
1963 〈大理國彥貴趙興明爲亡母造尊勝幢跋〉，《考古》1963.6。
1983 《雲南古代石刻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
孫學瑞
2001 〈遼朔州李氏墓地經幢〉，《遼金史論集》第六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徐苹芳
1995 〈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收入氏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59 〈陝西所見的唐代經幢〉，《文物》1959.8。
宿白
1988 〈法門寺塔地宮文物反映的一些問題——法門寺塔地宮出土文物筆談〉，《文物》1988.10。
1999 〈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收入氏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

張乃翥
1989 〈龍門藏幢讀跋兩題〉，《敦煌研究》1989.2。
1998 〈跋龍門石窟近藏長安三年、大中六年之幢塔刻石〉，《敦煌研究》1998.1。
張先得
1980 〈北京市大興縣遼代馬直溫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12。
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保管所
1995 〈河北宣化遼代壁畫墓〉，《文物》1995.2。
陳揚炯
2000 《中國淨土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傅宗德
1992 〈喀左顧杖子村出土金大定二十五年墓幢〉，《遼海文物學刊》1992.1。
朝陽北塔考古勘查隊
1992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2.7。
湯用彤
1983 《湯用彤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程永建
1992 〈洛陽出土後唐雕印經咒〉，《文物》1992.3。
馮漢驥
1957 〈記唐印本陀羅尼經咒的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7.5。
黃吉君
2000 〈洛陽發現佛頂尊勝陀羅尼北宋墓幢〉，《中原文物》2000.2。
黃承宗
1983 〈西昌附近的古代火葬墓〉，《文物資料叢刊》7。
1987 〈西昌新發現元代梵文石碑〉，《文物》1987.2。
蒲慕州
1995 《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齊心、劉精義
1980 〈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1980.2。
劉長東
2000 〈論隋唐三階教與淨土教的關係〉，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編，《新國學》2，成都：巴蜀書社。
劉淑芬
1996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

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45-193。
1997 〈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643-786。
1998 〈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大陸雜誌》96.1-96.3。
1999 〈石室瘞窟——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二〉，《大陸雜誌》98.2、98.3。
1999 〈中古的宦官與佛教〉，收入《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劉耀輝
1999 〈北京遼墓初探〉，《北京文博》1999.4。

鄧之金
1989 〈大足縣大鐘寺宋代圓雕石刻遺址調查〉，《四川文物》1989.5。

鄭州市博物館
1983 〈鄭州開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3.1。

蕭登福
1989 《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臺北：學生書局。

遼寧省朝陽縣文物管理所
1996 〈遼寧朝陽縣聯合鄉金墓〉，《華夏考古》1996.3。

戴亞東
1958 〈常德市乾明寺的唐代鐵幢〉，《文物參考資料》1958.1。

韓國祥
2000 〈朝陽西上台遼墓〉，《文物》2000.7。

蘇州市文管會、蘇州博物館
1979 〈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11。

大村西崖
1986 《密教發達志》，收入《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74冊，臺北：華宇出版社。

小笠原宣秀
1951 《中國淨土教家の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
1963 《中國近世淨土教史の研究》，京都：百華苑。

中野玄三
1975 《來迎圖の美術》，京都：同朋舍。

矢吹慶輝
1973 《三階教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27一刷，1973二刷。

竹島卓一、島田正郎
1976 《中國文化史蹟增補》，京都：法藏館。
松有長慶
1981 《密教經典成立史論》，京都：法藏館，1981二刷。
牧田諦亮
1976 《疑經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長部和雄
1990 《唐代密教史雜考》，東京：溪水社。
望月信亨
1942 《中國淨土教理史》，京都：法藏館。
塚本善隆
1937 〈續三階教資料雜記〉，《支那佛教史學》1.2。
1975 《中國近世佛教史の諸問題》，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五卷》，東京：大東出版社。
1975 〈引路菩薩信仰と地藏十王信仰〉，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七卷・淨土宗史・美術篇》，東京：大東出版社。
道端良秀
1960 〈中國佛教に於ける地獄の恐怖〉，《印度學佛教學研究》8.2。
賴富本宏
1988 《大乘佛典・中國日本篇・第八卷　中國密教》，東京：中央公論社。
藤田宏達
1964 〈臨終來迎思想の起源〉，《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2.2。
關野貞、竹島卓一
1935 《遼金時代の建築と其佛像》，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Schopen, Gregory
1997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eiser, Stephen F.
1988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ortuary Pillars and the Cult of the Dead in T'ang-Sung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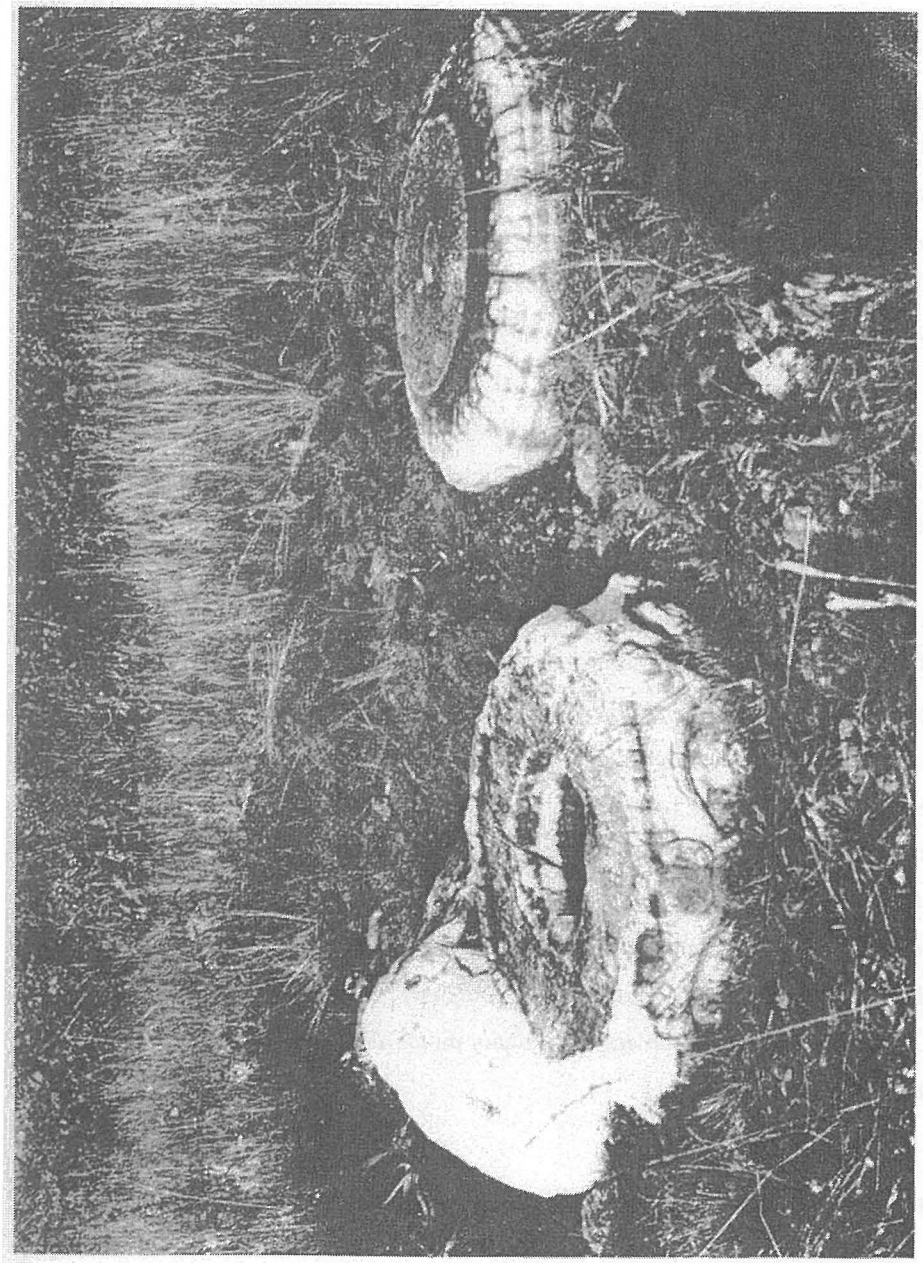
Shu-fen L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is the third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that I have written about *dharani* pillars (*ching-ch'uang* 經幢), *Fo-ting tsun-sheng t'o-lo-ni ching*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ntric Buddhism in T'ang-Sung China. It focuses on the most popular type of *dharani* pillar of the medieval era, mortuary pillars engraved with *dharani* (*mu-ch'uang* 墓幢), which were erected at *stupas* housing the remains of members of the *sangha*, as well as the tombs of lay Buddhists. I begin by describing various types of mortuary pillars,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t forms, but devote most of the paper to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spread of mortuary pillars during the T'ang-Sung era. My research reveals that mortuary pillars became highly popular at this time in large part due to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Buddhist ideas about the underworld, as well as the belief that certain *dharani* (particularly the *Tsun-sheng t'o-lo-ni* 尊勝陀羅尼) wer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rites to free the souls of the dead from torment. Thus, the merging of practices linked to mortuary pillars with indigenous Chinese concepts like filial piety (*hsiao* 孝) served to enhance the overall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such *dharani* pill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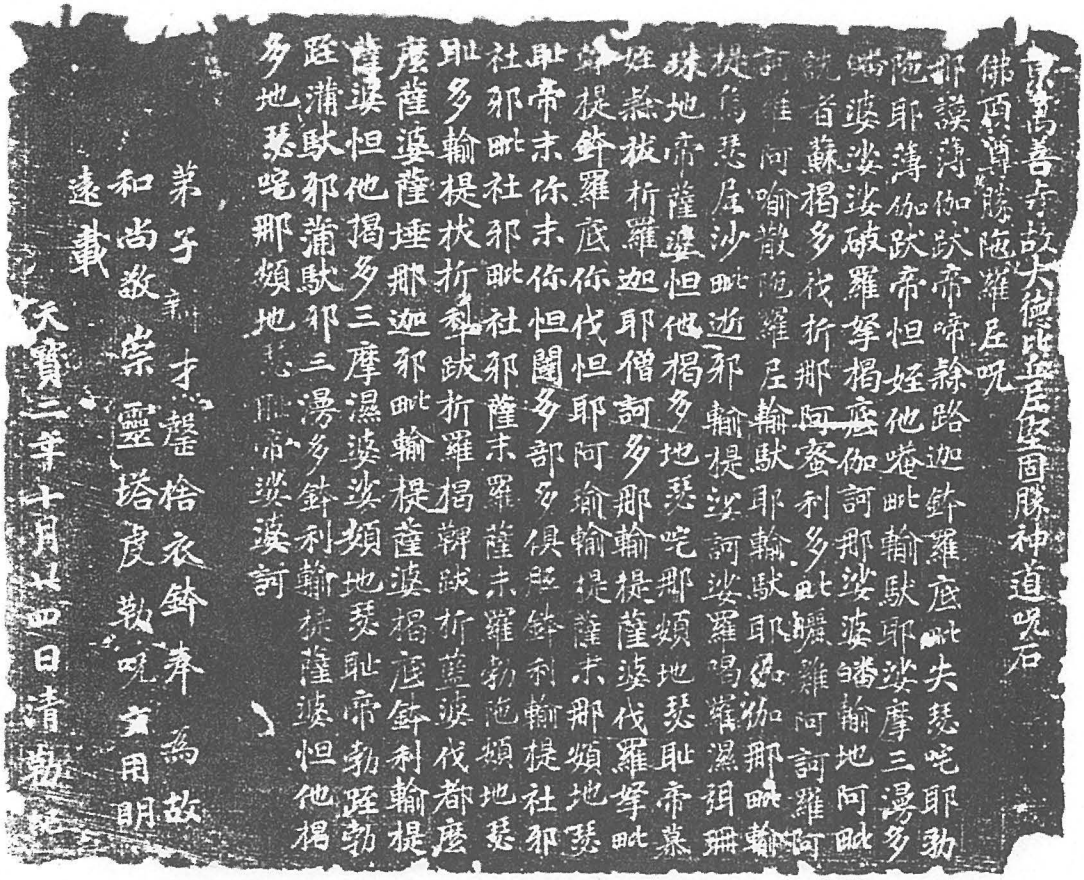
In recent years, archaeologists working at tombs dating from the T'ang to the Yüan dynasties have unearthed silk paintings or wood carving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spells (*ching-chou* 經咒), as well as wooden coffins inscribed with *dharani*. I refer to these objects as burial *dharani* (*mu-tsang t'o-lo-ni* 墓葬陀羅尼), and argue that they represent a modified form of mortuary pillars designed to provide another means for rescuing the souls of the dead from torment in the underworld. Moreover, considering burial *dharani*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rtuary pillars allows us to better appreciate their origins and overall significance.

Keywords: *dharani* pillars, mortuary pillars, *dharani*, relics, Tantric Buddh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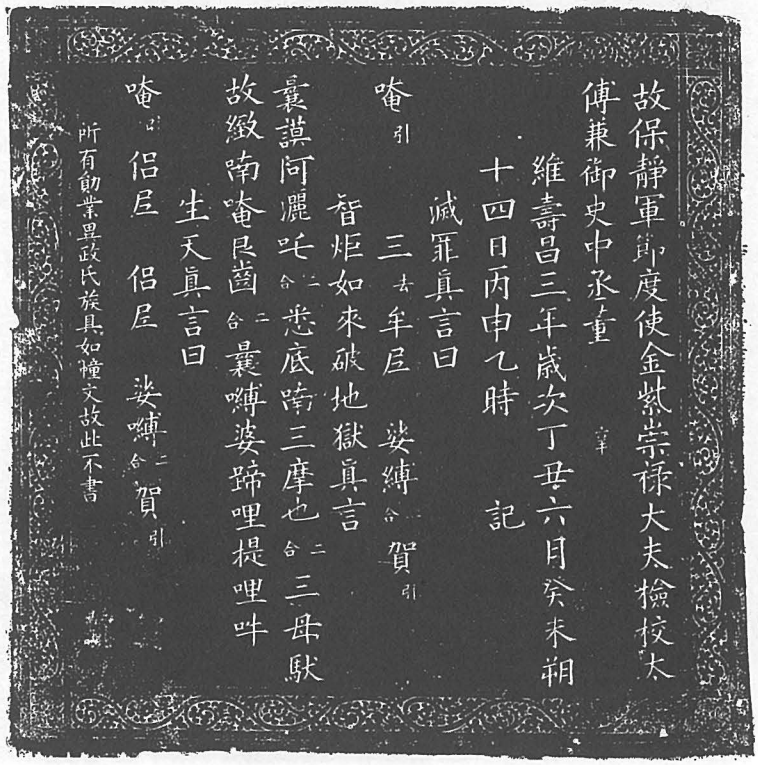
圖一：遼興宗永興陵石幢殘石

竹島卓一、島田正郎，《中國文化史蹟增補》（京都：法藏館，1976），圖版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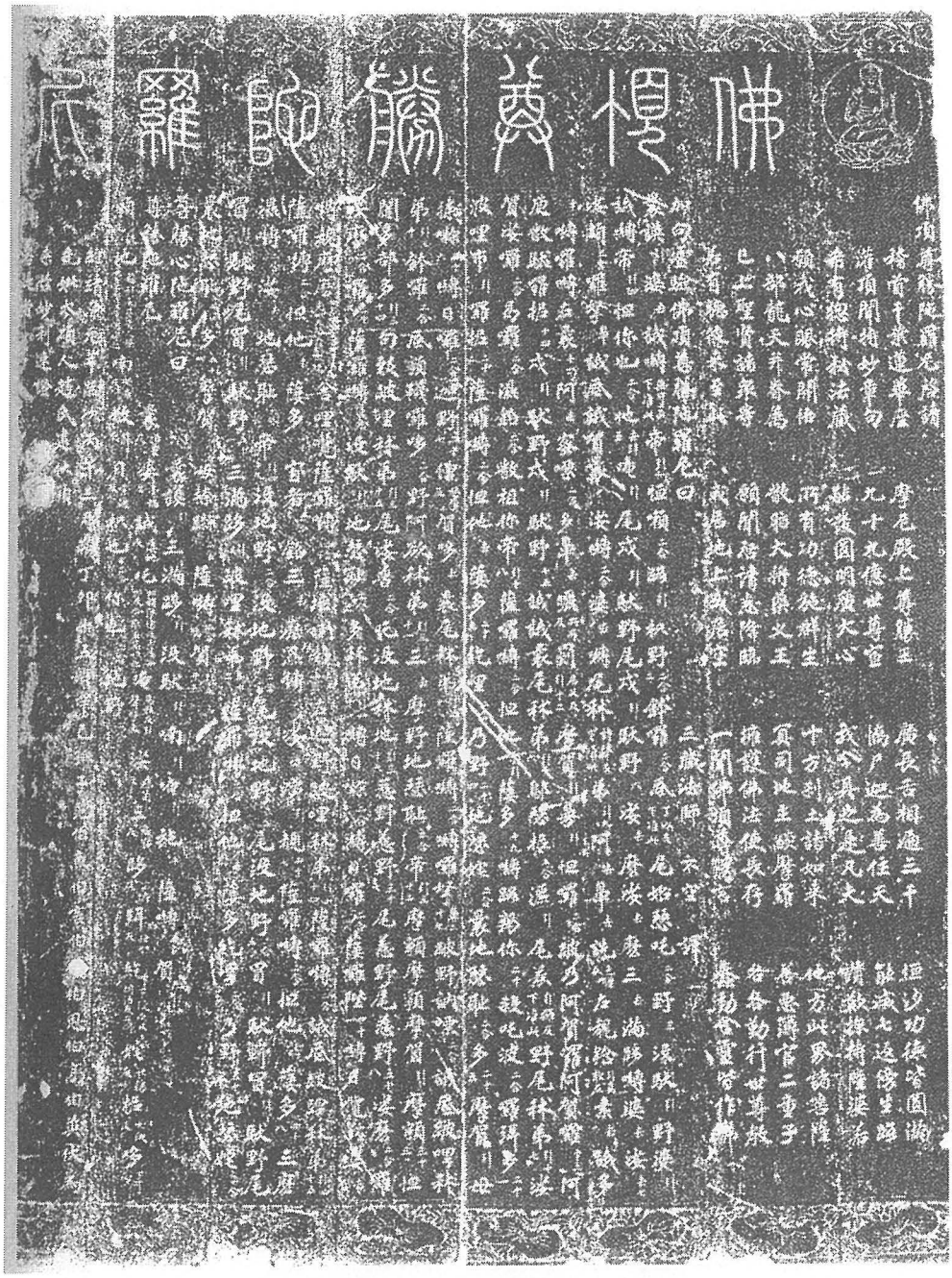
圖二：唐・比丘尼堅固勝神道咒石

董國柱編，《高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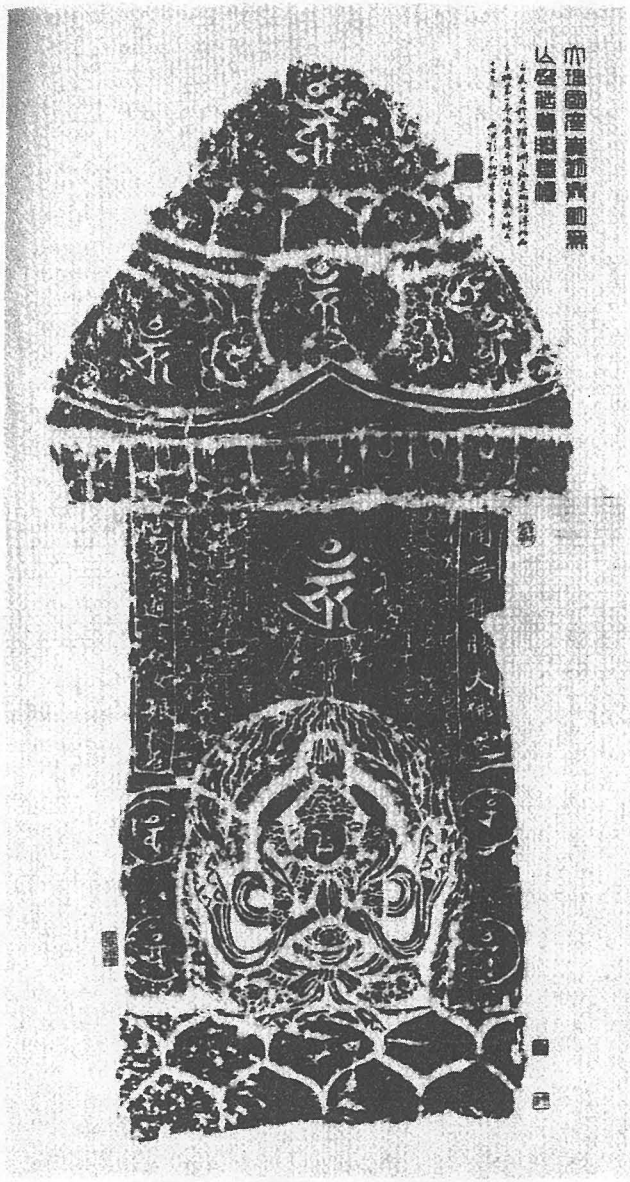
圖三：遼・董庠墓出土的咒石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近年來北京發現的幾座遼墓〉，《考古》1972.3：37。



圖四：北宋・范伯魚爲亡母所造墓幢

黃吉君，〈洛陽發現佛頂尊勝陀羅尼北宋墓幢〉，《中原文物》2000.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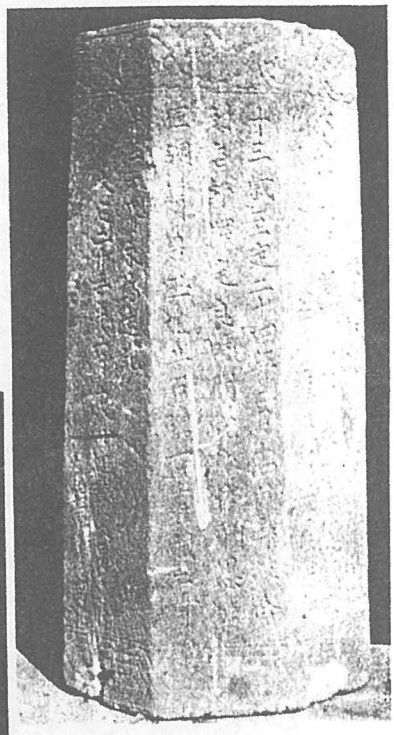


圖五：大理國彥貴趙興明爲亡母造尊勝墓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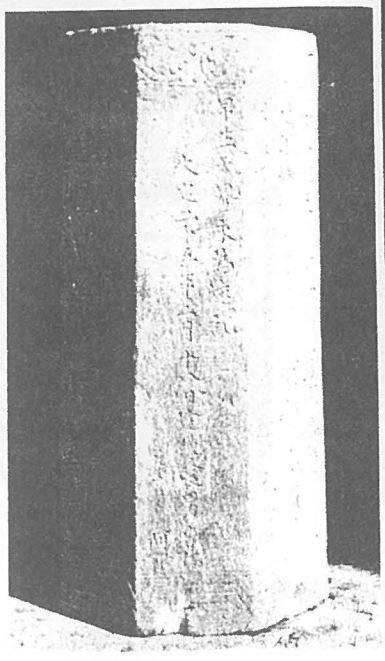
孫太初，《雲南古代石刻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頁82。



1.墓幢第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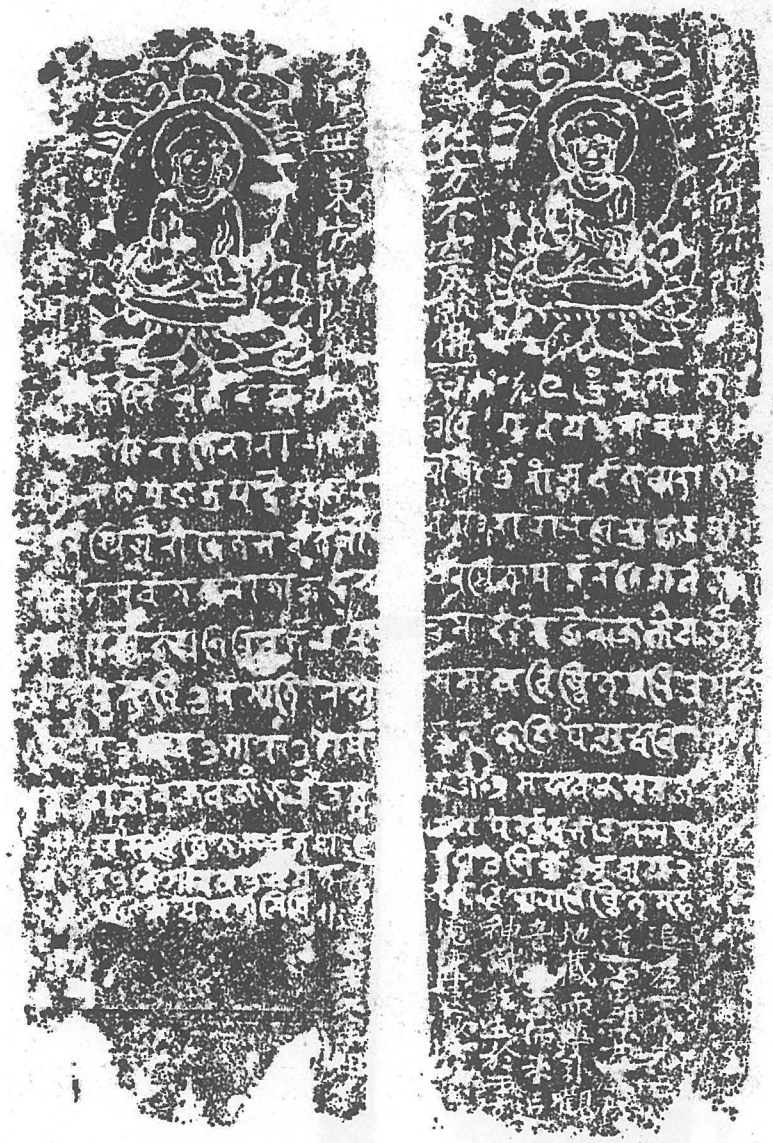
3.墓幢第七面



2.墓幢第八面

圖六：喀左顧杖子村出土的金代墓幢

傅宗德，〈喀左顧杖子村出土金大定二十五年墓幢〉，《遼海文物學刊》1992.1，圖版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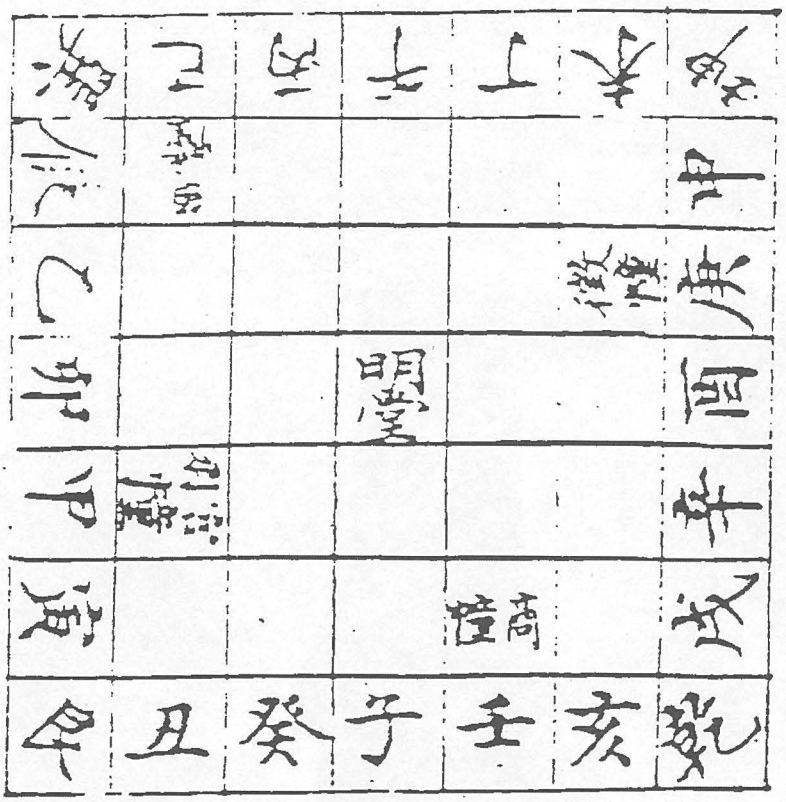
圖七：四川西昌附近墓幢拓本

黃承宗，〈西昌附近的古代火葬墓〉，《文物資料叢刊》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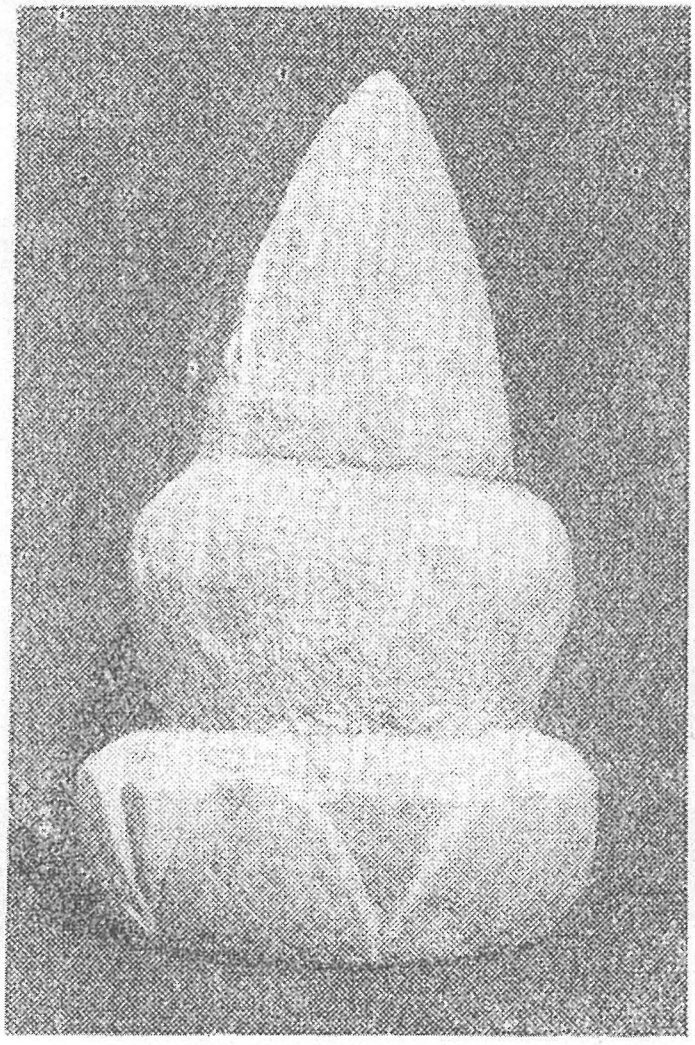
圖八：雲南劍川墓幢

孫太初，〈雲南西部的火葬墓〉，《考古通訊》1955.4，圖版參。



圖九：《大漢原陵秘葬經》下五品庶人儀圖

《藏外道書》第一册，頁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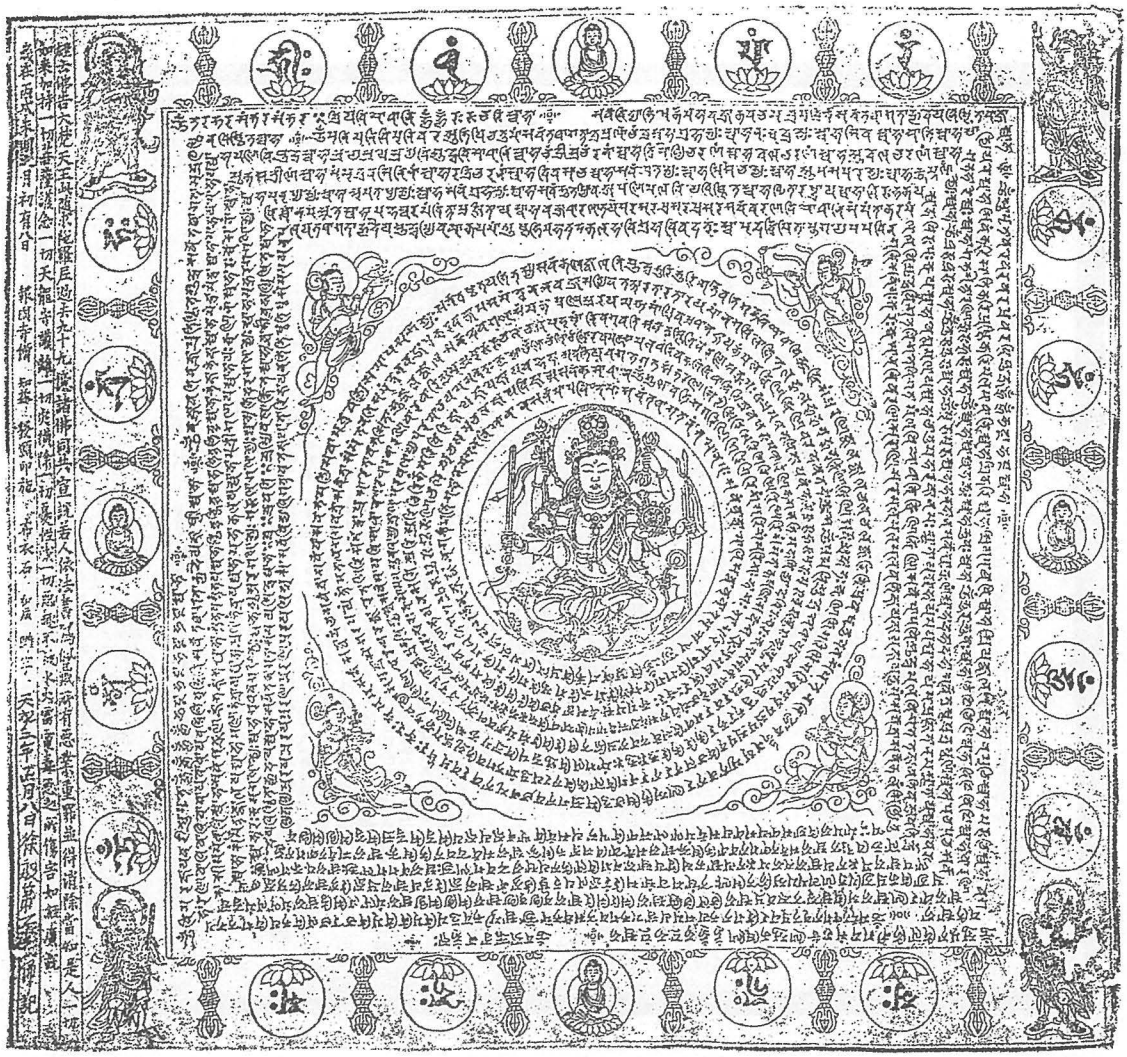
圖一〇：遼・馬直溫夫妻墓出土石幢頂

張先得，〈北京市大興縣遼代馬直溫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12：33。



圖一一：唐・手寫經咒絹畫

李域錚、關雙喜，〈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寫經咒絹畫〉，《文物》1984.7，圖版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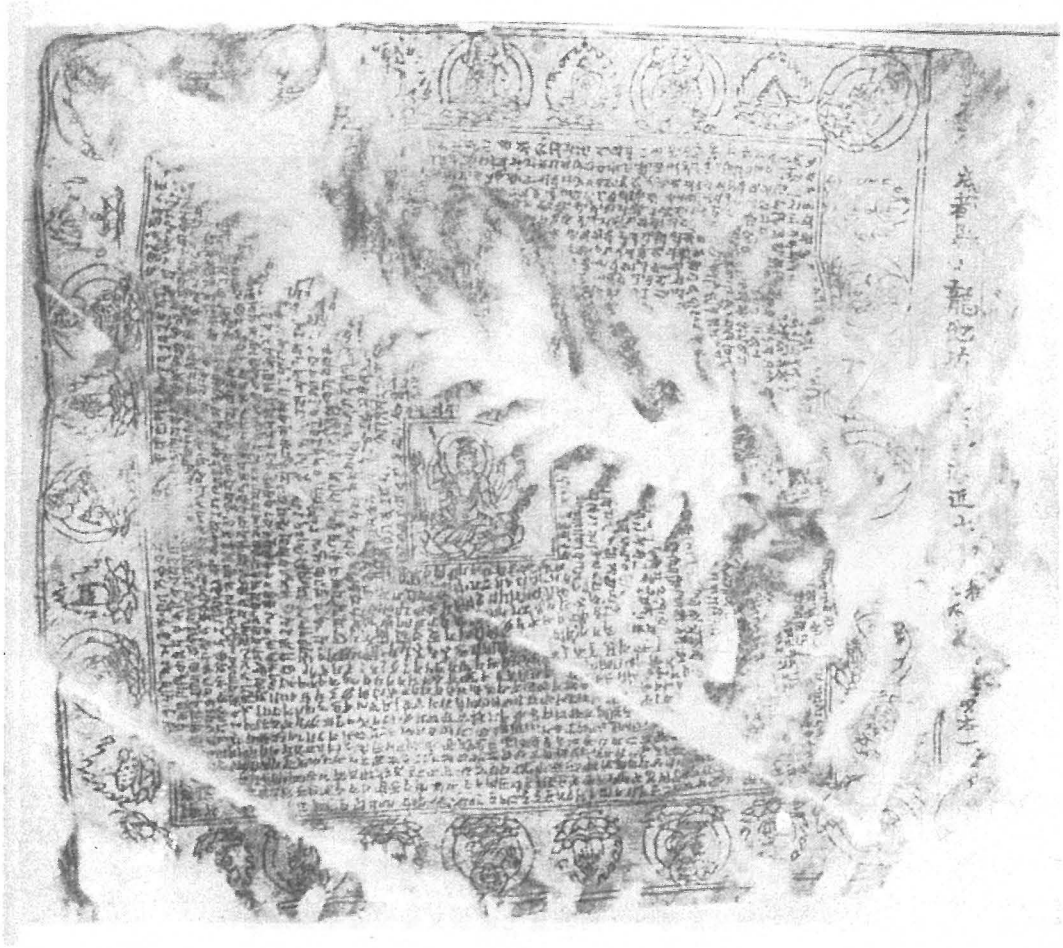
圖一二：洛陽東郊史家灣出土五代雕版經咒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朝華出版社，1990），頁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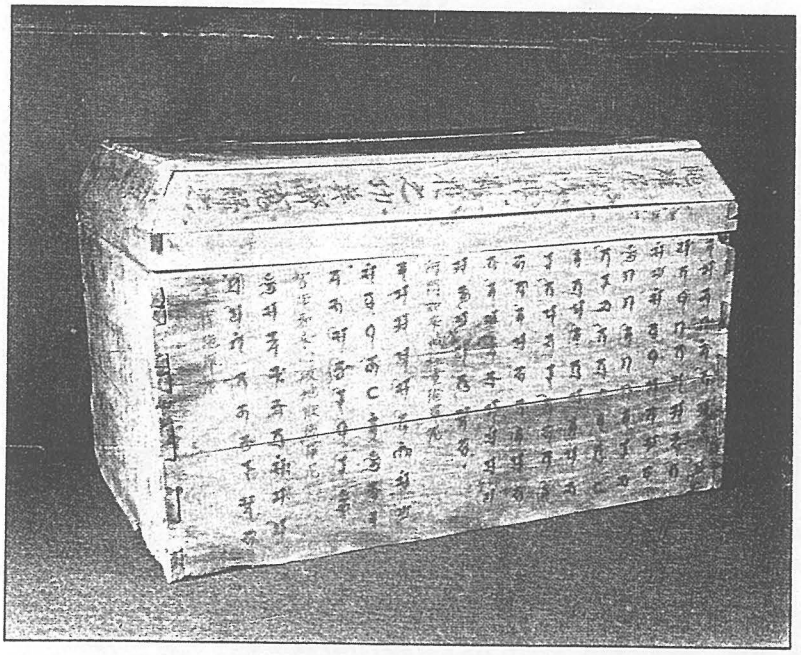
圖一三：唐・印本梵文陀羅尼經咒

安家瑤、馮孝堂，〈西安澧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羅尼經咒〉，《考古》1998.5，圖版捌。



圖一四：唐・印本陀羅尼經咒未修整前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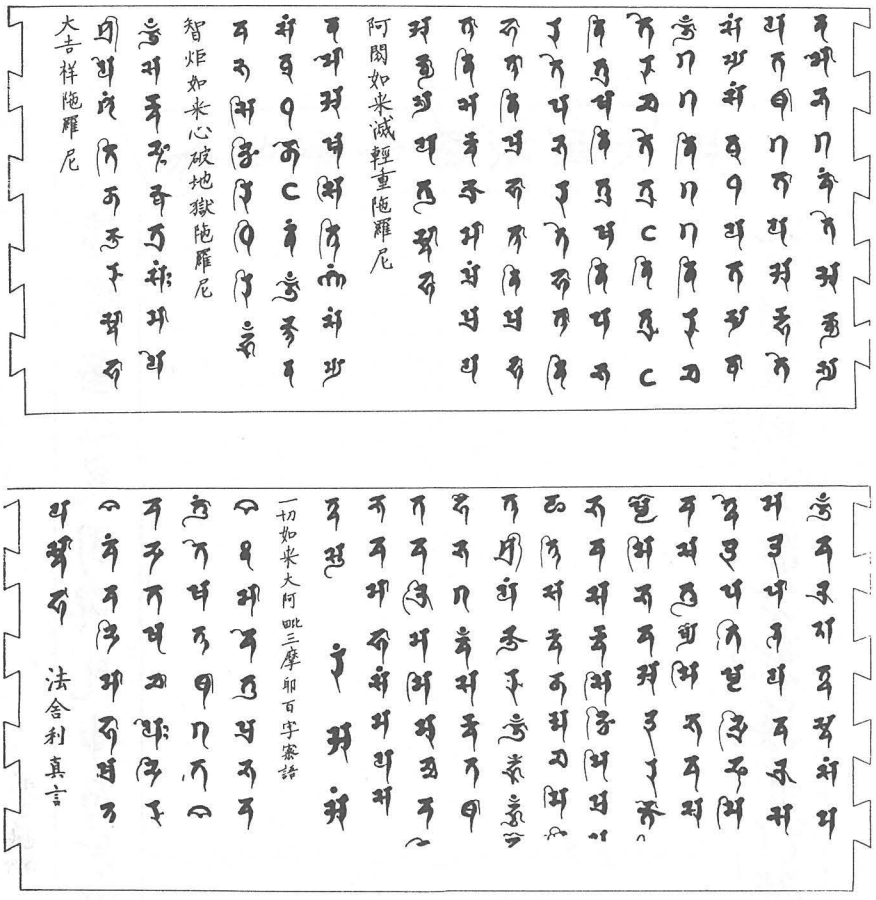
馮漢驥，〈記唐印本陀羅尼經咒的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7.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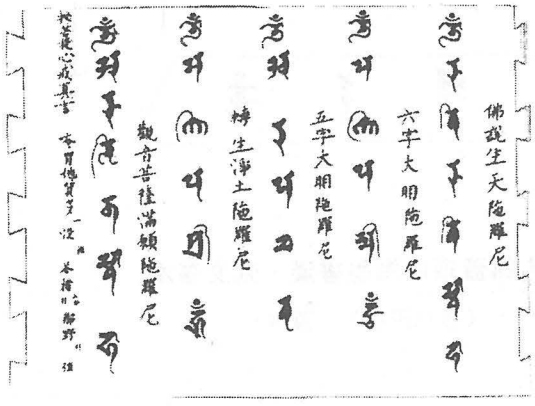
圖一五：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墓陀羅尼木棺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壁畫墓發掘簡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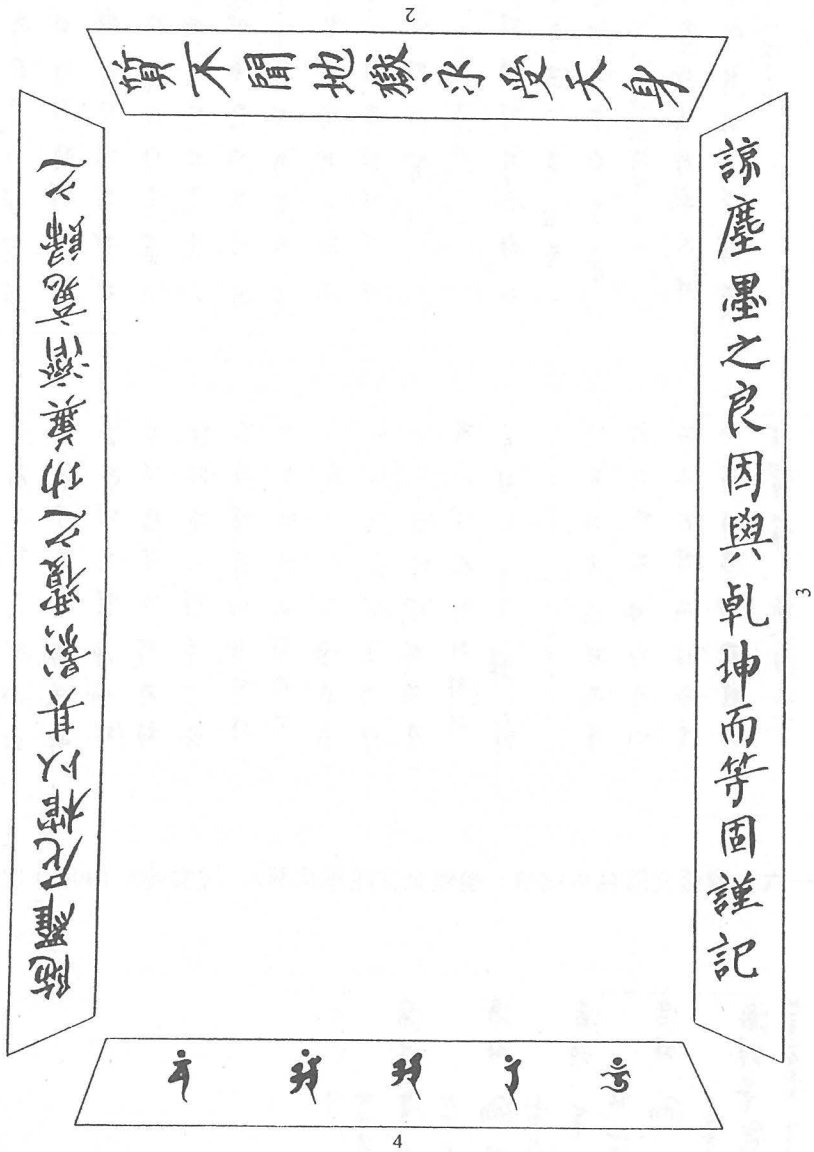
《文物》1996.9：彩色插頁玖。



圖一六：遼張文藻墓木棺前、後壁梵文陀羅尼摹本（《文物》1996.9：31）



圖一七
遼張文藻墓木棺左壁
梵字陀羅尼摹本
《文物》1996.9：31



圖一八：遼張文藻墓木棺蓋頂四剎墨書漢、梵文摹本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頁84。



經板 k1



經板 k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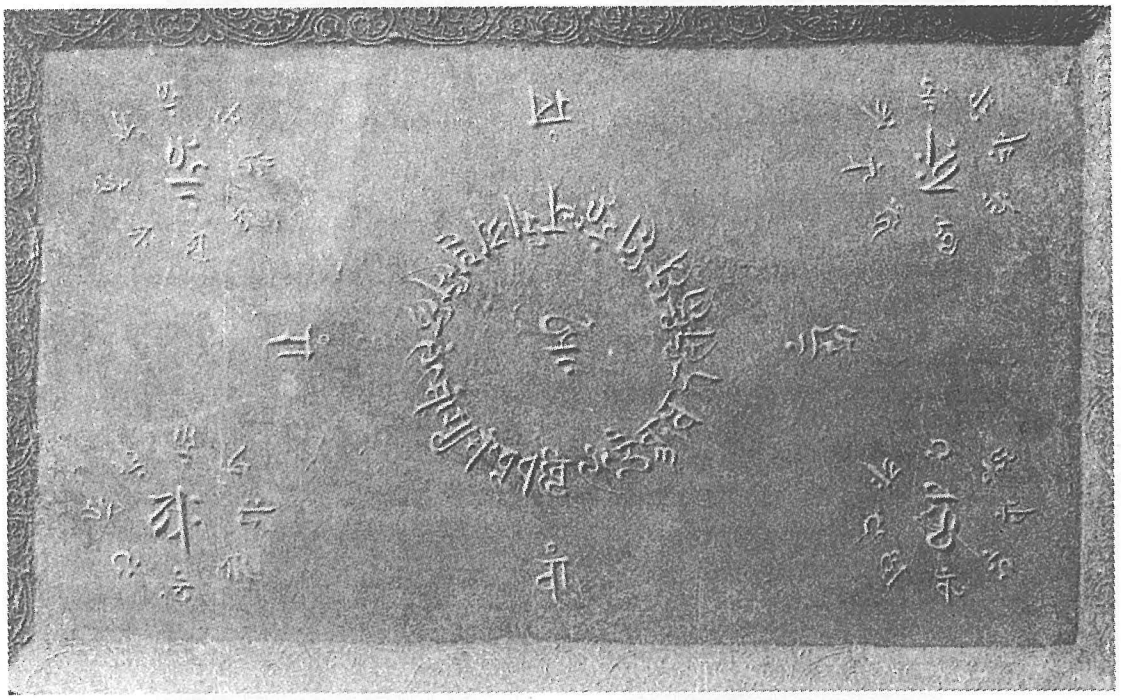
經板 k4



經板 k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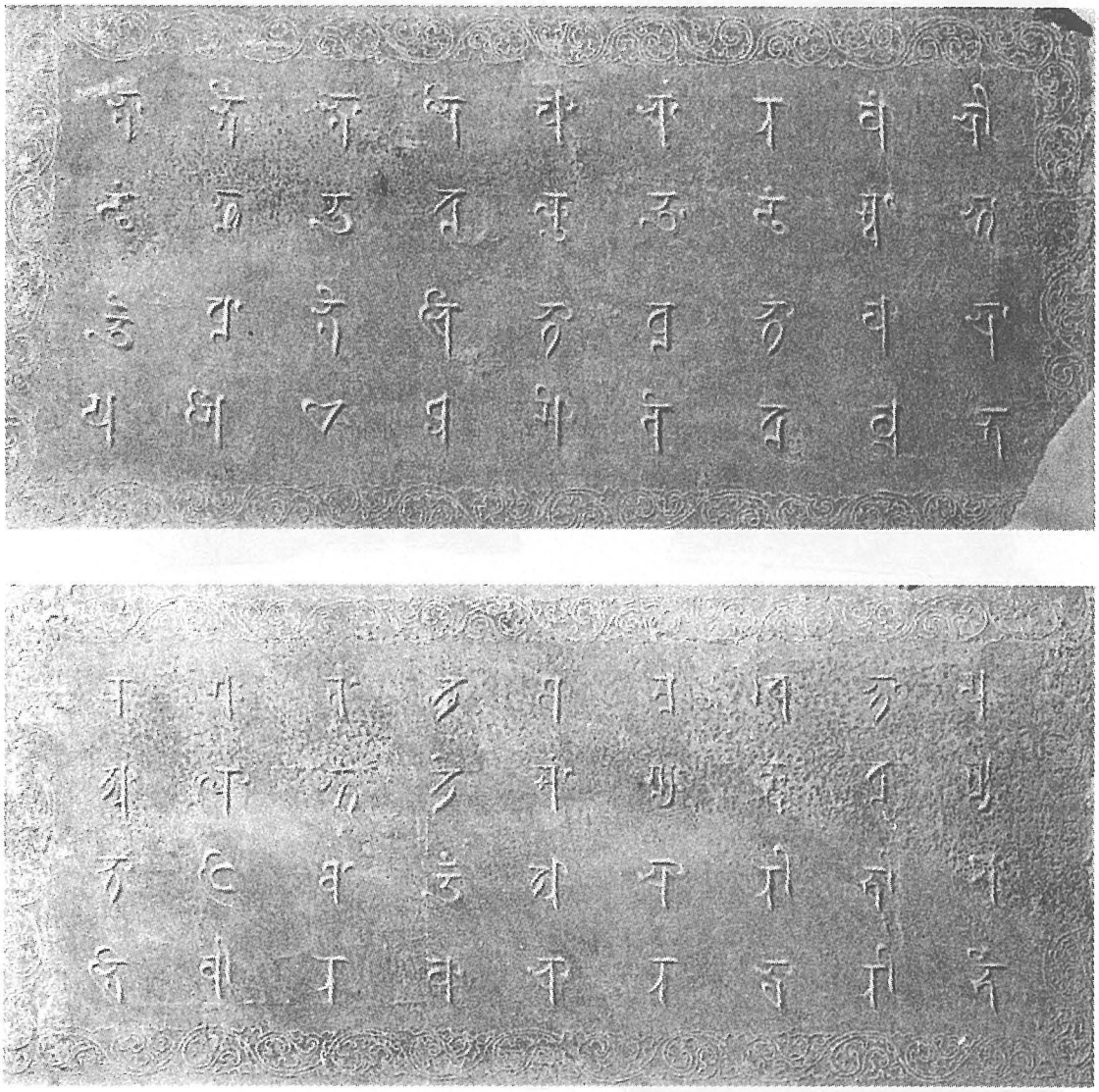
圖一九：朝陽西上台遼墓經板

韓國祥，〈朝陽西上台遼墓〉，《文物》2000.7：57。



圖二〇之一：朝陽西上台遼墓石函

韓國祥，〈朝陽西上台遼墓〉，《文物》2000.7：53。



圖二〇之二：朝陽西上台遼墓石函北壁（上）、南壁（下）

韓國祥，〈朝陽西上台遼墓〉，《文物》2000.7：54。



9號墓石棺蓋上的文字



10號墓石棺蓋上的文字



15號墓石棺蓋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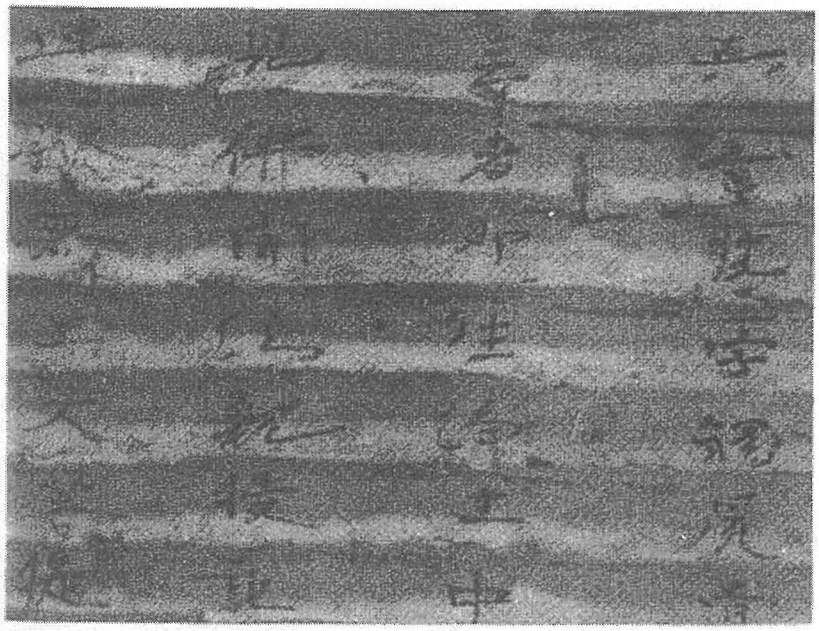
圖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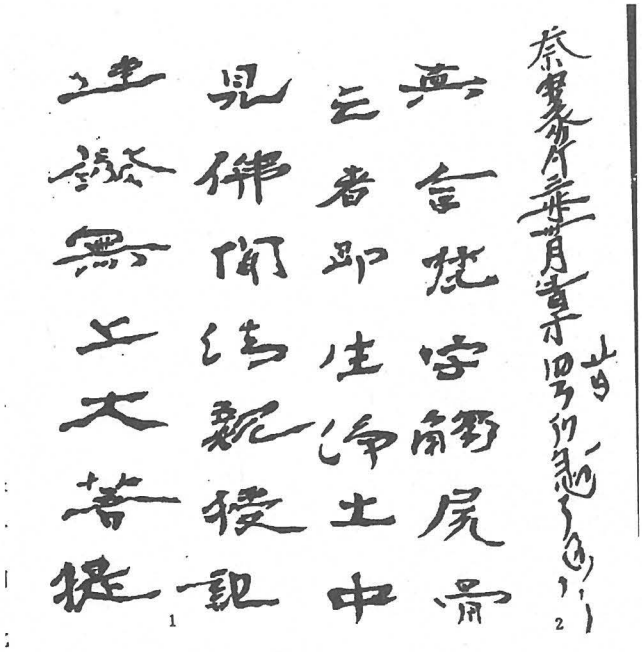
大同西南郊遼墓石棺

山西雲崗古物保養所清理組

〈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遼、金墓清理簡報〉

《考古通訊》1958.6：33。





圖二二：敖漢旗喇嘛溝遼代壁畫墓墨書題記及摹寫

〈敖漢旗喇嘛溝遼代壁畫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99.1：91, 92。